

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列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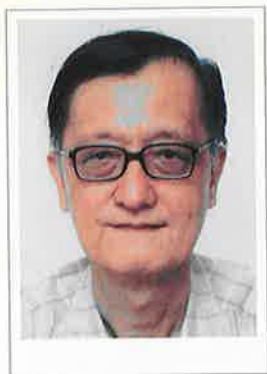
精神家园透视

精神家园透视

諸家

斯雅舍

斯雅舍出版



作者简介

风沙雁，原名欧清池，祖籍福建龙溪，1971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获荣誉学位。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负笈日本，1981年获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硕士学位。1990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学位，同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1998年获国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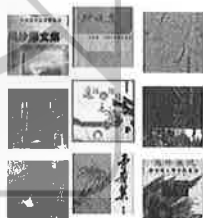
1971至1975年担任移民厅副助理厅长，1976至1980年转去外交部，被派往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工作，担任三等秘书，为期5年。1981年加入《联合早报》，先任社论委员，后任新闻编辑。2002年起，任新跃大学中文系讲师，兼任翻译学系校外评委。

风沙雁的其他笔名有瑶岚、向民、雨中雁等。他60年代末开始创作文艺，并从事学术研究。已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砂砾集》、《矛盾集》、《樱花飘落时节》、《文艺絮语集》、《哀思集》、《风沙雁文集》、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遥远的期待》、政论选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以及学术论文集《方修及其作品研究》（上下二册）。

他目前潜心于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研究工作，正在撰写《新加坡当代文学史》。

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列之六

風沙雁



精神家园透视

精神家园透视

諸家

斯雅舍

斯雅舍出版

版权所有

新加坡斯雅舍《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列》

法律顾问（排名不分先后）

黄锦西（新加坡）

刘华源（汶 莱）

美术顾问

廖宝强

总策划

忠 扬

编委会

总 编 辑：风沙雁

执行编辑：史 英



书 名：《风沙雁精神家园透视》（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列之六）

著 者：诸家

出 版：新加坡斯雅舍Si Ya She

地 址：150, Orchard Road, #0231, Orchard Plaza

Singapore 238841

电 话：(65) 9012-2319

制 版：城市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快一通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2

国际书号ISBN978-981-08-2064-0

定价新币S 16元

海外US 12元

目 录

CONTENTS

1	辑一 培育精神家园幼苗期	
3	矛盾的铸造	纪 思
7	读风沙雁的《砂砾集》	纪 思
9	风沙雁印象记	张均生
11	辑二 维护精神家园鲜花绿树期	
13	寻梦寻根诗人文人 ——风沙雁创作论	周 宁
23	根系中华文化的古典美和现代情 ——论风沙雁的散文创作艺术	李小平
29	风沙雁的精神家园	周任雄
37	辑三 反思精神家园远景期	
39	《樱花飘落时节》序	舒巷城
41	读风沙雁的《樱花飘落时节》	邓 弼
43	令人感慨系之的《樱花飘落时节》	阿 伦
46	我看《樱花飘落时节》	英 造
50	携扶桑风物人画册 ——读风沙雁的《樱花飘落时节》	蓝 端
56	行云流水醉卧神游 ——风沙雁的《樱花飘落时节》	李拾荒
58	风沙雁的樱花飘落时节	寒 川

目录

- 61 **辑四 哀伤精神家园树枯花凋期**
- 63 借景抒怀字字情
——小说《追逐阳光的人》读后
冬 琴
- 71 漂流与追逐
丁 云
- 77 一曲时代的悲歌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读后感
(文莱)一凡
- 82 《追逐阳光的人》为何只追到苍茫一片
(马来西亚)杰伦
- 86 新加坡共和国的三种文学版本比较论
(马来西亚)许文荣
- 105 动听的歌要用真情来唱
——评风沙雁的《追逐阳光的人》
海南会馆文学读书会乙组会员
- 110 阳光还在地球的另一边
——读《追逐阳光的人》的感悟
海南会馆文史读书会甲组会员
- 115 知识分子的心灵画卷
——从《追逐阳光的人》看南大生的悲情与奋发
柯碧琴
- 140 又见芳草绿天涯
——序风沙雁的《追逐阳光的人》
(中国) 马阳
- 147 三声清啸醒文苑
(中国) 马阳
- 155 **辑五 把脉精神家园奇花异草**
- 157 本土作家研究的新现象
原 旬

辑一

培育精神家园
幼苗期





矛盾的铸造

· 纪 思 ·

风沙雁君在《矛盾集》的《后记》中说：

“好的杂文该像是掷向敌人的矛，好的评论文字该像是保护朋友的盾。”

这确是很好的比喻。虽然，好的评论文字有时也是剖析和攻击非现实主义者的匕首。由于风沙雁君的书评都是护卫朋友的盾，因此我们可以感触到那许多篇文章中，都铸入了他的真情。在《与尤琴谈(小岛醒了)》一文，他像是友爱的大哥，那么温文，那么摆事实讲道理的，对着小妹妹侃侃而谈。他的文章虽然像是直接写给尤琴，其实也是写给读者们的，只不过那里面的态度真诚，对于新生而稚嫩的东西，贯注了满腔爱护的热忱。

当然，对待自己朋友的作品不能单有热忱，还要能用正确的观点来看待它。风沙雁的确是做到了这一点，在批评李擒白的《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时，他写道：

“单单有要表现劳苦群众的生活的愿望，并不一定能使文学作品产生预期的客观效果。很多题材是取自劳苦群众的作品，在艺术效果上并不能使人感动，这并不仅仅是作者本身没有较高的表现手法，而是作者不熟悉这类题材。”

在《驳“诗人”的谬论》一文中，他说得更简明：

“……让我们老老实实深入生活，拿我们脑中原有的正确思想去实践，在实践中体验出劳苦群众的心声，这样写出来的诗作才会感人，才有生命。”

我们因此可以说作者是重视文艺写作者对生活的体验 and 理解的。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对许多朋友的作品作了细心的阅读，测量他们反映生活的深度，分析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是否正确。这点正是作者可取的地方。

风沙雁对事物的认识是注重从感性到理性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是他反对这样的一种创作态度：

“从概念出发去攫取题材来写作，最不能避免的缺点是写出的文章流于一般概念化，口号化。”（《蓓蕾鲜花相映成趣》）

这点正是许多初学写作的朋友容易犯上的毛病。

他又反对这样的一种创作方法：

“……这首诗正像一位没有放进自己的感情，或者说放进错误的感情的摄影师，用他的照相机把周围的现象拍摄下来，一一排列在你面前……”（《〈这年代〉缺点多》）

这也是一些青年朋友的毛病。因为写作者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对生活理解得不够，不能概括出本质的东西而加以描写，往往就患了自然主义的缺点。

我们由《矛盾集》的多篇书评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正确的文艺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对于文学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方面，他也有这样的认识：

“文学当然是以文字来表情达意，但仅仅只有语文的表达能力是很不够的；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知识越充实，就更容易分析问题，写出来的作品，思想性就会更正确。”（《与尤琴谈〈小岛醒了〉》）

这点可以说是作者学习文艺的一点心得，那么坦诚的写出来与他的朋友交流。在谈到意境这种文艺创作给人的美感时，他更侧重于它的社会美。试看他写道：

“意境的不够凝练，文字的不够洗练，这是散文的致命伤。但所谓的意境，不仅仅是指描绘风景而言，从平凡的事件中看出其社会意义，以具体的事物来表现抽象的感情，这也是意境。意境的创造，不能忽略了思想水平的提高，但突出的艺术构思，深

刻的生活体验，及精练的文字，往往会给正确的主题思想予烘托月的作用。”

多不简单的看法呀。这里面显示了作者对正确文艺理论的学习，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以他对文艺的认识，再加上他对朋友的热忱，我们因此可以说风沙雁君的盾，是铸造得很坚实的！

由于风沙雁是注重以具体的、感性的描写，来带给读者们文学的美感的，因此即使是在他的书评，他也时常喜欢用上形象性的比喻，例如他在《轻评浅介〈风下杂笔〉》中有投枪匕首点缀装饰品的比喻，在《谈谈〈生活杂笔〉》中有小溪畔的水草的比拟，都说明他在铸造盾的同时，也不忘在盾面镂刻上花纹。

至于风沙雁的矛，他的杂文，虽然都是短小精悍，但也锐利无比。这些杂文的大部份都与文艺及语文有关，都发生在周遭，大家都能够有所体会。因此也不用再唠叨了。

在这许多的矛和盾中，有三篇是非矛非盾的，即是《一对卖“曼尖糕”的老夫妇》、《有友来访》及《长堤掠影》，它们可说是叙事散文。

《一对卖“曼尖糕”的老夫妇》一文，可以说是作者以一位旁观者，怀着同情心观察着一对贫困的老夫妇的生活变迁。这样的描写方法，正是许多知识份子创作者处理题材的方法。

《有友来访》则描写了某些大学毕业生的遭遇。这篇文章由于写的是知识份子个人出路的问题，因此读完全文之后，给人的感触是“淡淡的哀愁”。

至于《长堤掠影》，虽记录了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却有对素材剪裁不当的痕迹。作者其实是可以只写他在长堤遇到少女的经过就行了，至于他的同事穆汝，则看不出有在文章中出现，并在文章后面与作者作那段对话的必要。由这篇文章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也有急于把生活的见闻写下来的毛病。

风沙雁在《后记》中写道：

“……但倘若有人走近来问我：“你说文章该怎样怎样写才会成功，但你的东西为什么又不感人呢？”我将会瞠目结舌，一

如寓言中的那个卖‘矛盾’的人一样为之语塞……”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虽然是掌握了正确的文艺理论，但是如果缺乏生活的历练和创作的实践，那么即使是知道文章该怎样写才会成功，要写感人的文章，也还是要做一番艰苦的努力的。这其实也是笔者和许多青年文艺爱好者，所同样面对的难题。

最后，希望我的这篇书评——我所铸造的盾，也是一面保护朋友的盾。

（一九七六年八月）

（《矛盾集》：一九七六年七月洪炉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此文收在纪思著《切磋集》一书



读风沙雁的《砂砾集》

· 纪 思 ·

风沙雁君的《砂砾集》出版后，似乎没有引起读者多大的注意与反应，就我的记忆所及，只读过一篇香港作家舒巷城写的一点感想。也许，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诗和散文，多数只是知识份子的吟唱，然而它们所洋溢着的热情、对乡土人群深沉的爱和对光明的企盼，都深深地让读者感动。

书名用《砂砾》，照作者自己谦虚的解释，是希望他的文章像小砂砾一样，放在泥泞小径上，能帮助赶路的朋友们少溅些泥泞。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在他的《砂砾》（云南园散草之三）一文里，得到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泥泞路上曾献出力量的是砂砾，是一堆不显功，不夸耀，默默站稳岗位，静静埋首工作的砂砾。”这真是一种不平凡的，闪着令人喜悦的亮光的思想啊！

作者的“砂砾”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得到体现。我们只要读一读《太阳的一线光》、《我们是小水滴》、《他是》、《信心》等诗篇，就能够看出，作者在其间贯注了平凡但光辉的思想感情。然而，是什么让作者的“砂砾”思想发出耀眼的光芒呢？作者在他的诗中唱道：“我们是小水滴，原先各怀着个空想，太阳点醒我们的梦，我们毅然投入海洋。”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光芒的来源。

我们说作者是洋溢着热情的，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他讴歌朝阳，光明，春天，温暖。虽然作者的多篇诗歌只是知识份子热情的抒发，但是他已经注意到需要踏实地去反映现实生活了。在

《老渔夫的故事》和《渔港杂事诗》两篇中，他的诗笔在生活的泉源中蘸满了墨水，为读者谱写了值得诵读的诗篇。

作者的《云南园散草》这一组散文，一般的读者读了也许会觉得略有隔膜，但是，对于在云南园生活过一段时期的人，却是亲切的，作者沉抑含蓄的文笔，在这一组散文中，说明他应用文字的功力是经得起考验的。同时，他的观察事物的能力，也得到证明。云南园中的草木、花树、流水、景物等在作者的笔下，都有深刻的寓意；经他的描写，一景一物，都带有浓郁的感情。

当然，作者在云南园生活了几年，他是免不了会有许多东西要写的。但是，也不能老是绕着这个圈子写。象《山岗吟》和《颂高岗上的松树》，在题材上和《云南园散草》中的文字，就很有重复之嫌。

跳出云南园风光，作者和生活接触后，也写出了令人喜欢的散文。像《没有阳光的走廊》和《卖内粽的姐弟》两篇，作者写出了生活在底层的儿童的生活，三个小孩子分吃着一枝五分钱的冰淇淋、两个小姐弟在风雨中卖肉粽，这些有什么好写？高贵的诗人是不屑一顾的，感情麻木了的作家也会忽略过去的，然而作者捕捉到了，怀着深深的同情写出来。

我个人较喜欢《一把雨伞》一文，通过一把雨伞，把一个马来劳动妇女的形象，刻划得很动人；同时，在这一把雨伞上面，也传递着不同种族之间珍贵的友谊。这篇散文，也可以说是一首动人的诗。

最后，我们愿意作者今后能不断地扩大生活面。《砂砾集》中几篇描写生活的散文，都是在车站上或搭车时的见闻，这无形中透露着作者生活面的局限；同时，这样的生活见闻究竟是缺乏深入的，这对于作者今后应用他动人的文笔，为我们写出深刻动人的文章，或许正是一种妨碍。

（七六年三月八日）

（《砂砾集》一九七四年八月由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风沙雁印象记

· 张均生 ·

少年时读风沙雁的《砂砾集》，就好像交了一位要好的师友。偷懒的时候，总有一股力量在前面引导着，因此惊醒过来，揉揉眼睛再上路。现在重读旧书，又好像回到了充满理想的学生时代。一切都那么单纯，那么朴实，仿佛就离开了周围的污染，感觉一身清爽。

七十年代是个混乱的时代，好事、坏事轮番出场；东风吹来，西风压去。生活在夹缝中间的人们感觉到晕头转向。可是，刚离开学校的我，在那激荡的时代，却完全被蒙在鼓里；又像鸭子听雷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并不知道那划过天际的闪电到底代表着什么意义，也想像不到明天会是什么样。学生的单纯在这里，幼稚在这里，可爱也在这里。心中就只有一个意念：一心一意地要把自己贡献出去。贡献给谁或贡献给什么事业，却不大了了。因此，当我读到风沙雁要把自己当“垫脚的砂砾”时，就打从心底敬佩他。读者和作者因此有一种会心的微笑。若说读书能与古人神交，那么，与今人应该也能神交！

八十年代，风沙雁写过一篇《留一点美在人间》，应该是这种贡献心境的进一步表白。风沙雁给我的印象是：从小就“爱美”。不过，少年时候美得灿烂奔放；到了中年就美得凄苦、朦胧。这好像是个人风格的转变，也许是时代风向使然。大概从“少年不识愁滋味”到“天凉好个秋”就是中外古今文人的“发展规律”吧？

文艺杂志、刊物越来越少；作家群好像也越来越“缩水”。在这商业味极其浓烈的社会里，像风沙雁这样一位能写、肯写的作家，就显得比熊猫还珍贵了。

由于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对于能上大学读书的人，心里非常羡慕。当我读到风沙雁描写大学里云南园的山岗、湖水、相思树、野花、松涛、小溪…时，多么希望能够置身于这尘世之外的神圣学府，和作者一起分享那校园里徐徐吹来的清风。或者就站立在校园的篱笆外，远远地眺望着莘莘学子们沐浴在校园的春风里，享受着母亲般的疼爱…这视觉本身就是一种至高的享受！

年轻的风沙雁爱憎分明。他热爱美的一切，爱茉莉，尤其是在野地里挣扎成长的茉莉，欣赏她在困难的环境中兀自散发着芬芳。他痛恨那些吸血的“贪心的人”；痛恨美的破坏者“金甲虫”；痛恨“以面包沾着血来吃的雅士”……

读九十年代风沙雁写的《哀思集》，感觉到中年的他，感情更丰富。

最近，他写了一篇《欲把余生寄情山水》。在无可奈何之中，流露出高洁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执著。

但愿这个世界多一些“风沙雁”，世界就多一些美！也但愿风沙雁继续“流”更多的美在人间！

辑二

维护精神家园
鲜花绿树期





寻梦寻根诗人文人

——风沙雁创作论

· 周 宁 ·

那天，细雨迷蒙，暮色苍茫，他再次登上山岗。多少年过去了，依旧是那番感动。“中华文化给我予多愁善感的特质，使我能欣赏自然中每一个美的境界。”说这段话的风沙雁骨子里是位诗人，有诗人的浪漫，诗人的敏感，诗人的天真与忧虑。在一个诗歌变成豪言壮语、格言警句或玄言天书的时代，他去写散文，用散文抒情，在散文中思考，散文成了他自由的形式，让他生活在云南园的浪漫回忆中，东洋的樱花枫叶中，中国古典的诗情画意里。风沙雁⁽¹⁾曾经是诗人，写过诗，那时“年少才高”，后来专写散文，忧患深沉了，风格也越发沉郁。他的散文大多发表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联合晚报》、《联合早报》等报章上，后来结集出版的有《砂砾集》（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4）《矛盾集》（洪炉文化企业公司1976）、《樱花飘落时节》（风云出版社，1982）、《枫叶初红忆扶桑》、《文艺絮语集》（中外翻译书业社1992）《海外来风·欧清池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哀思集》（中外翻译书业社，1993）。从内容上看，他的散文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抒情小品，一类是文艺评论，一类是政论杂文。写散文抒情时，他是一个浪漫到伤情的诗人；写文艺随笔或政论杂文时，他又是一位目光敏锐的批评家。我有时真奇怪，一个人怎么能如此深入地生活在两个相对的世界里，一为至

情一为纯理。有人说文学是用血写出来的，哲学是用骨髓写出来的。苦吟苦作，忧思冥想，风沙雁的才情与学识同样令人钦佩。我想，不仅在新加坡华文作家中风沙雁的成就令人瞩目，在世界华文创作文坛上，风沙雁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体现在他的创作题材与风格上，更体现在他忧患深沉的主题上。他以诗人的心灵感受、学者的头脑思考，从个性情感到普遍精神，从寻梦到寻根。自70年代开始创作，他就走上了一条神圣而又痛苦的朝圣之路，如今他仍在求索，这条路将他引向远方，引向想象与自由的国土，引向民族文化的精深博大处。

写作是一种浪漫的经验，它把风沙雁分隔在两个对立的世界，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两个世界，一是自然，一是城市；一是文化，一是社会；一是过去，一是现代；一是中国，一是新加坡。前者属于理想，后者属于现实。风沙雁一旦进入抒情境界，所有属于理想的东西，都会显得分外美好。风沙雁在抒情小品中描绘的自然景色，无论晨光暮色，春雨秋凉，都是华文中可能创造出的最优美的文字，它继承了离骚》的文彩，李杜的风情，明清小品文的性灵。在自然中，作者似乎回到了精神家园。这里融通了广博的民族文化与悠古的历史，是一个与缺憾的现实完全相反的圆满世界。遗憾的是，这个美好的世界似乎离作者越来越远，儿时乡居的野趣被现代都市的组屋所取代，云南园的青春已如梦如烟，从日本回来以后，枯燥单调的生活更是让人难以忍受，只有在文学创作中，他才能超越现实诗意地生活。

风沙雁的抒情散文大多集中在《樱花飘落时节》、《枫叶初红忆扶桑》与《哀思集》中。他意识到两个世界的分裂，也试图寻找某种统一的境界。客居日本那五年，他似乎看到这两个世界融合的希望，日本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并存使他恍惚看到现代的新加坡与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统一；日本的自然景观与城市风物使他发现自然与城市还有可能达成审美的和谐。也许最重要的。是他生活在日本时常幻觉到生活在古代中国，生活在深情向往的精雅传统中。正是这种幻觉促使风沙雁写下了许多关于日本风物的抒

情小品，而他最优秀的抒情散文，也产生自这批作品中。日本不仅体现了他的文化理想，也体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即凄清美。他喜欢那种境界，体验现实有如幻想，体验幻想有如现实，或朦朦胧胧，或清清明明，山川草木，人文精神，在半醉半醒间看，在花开叶落时吟，有三分多情，二分伤感，一分凄清。

我没有读过风沙雁早年写过的诗，但觉着他的散文比许多诗更有诗情。80年代初，他客居东瀛五载后回到新加坡，一时竟分不清哪是他乡，哪是故土。中华文化孕育的日本风情时时让他联想到文化家园，可新加坡却是他生长的祖国。于是理想与现实的归宿再次分割了他，他时常感到痛苦。最初那几年里他写了一系列有关日本生活随感的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便是《樱花飘落时节》与《枫叶初红忆扶桑》。这两部散文集记载了他一种独特的体验，故园似他乡，他乡如故园。一位失去民族传统与文化滋养的海外华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心灵深处那种时常让人绝望的飘零感。

“游子的浮云感，竟然要靠异乡景物来慰藉，人生有比这更凄苦的境界么？”（《偶感》）本是故土的新加坡，却一时找不到“睹物思情”的地方；本是异乡的日本，却处处有故园之情。风沙雁的文化认同心态是极度痛苦而矛盾的，真是故乡也苍凉，异乡也苍凉：“……我对故乡的薄暮的感受，竟然是一如异乡的那么苍凉。日本的冬的薄暮给我予苍凉感，如果是乡愁与异族文化的挑逗；那故乡薄暮给我予苍凉感，却是因本族文化没落而来的悲伤。”（《薄暮的苍凉》）伤感凄凉的境界始终笼罩着风沙雁笔下的景物，这与其说是物境，不如说是心境。这种心境我们曾在宋词元散曲中见过，宋明文入画中见过，总是寒斋早立，寂寞楼头；或冬雪皑皑，或春雨潇潇，无端愁绪无尽烟波。

回忆是一种享受，一种凄伤的享受。个人韶华不在，民族文化难全，日本归来之后，风沙雁的散文小品大多是触景生情的怀旧之作。他把精神家园遗失在云南园的山岗上，遗失在东瀛的山韵草趣中，每日单调枯燥地在都市里为谋生奔忙，没有诗意，

很少闲暇。只有在写作时他才能重温旧梦，慰藉他那颗孤寂的心灵。然而，现实是一个世界，想象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经常难以调和。这是作者体验到的另一层痛苦，所谓故乡与异乡的错位感实际上是由社会与文化的矛盾造成的。风沙雁在新加坡只找到现实或社会的家园，而精神家园却在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在想象中的日本。“景物的吸引人，其实是文化附着的关系。我的怀念东京，大半是在那儿我能看到自己的文化点滴造成的。我回来后的失落，却大半是看到一些好事物日渐消失造成的。”（《给桃女的信》）风沙雁说过，他只喜欢日本的景，不喜欢日本的人。他写过许多文章谴责日本侵华的罪恶。他在内心深处不会感觉不到那种被愚弄的痛苦：一个令他感到文化亲切的地方也同样使他感到历史的憎恶，他感情所系却是理智所殊。我说风沙雁生活在分裂的世界里，这也是一例。理想与现实分裂，情感与理智分裂。

山水关情，全赖文化的附丽。就象风沙雁所说：“在有文化气息的地方，海韵就格外动听。”（《海的追忆》）表面上的自然关怀，实质上是人文关怀。风沙雁堪称写景高手，在他的抒情小品里，随处可见出色的景物描写。而一切景语皆情语。晨曦暮霭，草色山光，都是文化的象征。我常想他为什么对新加坡的南洋热带风光缺乏感受，大概是华文古典文学中没有这类描写。风沙雁是在唐诗、宋词、元曲中，在诗情与画意中看世界的。他热爱自然。实际上是热爱自然中可以感悟到的人文精神，留恋过去。是留恋往昔生活蕴含的那种文化传统。触景生情、借景抒情，对于风沙雁来说，成为一种充满忧患与感伤的文化寻根历程。“酒后的朦胧，雨中江景的凄迷，远山的淡云，秋景的肃杀，我除了化入这些情景外，我将何以解脱呢？岁月飘逝，这些情景就像我的其他只可追忆的情致一样，又都蒙上一层轻烟，若隐若现，让我时时可窥探一番。我带着唐诗宋词元曲看自然，自然都涂上诗词曲的意境美。”（《情思》）文化断根所造成的那种漂泊感只有在如诗如画的自然中才能得到解脱。

文化关怀是风沙雁创作的动机与精神核心，也构成他的思想与艺术特色。这种关怀产生于现实中的文化失落感。生活在大陆的华人，文化传统渗透在每一个生存角落，他们或许更关心传统的变革；而海外华族移民的后代，处于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之外，于是文化的延续性与统一性就尤其重要。文化的认同感是存在的基础，移居海外的华人经常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以放弃文化传统的继承权为代价谋取在新国家的生存权。由此遗留下来的文化空洞或“精神私生子的落寞感”就积淀成广大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在风沙雁的作品中体现得分外明显，它可以作为一个核心将他文学生涯中的种种表象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精神世界。在总结自己的精神历程时风沙雁曾说：

“我这半生有两段生活最难以忘怀，一是云南园的四年寄读生涯，二是东京的五年暂居经验。前者是品味中华文化精髓的切实感受期，后者是领略东洋情调的凄清经验期，这两段生涯都教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春到河畔·芳踪何处》）风沙雁如此梦绕魂牵，并不断给他创作灵感的这两段生活经历，恰好是他生活中最亲近中华文化的时期，前者在书本上，后者从实物中。

“云南园的夜晚宁静得像刚出世的世界一样清冷，远处飘来的花的幽香，应是她身上发出的；风吹相思树的轻响，就是她轻盈的脚步声；何处的同学的宿舍飘出的轻音乐声，竟似海上的絮絮的波浪声了。我那时的情思是苦涩与辛酸的混合体。”

“黄昏雨飘洒在异乡的浅草，冬寒加上乡愁，雨后薄暮的落日余晖，与亮着的屋檐的红灯笼的红光互相映照，在东洋小调的衬托下，我算是真正尝到去家离国的愁滋味了。”（《情思》）

就读南洋大学中文系，或许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气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时常沉醉到伤感凄迷的回忆中，每一篇精美动人的散文小品，似乎都是这种回忆的记录。风沙雁骨子里是位诗人，是个彻头彻尾的传统文人，生活在现代化的新加坡或许不合时宜，或许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合时宜，除非在浪漫的幻想中。他一直向往中国的杏花春雨江南，可他游漓江时只在醉眼中

才发现美，落后混乱的社会他是不敢恭维的。他说新加坡是一个火热的国度，在一个“似春似秋而都有所缺憾的时代与地带”，他“只有借文学作品中春景秋风冬寒的描写寻求解脱”。

写作是一种诱人的经验，它把风沙雁分隔在两个世界里，让他有机会“生活在别处”⁽²⁾，生活在浪漫的幻想中。

真诚的幻想是存在的超越形式，在幻想背后有最严肃的忧虑。“民族与文化，有时困扰得我无法解脱……”（‘秋意秋意：诗情诗请’）风沙雁的自白道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特有的关怀。所谓知识分子，是那些“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人。他们关注的不仅是社会物质的进步。还有文化的完整性与连续性。T·帕森斯在论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时主张社会系统与文化系统在分析上的独立性，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角色资格，主要体现在他们“将文化关注置于社会关注之上”，面对新加坡特有的文明结构，风沙雁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就显得分外突出。新加坡各民族之间在政治与社会结构上的制衡关系使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难以成为正统文化，而建设新文化的希望又飘浮在各种文化表象之间。因为真正的文化并不是靠举办几场音乐会、体育比赛或书画展就可建设起来的。文化必须具备深层次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内聚力，是由一个民族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积淀完成的。现代人拼凑性地凭空创造文化只能创造文化真空。生活在这样一种文明结构中，风沙雁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不可避免要把文化关怀置于他精神的核心与创作的核心。说他是诗人，只能说明他创作的一部分或他的基本气质，他还写过许多政论杂文、文艺随笔；或许“文人”更为全面，他是一个典型的华族知识分子，善于理智地分析与批判，富于正义感与勇气，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风沙雁用散文的抒情形式表现他在文化身份失落后，从寻梦到寻根的情感历程。散文小品是他情感生活的实录。与此同时，

他也带着深深的忧患，理智地思考新加坡文化和华族文化的建设与失落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风沙雁的创作经常理趣多于情趣，他不仅从事散文创作，也致力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而且在后两方面的成就绝不亚于他的纯文学创作。

从抒情散文到政论杂文，我们已从风沙雁的精神世界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而将这情理两端统一起来的，仍是那种深切的文化关怀。在新加坡，即使人们在建设优雅文化上达成其识，很多现实的矛盾仍是困扰人心的。本族文化与本国文化，文化与社会，民族与国家之类本来在传统国家不存在的问题，在新加坡都变得分外敏感。风沙雁在他的政论杂文中，除了一部分讨论具体社会问题的，大部分涉及到新加坡文化建设与华人文化的延续与继承。在此我们发现他在散文世界中情感化表现出来的核心关怀，在政论文字中被充分理智化了。这种理智化的过程与情感化一样是痛苦的，分裂的。首先，他在情感中一再把寻梦与寻根的寄托放在日本，理智上关于日本的侵华历史的理解却使他难堪，自己最浪漫美好的记忆竟依附在一个随时暴露出邪恶的土地上，一个能让他感触到民族文化之根的国土也同样令他想起民族的劫难。这是第一种分裂的痛苦。其次，不断滋养他的想象与情感，不断为他创造生活意境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常使他在现实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将他无情地割裂在幻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两个世界中，倍感孤独。此为痛苦之二。再次，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解决生存中的幸福问题。现代化与传统的断裂使失去文化连续性的华人体验到一种精神危机，生命失去意义也失去最终的归宿。除非你意识不到文化环境，稍有一种精神自觉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生活在支离破碎的精神家园中。文化的荒芜感让人难以忍受，此其痛苦之三。再次，母语日渐衰微，语言生态被破坏了。一个华族子弟可能在公共场合讲华语，在职业所用英语，在家中说闽南话、客家话或广东方言，而他们都可能不认识华文！语言的口头与书写形式脱节，语感以及寄寓在语言中的精神完整性失去了。华人已经失去了走入内心深处、沟通情感的符号。此其痛苦之四。华文

没落，同时也剥夺了华文文学的读者。当文学家想再次发挥文学的魅力，将流落的华族魂召唤到一起时，他们痛苦地发现他们的努力最终成为没有回响的悲鸣。有人写没人读的文学是残废的文学。此其痛苦之五。这些痛苦在80年代那些年里一直折磨着风沙雁，构成他创作的冲动与主题。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母语的教育与传播、文化传统的维护与发扬等问题。这些文章大部分收在《文艺絮语集》与《海外来风》中。语言是凝聚民族的形式，华语与华文文学的困境实际上是华族文化困境的缩影。从日本回来新加坡的十年间，风沙雁感触最深、议论最多的大概是华族母语与华文文学的衰落。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又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与艺术创作中。因此，提倡并从事华文文学创作，这不仅是一个纯粹审美范畴的事；从更本质的意义上看，它关系到民族文化的承继与发扬，关系到每一位华人精神家园的建设。文学是民族文化的血脉。于是，在风沙雁的文艺评论中，我们发现那个贯穿散文与政论的同一精神核心——文化关怀。

风沙雁在文化大背景下思考华文文学的命运，这就构成他文艺评论的特色与思考的深度。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精华都积淀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用华文创作，在继承一种文学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其中蕴含的文化传统。而广大读者的阅读又使他们分享到这种精神与价值观念。新加坡幅员小，人口少，语种多，华文作为传播符号的社会实用功能也在逐年缩小，英语又只可谋生不可谋心。异族语言实用却无法情感化，华人会陷入一种感情空洞中，华族知识分子尤其会感受到这种缺乏文化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生命虚无感。在这种大背景下，华文文学的使命就不仅在于现实主义的参与社会或政治批判。浪漫主义的抒情可以慰藉人们时而感到孤寂空虚的心灵。浪漫是一种解放，它使人的想象与情感获得自由，使人性得以完善，使古老文化的精魂在每一个个体心灵中复活。东南亚华文文学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有时过分强调文学的直接社会性与政治意识。理解风沙雁创作的价值，必

须具备一个更合理的尺度，这个尺度就是文化。风沙雁是位诗人，也是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比关注社会物质进步更关注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有人说新加坡只有专业人才，没有知识分子，我想这种评价即使有些道理，风沙雁也是例外。在我所知道的新加坡文坛中，风沙雁属于最有“知识分子”气质与传统文化素养的那一些作家。

读风沙雁的作品，时常感到不论从思想上还是风格上，他都比时下许多大陆作家更加传统化。他有中国文人那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关心，有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对自然的敏感与对人文精神的热爱。20世纪中华文化花果飘零，这已不是一两位儒者的警惕，而是随处随时可以感觉到的事实与灾难。移居海外的华人脱离了文化本土，边缘化、漂泊感使他们更真切地体验到文化失落的危机。于是他们的思想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而生活在传统之中的大陆文人，则更关心“文化革命”或自我否定性的批判。这是世界格局与本土眼界的区别。风沙雁始终有一种游子的心态，这种心态使他始终处在寻梦与寻根的痛苦历程上，使他始终把对华族文化、华文与华文文学命运的关怀置于他精神生活与创作的同心轴上。他知道华族文化与华文的衰微，知道华文文学的真正危机在于读者少，不是没有人写，关键是没有人读。他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地带创作华文文学是多少有些悲壮的义举，是一出浪漫的悲剧。

在落寞与痛苦中创作，可以体验到甜蜜与欣慰。这些年来，风沙雁笔下激情与伤感的情调淡了，文章写得越来越沉郁，理智与思辩色彩越来越浓。他好象正在从一位浪漫诗人转变成一位深沉睿智的学者。目前他在新加坡大学研修新马华文文学史。当然，他会继续写作，继续他的精神旅行，他已有过了令人难忘的经历，云南园晨曦暮雨的伤感，东瀛樱花枫叶的凄清，他还梦想着杏花春雨的江南。“我常常幻想把我的老年岁月掷在杭州西湖畔的闲步或扔进钱塘江畔的潮声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或明清小品文，都是我晨昏吟咏的作品，偶有感触，自会

发之为文。可那时我能找到知音么？”（《心造意境》）

这是梦想，他也知道。可有梦即是有真，有梦就不孤独，就有希望。今年春天他再游大陆，最后一站是厦门，春雨时断时续，万物清清明明，可他行色太匆匆。或许多少年之后，他仍在那个美丽的热带岸边，在雨后黄昏，在心造的意境中，向波涛之外，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遥寄情思。



(1) 风沙雁，新加坡著名作家，原名欧清池，福建龙溪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获荣誉文学士学位，1998年获国立新加坡大学中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移民官，外交官，驻日本五年。

著有《砂砾她》、《矛盾集》、《樱花飘落时节》、《枫叶初红忆扶桑》等。

(2) “生活在别处”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名。

根系中华文化的古典美和现代情

——论风沙雁的散文创作艺术

· 李小平 ·

不止一遍读过新加坡当代著名华文作家风沙雁的散文集《风沙雁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挥不去的却是这样两个交织叠印在一起的作家影像:一个是身着古代长衫的文人置身于略带凄美的山水间仰天长吟,凄清、飘逸;一个是西装革履的作家漫步于现代都市蹙眉而谈,沉郁、慷慨。而两种貌似不同的形象却又是如此和谐统一在风沙雁的身上。从《风沙雁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些散文作品中,“古典美”和“现代情”形成了两个色彩反差十分强烈的“板块”,它们都建立在对中华文化自觉认同和关注、关怀的基础上,并形成了风沙雁散文的重要特色。

“心造意境”——洋溢着悠悠的古典美

风沙雁的抒情散文小品十分明显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唐宋诗词的影向。风沙雁甚至直接从中国诗词及作者身上承袭了其中的情感及方式,从而使他在抒情散文小品中的情感内涵具有了传统文化历史的继承性,也使他的散文作品涂染上了一层古典美的色彩。中国历代的诗人词人几乎程度不同地都有着一种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落寞情怀,他们胸怀大志,满腹经纶,渴望大展宏图,精忠报国,却又常感到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归隐山林,借酒浇愁,寄情山水、诉诸笔端等多为他们宣泄或平息心中

苦闷、寂寞、忧郁、愁苦的方式。陶渊明和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曹操和他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李白和他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复愁”、杜甫和他的“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孟浩然和他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王维和他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是中国历代文人抒发这种情感的历史。将这些情感各异的思想情怀抽象到美学意义上来看的话，那就是一种感伤、孤独和悲凉。风沙雁在他的抒情散文小品中就时常在寻找着和中国古代文人思想情感的历史共鸣。

我们还可以看见在风沙雁的散文中，他将古人的诗句直接点示在文中：这自然很容易使人进入诗词中所描绘的意境中去，并将此与散文中所描绘的意境融合在一起，类似于这样的点示，在风沙雁的散文作品中俯拾即是，它既拓展了散文作品的艺术空间，也给了读者更多的艺术想像，从而丰富了散文意境的创造。如果说这样的点示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不失为一种古典美的话，那么它也是构成风沙雁散文古典美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构成风沙雁散文古典美最独特的大概要数他独创的“心造意境”了。用他的话说，“在物质生活丰足，而精神生活贫乏的时代，深恐前路无知己的人有时是得自己营造个精神休憩所的”。“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营造的一个幻境，透过幻境看人生，正是人生活下去的勇敢的来源。艺术更是从幻境中呈现出来的，富有作家美丽想像的世界的具体化。”“……现实中宁静幻境或许不易找，心造恬静意境却是我们可以努力追寻的。”（《心造意境》）中国的古典诗词尤为注重意境的创造，中国古代诗人词人似乎也将此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中国的散文也讲究诗的意境的创造，中国的散文家何尝不是也在努力追求着。“心造意境”——可以说是风沙雁从中国古典诗词，及他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并结合他自己的艺术实践悟出的艺术真谛。于是，一个个带着作家强烈主观感情色彩且洋溢着中国古典诗词风的意境在风沙雁的散文中被他用“心”“造”了出来，诚如作家所言：

“我既然带着主观色彩看自然，自然也就难免要染上我的思绪与感情。”（《情思》）风沙雁的足迹遍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但从他在散文中描写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景物及创造的意境上看，并没有更明显的异国风光和异国情调。这是因为“我带着唐诗宋词元曲看自然，自然都涂上诗、词、曲的意境美”（《情思》）。一切都被风沙雁“中国化”了。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无须多说，就是风沙雁生长、生活的新加坡的自然风光也被他着上了一层中国古典“诗、词、曲的意境美”的色彩，甚至连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自然景物也是这样。

“我在青少年时代颇读过一些诗词，脑中藏着不少诗词中的美妙大自然意境，每次远游总能把脑中意境投射到眼前的自然景物上去，从而使眼前景色更为多姿多彩。我游日本的岚山，中国桂林的漓江，能特别感受到山川之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诗词意境的提示。”（《诗词欣赏》）风沙雁观赏大自然的时候是这样，在描绘大自然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略有不同的是，他在散文创作的时候，是将从大自然中感受到的诗词意境再反射到作品中的景物描写上，用“心”“造”出一个更新的意境。从而使他的散文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古典美的色彩，这不能不说是风沙雁散文艺术的一大特征。

不过，坦白地说，风沙雁的抒情散文小品在意境的开掘上尚有明显的不足，那就是意境开掘不够，总让人感到言犹未尽，读者常常无法完全跟着他的笔端进入到他所营造的意境中去，往往是刚要进入佳境，随即又被他过于理性的议论带了出来。风沙雁过于清醒，过于理智了些，大概这跟他更多地受到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深刻影响有关，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散文古典美更完美的构成，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文化关怀——抒发出浓浓的现代情

说风沙雁的散文小品更多地洋溢着悠悠的古典美，文艺评论，政论杂文则更多地抒发了浓浓的现代情，并非认为风沙雁的

散文中的“古典美”和“现代情”是彼此刈裂的两个世界，它们虽然在不同的散文形式上有所侧重，但它们却是比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风沙雁对中华传统文化、文学的自觉认同以及表示出的关注和关怀就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风沙雁在他的散文中抒发的现代情同样具有某种传统文化历史的继承性。他在那些抒情散文小品中透露出的伤感、孤独、悲凉既表现为一种古典美，同时也不失为一种现代情。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忧患意识的传统美德在一个全新时代的历史延续，只不过在具体的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时代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于：风沙雁在抒情散文小品中抒写的伤感、孤独、悲凉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自觉认同；但更多地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上；而他在文艺评论、政治杂文中直抒胸臆，大声疾呼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注与关怀则更多了一层理性的思考。

早在80年代初，风沙雁告别了他暂居日本5年的生活回到了自己出生地新加坡，他很快就发现了新加坡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翻读《风沙雁文集》可以看到他所关注的问题几乎遍及新加坡当代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政治、思想、历史、科技、经济、教育、文化艺术，环境，旅游等等，所有这些领域的问题都被风沙雁置于时代的文化的大背景之下。风沙雁似乎戴着一副涂染着文化色彩的眼镜在观察、审视着当代新加坡变化万千的社会生活。不过他更集中关注的是华族母语与华文文学的现状和未来，而贯穿其中不变的依然是中国文人传统的深深忧患。风沙雁清楚地知道，新加坡是一个以华族移民为主要人口成分的特殊国家，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是中华文化形成了这个国度的母族文化，也同样是历史的原因，这一母族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日趋式微，华语水平日益降低。“民族和文化，有时困扰得我无法解脱，……。”（《秋意秋意诗情诗情》）。

当然，风沙雁散文中的现代情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他积极地思考、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上。风沙雁的思考和探索是多方

位、多角度的。

要振兴华族文化、发展华文文学，涉及到诸多方面的问题。华文文艺前途如何？“此中关键，与有关当局的提倡与否，颇有关系。”（《我国华文文艺有前途吗？》）风沙雁将“当局的提倡与否”当作“此中关键”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的确，倘若没有“有关当局”的重视，给华文文艺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空间，那么华文文艺的发展、繁荣委实是一句空话。这是其一。

其二，振兴华族文化，发展华文文学，还有赖于华文文艺工作者本身的努力。对此，风沙雁认为：“作为现代写作人，我们真的应该有宽阔的胸怀才好，多关心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前途，这绝不是口号……”（《序（六月）》）如果说这是从思想上提出的要求的话，那么在创作上“华文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提高本身的创作水平为首要任务……”（《我国华文文艺有前途吗？》）至于如何提高本身的创作水平，风沙雁认为：“华文文艺只有在借鉴外国好作品的高超写作技巧后，才能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华文文艺工作者应该大团结》）当然还不止这些，但风沙雁明确了华文文艺工作者自身努力的重要性。

其三，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吸取养料。风沙雁总是将文化、文学、语言文字三位一体结合在一起思考问题的。他提出：“要使新华文学蓬勃发展，则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吸取养料，是必不可少或缺的一条途径……”（《日本文化·中国书画·新华文学》）同时也是结合了自己的学习经验，感受和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无须多言，风沙雁个人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他的文学创作成果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他批评“某些以扭曲文字为荣的年轻写作者”，教导他们“即使没能力或及时好好修读古典文学，也应该好好精读五四以来的上乘白话文作品”。（《巧妙的构思》）

其四，重视华语华文这一重要基础的学习。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风沙雁则将其辐射到当代新加坡的学校教育及年轻一代身

上并提高到一个十分高的高度来加以阐释。这是因为他看到了文字、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字不只与文化息息相关，而且文字是促进一个民族前进的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因素。……没有了文字，就等于没有了一切”（《春到河畔芳踪何处》）。至于学校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学生的功课太繁重，学生华文文艺水准低落，风沙雁大声疾呼：教育要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其中就有：学校应“真正拨出一些时间让学生阅读课外书”（《读书风气》）。“提高阅读华文的能力途径有二；第一是在学校中尽可能增多华文的教学时间……第二是……合办一份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包括文史知识在内的综合性杂志。”（〈探讨华文文学的发展途径〉）如何“才能达到以最少学习时间掌握最多华文的目标”？风沙雁认为必须以民族文化精华的观点来编纂课本……（《文艺前途不太黯淡》）从学校教育中的课堂教学、课外学习、教材编纂，风沙雁的思考和探索可谓是精细入微。

最后还应特别一提的是，风沙雁的这些文艺评论，政论杂文，以及一些随感式的散文作品也不乏古典美的色彩，在这些作品中，看似信手拈来的古人、古事、古诗词句，实为这些散文作品的古典美增色不少。

在新加坡，有风沙雁这样一位执著与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华文化表示如此巨大的关怀的华文作家是十分有幸的，他始终固守着他的“精神家园”，用他的笔将古典美和现代情和谐交融在一起，为新加坡的现代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乐观地坚信：“用华文写作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他们不用担忧将来华文的前途如何，华文文学很可能被英文文学取代，但这正如宋词被元曲取代一样，华文文学并不会因此丧失它的时代价值。”（《不是为了永恒，而是为了记忆》）相信在即将来的21世纪，新加坡在国家兴旺，经济腾飞的同时，华族文化也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新华文学也将会出现比春天更美好的景象，华文这不朽的语种也将会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代代相传。这是风沙雁先生祈盼的，也是每一个海外华人，每一个中国人所祈盼的。

风沙雁的精神家园

· 周任雄 ·

“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新加坡华文作家风沙雁在《闲思集·精神家园不可丢》中的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文理想，也道出了他创作生涯的精神内核。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风沙雁在他的作品中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建立在悠远博大的华族文化传统上，建立在华族知识分子自觉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上。

风沙雁是一个创作颇丰的作家，“年少才高”时曾写过诗，主要成就在散文，已结集出版的有：《砂砾集》（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4）、《矛盾集》（洪炉文化企业公司，1976）、《樱花飘落时节》（风云出版社，1982）、《枫叶初红忆扶桑》、《文艺絮语集》（中外翻译书业社，1992）、《哀思集》（中外翻译书业社，1993）、《遥看樱都》、《绿窗花影录》、《十年政论集》、《闲思集》等。最近由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编辑、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风沙雁文集》是他数十年创作生涯的总结与巡礼。从创作内容上看，风沙雁的散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写景抒情散文，一类是随笔政论文。这两类散文分别集中体现了风沙雁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而这两方面就构成了风沙雁独立而完整的精神家园。

勃兰兑斯曾说过，文学作品不外是作家的自传。每个作家

的创作都是和他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风沙雁也不例外，他曾说过“文章是痛定思痛的产物，写作者写他过去所经历的经验与生活，那是毫不足怪的。”（《闲思集·隐忧》）风沙雁从小就偏爱大自然，并且培养了自己鉴赏大自然的能力（参见《枫叶初红忆扶桑·大自然情趣》）。在他看来“人是不能脱离大自然而活着的”，而且“传统的知识分子偏爱大自然”（《枫叶初红忆扶桑·都市的美》）。正因为如此，使他善于从大自然中去发现美、表现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虫一鸟都成了他笔下不可或缺的意象。风沙雁曾作为新加坡驻日大使馆工作人员在东瀛工作五年，使他有对日本有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日本的庙宇神社，山水人物，风土人情，鸟叫蝉鸣，春的樱花，秋的红叶，冬的白雪……都自然地注入他的笔端。

日本的自然景物为什么会对风沙雁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呢？他自己的回答是：“也许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似吧”（《枫叶初红忆扶桑·鬓白异乡又何憾》），“……这异乡的景物曾使我为之沉醉。每回到东京我总情不自禁要在扶桑逗留几天……”。东瀛浓郁的文化气息，正适合于这位文人气质相当浓重的华文作家。然而，东瀛五年却又不免使风沙雁产生游子飘泊的辛酸感，使他深深体味到失去了文化之根后的悲哀，而这种乡愁乡思，使他产生苍凉落寞的心情。“我们谈到飘泊异乡的落寞情怀来，那不好受的滋味，我曾亲身体验过，在异乡的心态，真有点乘风归去的孤清感，凄凉而又飘渺。”（《闲思集·开朗》）“作客异乡……真按捺不住那股苍凉感的袭击”（《枫叶初红忆扶桑·故居公园的情调》）。一切景语皆情语，作家的体验、感受、思想、情感总不免要投射到景物上，打上自己感情色彩的印记。因此，在风沙雁笔下，东瀛的自然景物都显得那么古雅、朦胧、苍凉、凄清：阴霾的天空，昏黄的街灯，幽静的小路，朦胧的薄暮，秋的凄凉，冬的肃杀，雨后氤氲，落日溶溶……这一切都显得如此孤冷凄清，读之使人觉得如孤立寒风中，产生人生如梦空留余恨的悲凉心境，在半醉的朦胧里寄托淡淡的哀思。

“日本是个非常有情调的国家。日本的情调可以凄清之美四个字概括之。”（《枫叶初红忆扶桑·不是乡愁只是缅怀》）在风沙雁的抒情散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凄清之美是一种意境，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风格，更是风沙雁审美理想的具体体现。

为什么风沙雁笔下的景物竟会这样孤冷凄清呢？这其中自有其深深的文化根源。作为一个传统的华族知识分子，他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染熏陶：“中华文化给予我多愁善感的特质，使我能欣赏自然中每一个美的境界”（《哀思集·沉重的记忆》），
“我带着唐诗宋词元曲看自然，自然都打上诗词的意境美”（《哀思集·情思》）。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散曲，培养了风沙雁感时悲物，触景伤情的诗人情怀。在日本的秋怨乡思，一齐袭来，作家不免怆然而涕下，以苍凉的心境去看这异域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切都显得如此凄惋迷，苍凉凄清。风沙雁的抒情散文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凄清之美，使他的作品都笼罩在凄清的氛围之中。

从日本回到新加坡后，作家的凄凉心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他痛苦地看到，新加坡的物质建设搞上去了，可是文化建设却远远落后，作为一个对文化极度重视的知识分子，风沙雁深感失望。在日本时，他曾是那样强烈地思念着祖国，可是一回到新加坡，当他看到这文化沙漠后，对异乡又产生了企羡的心情，使他不自觉地回忆起东瀛的樱花，江南的水乡。“我对故乡的薄暮的感受，竟然是一如异乡的那么苍凉。日本的冬的薄暮给我予苍凉感，如果是乡愁与异族文化的挑逗；那故乡薄暮给我予苍凉感，却是因本族文化没落而来的悲伤”（《枫叶初红忆扶桑·薄暮的苍凉》）。在作家看来，“景物的吸引人，其实是文化附着的关系”（《枫叶初红忆扶桑·给桃女的信》）。而一切缺少文化气息的景物都会显得那么单薄、枯燥，没有一点诗情画意。新加坡虽然素有“花园城市”之称，这儿气候适宜，风景如画，每年都能吸引大量游客，可是在风沙雁笔下这儿只有赤道的炎热，令人烦躁的蛙鸣。那婆婆的椰影，婀娜的椰叶，多姿的香蕉树，袅

袅的炊烟，甚至小溪流水，鲜花野草，这一切都不见了。他只能在细雨中独自登上山岗去咀嚼寂寞空虚的滋味，或是去欣赏落叶带来的一丝悲凉，或是闲坐海滨听海水轻吻沙滩的窃窃私语，或是在回忆中重现云南园四年的大学生活，或是在梦里去重游杏花春雨的江南水乡，或是在幻想中去欣赏京都樱花的花满枝头，或是到古典诗词中去寻求自己的精神寄托：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逍遥，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悲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风沙雁只能“借大自然的美来忘掉现实中的丑恶与不满”（《哀思集·为人间留下一点美》），而这种大自然的美却只有在异乡，只有在梦中，只有在古典诗词里才存在。

在日本时，因深感失落了自己的文化之根，飘泊异乡，心情凄清，景物也凄清；回新加坡后，深感真正失去了文化之根，眼前有景道不得，景物凄清，心情更是凄清。中国知识分子多愁善感的独特气质、使风沙雁进亦忧退亦忧。个人心境，文中情景、无不凄清。这种凄清之美就是风沙雁独特的审美情趣所在，也是风沙雁独特的审美理想。

二

“人生在世，除了温饱，就是开拓更高的精神生活。”（《枫叶初红忆扶桑·衣带渐宽终不悔》）风沙雁与传统的华族知识分子一样，视文学为神圣而高尚的事业，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审美追求，自我完善人格的实现，以及对彼岸世界的理想追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理想，这是风沙雁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作为精神个体的人，不仅仅生活在纯粹的精神领域之中，还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现实之中，作家的创作也必然要关怀社会现实，反映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因此，在风沙雁看来“文学的社会功能毋庸置疑”，“写作人首先要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有爱心的人，具备这样的条件，才有可能写出不朽的作品。”（《绿窗花影录·别称他为诗人》）风沙雁并不是那种只将

自己封闭在窄窄的文学象牙塔中的人。他感觉敏锐，目光犀利，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往往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他继承了华族知识分子深深的社会忧患意识。而正因为这种忧患意识，风沙雁对他的祖国新加坡的建设，特别是精神文化建设，具有知识分子特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忧患意识贯穿于风沙雁随笔政论文的始终，也是风沙雁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

新加坡是个年轻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一直采取双语教育政策，华文与英文均是母语，可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华语日渐式微，一些华族移民的后代，甚至连华语都不会说了，不难想象一个失去了自己母语与自己“文化之根”的民族应有的忧虑！华语都快要消亡了，华文又能存在多久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新加坡华文文学举步维艰，惨淡经营，这对于一个华族知识分子来说，是何等伤心！

面对新加坡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风沙雁更显得忧心忡忡，他说“民族与文化，有时困扰得我无法解脱。”（《枫叶初红忆扶桑·秋意秋意/诗情诗情》）物质建设发展了，文化建设却衰落了，得乎？失乎？在经济日益发展的新加坡，金钱物欲的追求而外，文化文明又算得了什么？在这醉生梦死的时代，还谈什么民族文化呢？风沙雁不免要愤激了：“人生毕竟短促，与其苦口婆心劝导别人爱护母族文化，有时不妨冷眼看他们去摒弃自己民族的文化精华，这不更逍遥吗？”（《哀思集·晚来风雨骤能饮一杯否？》）可是愤激毕竟是愤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愤激之后，风沙雁还得干自己的事业。他说“我又是很不甘愿追求虚无飘渺的事物的人。我宁可在有生之年踏踏实实做点事，待到那一天自己油尽灯灭时，我只希望自己尚未完成的工作，有人继续搞下去，这样我就会有自己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感受。因为有这样的傻念头，我以为搞文化才是生命永恒之道。”（《绿窗花影录·看破红尘》）因此，为了文化建设事业，风沙雁借助手中的

笔不断奔走呼号，他在随笔政论文中对双语政策，语文学习，学校自主，教学成效，儒家思想，教育改革都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希望通过他的努力使华族文化精华得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新加坡华人参与华语华文的建设事业，让这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下去。他希望新加坡华文文学能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去吸取养料，壮大力量，然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风沙雁幻想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明去拯救这日渐式微的文化，他希望在新加坡播种“十颗种子”，“种子发芽成长，会长出一棵忧国忧民的范仲淹，一棵为民歌唱的杜甫，一棵笑傲江湖的李白，一棵浔阳江头哀唱的白居易，一棵长河落日圆的王维，一棵把酒问青天的苏东坡，一棵气吞万里如虎的辛弃疾，一棵雁过也最伤心的李清照，一棵断肠人在天涯的马致远，还有一棵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都不要紧，只要是树，能供人避暑的树林，我们对种子就有期望。”（《哀思集·十颗种子》）有火在，希望是不灭的，但愿风沙雁的幻想能实现，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新加坡华文文学就会有欣欣向荣繁花似锦的局面出现！

风沙雁的目光远没有停留在文学这一领域，他对艺术、哲学、美术、汉字、书法、新闻、广播电视、报章评论、宗乡会馆、文化团体等等凡是与文化有关的课题都非常关心，他往往能以短小精悍的文字，发表独到而新颖的见解。在风沙雁看来，新加坡文化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努力建设才有希望，同时也需要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力量的努力参与才会有希望。风沙雁理想中的新加坡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社会，是一个物质建设、文化建设并举，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并重的理想社会。风沙雁，这位具有如此深广的忧患意识的作家，是现代新加坡文化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骄傲。

在文化关怀文化忧患意识而外，风沙雁还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独特的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在风沙雁看来：“作家的任务，原本就在揭露社会的病态，并不是在贫困的社会中才有的，富裕的社会也自有其缺憾，如何通过形象的描写，来达致唤醒人

们注意社会弊病，并加以改善，这是作家的责任所在。”（《十年政论文选·作家与思想认识》）正因为如此，风沙雁在他的政论文中希望正确解决好种族问题，贫民问题，都市化问题，人口结构问题等一切社会问题，以树立国家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培养力争上游的精神，把新加坡的各项建设事业搞上去。他希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是以风沙雁为代表的新加坡一代华族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理想社会。

审美是一个世界，现实是一个世界，风沙雁在这两个世界中寻找共同的精神生活的家园。一种凄美的诗境，一种悠古深邃的文化传统，一种优雅健康的社会秩序，这是人类的乐园与作家真诚的理想。感谢他吧，让我们感谢风沙雁，因为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为我们保留了华族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美好的梦幻，让我们在冷落与式微中，重新看到希望。



辑三

反思精神家园
远景期



《樱花飘落时节》序

· 舒巷城 ·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间，收到朋友寄来风沙雁的诗与散文合集——《砂砾集》，读后留下颇深的印象，次年年初，因事经新加坡，通过友人的介绍，与他见面了。但当时怎样也料不到，后来竟先后有几次的机会，在日本、香港，与他相聚长谈；当然，比起五、六年漫长的岁月来，那段所谓“相聚长谈”的日子还是很短的。但想到人生中这样的机缘，实在得之不易，也就觉得很不错了。多少人为了生活天各一方，纵然彼此神交，却终生也未曾见过一次面呢。因此，各为衣食忙的我们，每一次相逢，谈文论艺而旁及其它时，在辛酸的生活里，自有一种喜悦之感了。

以个人所见，年轻的朋友风沙雁，是率直却又深懂世情的，他健谈、风趣，是性情中人；他对事物敏感而又善感，热情之中却又往往喜欢思考人生的问题，这样，加上早年经历过坎坷的生活，便形成了性格的另一面——爽朗之中，略带忧郁。若说文如其人，那么，他的作品里那种特殊的抒情风格，是来自他本人的特殊气质了。

最近翻阅他客居日本期间和返新以后发表的那些随笔、散文(剪稿)，倍感亲切，不禁回想起与他在东京、神户……一杯在手，灯下畅谈的那些夜晚。我分享他的快乐，也了解他的忧愁——尤其当时“夜阑人静，身在五千多公里外”那份沉重的乡愁。

而另一方面，正因为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见闻丰富，而且

对当地的人事观察入微，所以上述的作品中就有许多引人入胜之处了。他的文笔优美，写景、状物，常常带来一定的气氛，抒情之中，却又往往有耐人寻味的幽默。例如——

《东京铁塔下的乌鸦》：二月，梅吐芬芳，他所讨厌的乌鸦却“撩破幽美。四月，樱花盛放，……哇哇来破坏气氛。而当“红叶艳艳”时，他这样写：“那一份秋的薄薄的宁静，硬是给乌鸦的哇哇撕破了。……”

《落樱时节游庭园》：他说“游日本的庭园”，最好有点“鉴赏力”，不然，“……就会象刘姥姥入大观园，误把潇湘馆的竹丛当作炊饭用的柴的。”

至于文集中其他的特点呢，还是由读者们（“坐游”作者笔下的扶桑时）亲自去“发现”吧。这里，我不再饶舌了。

舒巷城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写于香港

读风沙雁的《樱花飘落时节》

· 邓 弼 ·

光看书名和封面设计，就给人一种印象，这是一本偏向於软性书。

书的内容分成四部份，第一部份的《东京寄简》，是抒情与说理兼而有之的。且往往是采用三文治的写作方式，抒情的文字在上下，中间夹了一些理论。我很喜欢作为面包的这段文字，

“冬天的月亮似乎很凄冷，尤其在冷风飕飕的夜晚，一个人在黄晕晕的路灯下走路，更觉得月光如霜。那晚我独自去观赏日本民族舞蹈晚会，归来时沿着一条冷僻的小路走着，四周尽是枝亚孤零的树，那天隅却挂着一弯孤舟似的上弦月，陪伴着几颗冷星，心中顿然有一种苍凉之感。”像这么好的文字，全书中可以找到多处。有些文字倒不怎么好，它有瑕疵，有时是一两个句子安排得不大妥当，或者是有一两个词在用法上还不曾被普通地接受。但是作者所描写的景，所抒发的情，所营造出来的意境和气氛，却十分美丽，十分真切，十分感人。所以你会被它们所吸引，一篇接一篇地看下去。

第二部份的《异乡夜思》，特点是对话比较多。我认为其中有几篇如《怎么办》、《深造去》等，题目拟得不够贴切。那样的内容，应该有更好的题目的。说到题目，我也不喜欢第三部份《扶桑生活情趣》中的《七夕在异乡》，我认为异乡的名字必须说清楚。同样的，第四部份《扶桑忆旧》中的《那条长街》，前面便非补上“东京”二字不可。另外一篇《东京的电影》，也应

该改成《东京的电影院》，因为文中谈电影院的，比谈电影的文字多。

在许多时候，喜欢的只是某些篇章中的某些段落，但是觉得整篇都写得出色的，是《秋的银座的书摊》这一篇。作者这样写银座：“设计古雅的路灯散发着淡淡的光，偶尔有人力车拉着艺妓的车轮滚动声，在小巷泛起，给人一种十九世纪末叶明治维新伊始时代的邈远感，但银座的情调也不单单在夜晚才浓，秋的周末的银座，那纵横都半里长的“步行者天国”，一辆车都没有的景象，就很有情调。

毫无目的和游人在颇为肃杀的秋风里走，就是一种很好的享受。掩映在满树黄叶下的那一摊摊的书摊，有清雅而秀丽的封面设计的书，在蓝空下的黄叶的映照里，显得特别醒目。在这样的气氛里，你要不想停下来翻翻书，买一本回去，实在是件难事。”从这一段文字里，可以看出作者捕捉影像捕捉意境的能力是很强的。

一般的游记文字，都是在走马看花之后，匆匆写成的，所以在观察上，有时难免不够深刻。但作者在东京居留五年，他对周围的一切，早已了如指掌，下笔为文，当然非同凡响了。总的来说，读这本书，而要不陶醉在他所描绘的景致里、气氛里，也“实在是件难事”。

令人感慨系之的《樱花飘落时节》

· 阿 伦 ·

如果你曾经在日本居住过一个时期的话，相信你就会对日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只有在生活上互相连系与接触，方能进一步了解日本人的心思意念，处世待人。

你不禁会这么想。

日本，是真的那么美好吗？

在细心阅读《樱花飘落时节》的时候，心里起了一阵一阵的激荡。那种感触，那种共鸣，是一般外地人写有关日本小品所难以表达的。

在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意识，除了作者本身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以外，也具有日本人独有的凄清美；那么的消极，那么的无奈。

就说《那条长街》短文里，与一位飘泊美国留学生的偶遇，互吐心声，到了第二年秋天重返日本，在作者的大门留下一张纸条……

“……从外面回来时，赫然发现家门口贴着一张小纸条，在晚风中颤抖……”

看起来只是简简单单的文字组合。然而，“在晚风中颤抖”的凄凉意境是只有在那一种环境，在那一种时刻才会有那一种令人心酸的感触。

并不是要称赞，还是什么的。

会对这一本书产生特殊的感情，是在於它写出了我在日本旅居所见所闻的感受。

当时是住在目黑区，并不是走马看花的游客会到的地方。

在看到一些日本人是那么的缺少爱心甚至自私到令人惊讶以外，简直难以相信到底是应该怎么去适应这一种环境的。

作者在《我在日本的感受》提到他的日本同事丢失了五千日圆公款，竟然没有一位同事愿意帮忙，作者愤然的写“……我敢说东京的日本市民是缺乏互助心与同情心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社会制度造成的。”

“日本是一个高等竞争的社会，日本儿童从小就竞争着进入有名的小学、中学，大学，进入有名的大学就等于前途有了保障……在社会做事，又和同事们竞争，所争的又是个人的利益，在这种一生只为个人的利益而与人竞争的社会里生活，人必然会产生冷淡，无情，自私的概念。……”

我们在大众传播媒介所接触到的，都是美好的一面。

并不是说故意要去接触所看不到的另一面，而是要进一步去了解，这是由广泛全面性才会有客观的看法。

在《东京街头速写二题》，《我所看到的她们》，《东京街头见闻》，《梅花树》以及《东京的烧鸟》里，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一位文盲的卖报老婆婆在冬夜的街头卖报纸——

“……她还枯坐着，在繁华东京的一角。”

我们看到卖杂食的老伯伯——“……他的三轮车上的那盏小汽灯，昏黄且暗淡，映得他原本就有点渍黄的衣服显得更加脏了。”

我们看到一位收垃圾的老太婆——“……她的背驼得近乎九十度了……她是个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可怜人……”

我们看到了在百货公司的电梯小姐她们重复又重复的欢迎乘客，介绍每一层楼的货色——“……这是礼貌吗？与其说是礼

貌，不如说是资本家对她们的一种高明的虐待？这大概就是所谓日本的繁荣吧！”

我们看到号称为“老人天国”的日本，却难见优待老人的公园名胜有老人参观——“倒是在北风呼呼的严冬里，我在街头常看到瑟缩成一团的老人，在等待接受那一点点可能有的生意。”

我们看到——“现在的日本青年男女，多半崇美，美国人有什么就学什么，一天到晚就是“亚美利加”……

我们看到烧鸟店是平民的去所，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那里吃串烧喝酒——“……是观察日本平民生活的场所，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在这里看到……泼妇骂街的，自我嘲解的，自我阿Q一番的……白天在办公室里受了上司的鸟气……喝酒时，就放了出来。趁着几分酒意……破口大骂，骂得不够……在横街窄巷泡把尿，把鸟气放出来……”

说真的，《樱花飘落时节》并不是一本游记。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一点也不开朗。

闭上眼睛，难以抑制，让自己的思潮奔驰在樱花，枫叶，白雪交织之中。

在这美好的大自然景色里，那些令人怀念的人又一一出现在眼前，恍恍惚惚，遥不可及。

这，就是《樱花飘落时节》所带来的感触了。

我看《樱花飘落时节》

· 英 造 ·

《樱花飘落时节》是一本印刷精美的书。封面设计使人以为这是一本介绍日本的旅游书，其实这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作者旅居日本五年，写下的感怀抒情的散文随笔。

一个离乡背井的人，尤其是一个智识份子；感触上所郁结的，那一股沉重的乡愁，字里行间很自然的流露出来。

客居的异乡景物、人事、生活，总是从各方面触动着作者的思绪。从〈东京寄简〉的数篇散文，可以看到作者内心乡愁的反映。例如：

“归来时沿着一条冷僻的小路走着，四周尽是枝桠孤零的树，那天隅却斜挂着一弯孤舟似的上弦月陪伴着几颗冷星，心中顿然有一种怆凉之感。《异乡的夜》。

“窗外的北风还在呼呼地吹，伴和着深夜叫卖烧番薯的小贩的声响，越发使我想起远离了的故乡亲人朋友。《风雪夜里看芭蕾》。

“透过玻璃窗遥望长崎港湾，在海岸边，在山顶上，万家灯火闪闪熠熠似万点明星，真教我想起夜的星洲海港来……”《山青水绿的长崎》。

可是，作者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波动，并不只限于离愁别绪这一类文人墨客情怀，而是借景抒情。通过一定的环境的描写，以它特有的色彩，抒发作者的艺术观和对人生的评价。这些见解清楚的写在文章里。

例如：

“纯然为保存古典艺术而保存艺术，一定是单调的，乏味的，没有意义的。”这是作者在《异乡的夜》中对民族舞蹈晚会的评论。

这种在纯艺术上更加多了色情成分的所谓舞蹈，的确不是广大的劳苦群众所众所能接受，所能欢迎的。”《风雪夜里看芭蕾》

“台湾镇平这幅油画不但故意歪曲了史实，把台湾老少男女描绘成俯首贴耳，……把强蛮占领人家的领土的丑劣行为美化为镇平。”《春雨初晴游外苑》

“上野公园排列在路两旁的樱花，纯然是雪白的，盛开时，远远望去，云海一片。”

“这只是经济条件较好的日本人才有这样的闲情与雅致来赏樱花，普通的贫困的日本人是绝少来的，高昂的生活费，把普通的市民搞得透不过气来。”《四月樱花处处开》。

“东京的日本市民是缺乏互助心与同情心的。”《我在日本的感受》

以上所括录的部份内容，读者可以看到作者的特殊性抒情风格，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手法。

作者在《异乡夜思》这组散文里，更进一步的抒发了他的思想感情，客居异乡的经验。例如：

“人若没有参予感，便很难有生活下去的乐趣。”《参予感》

“这凄冷的火车站，只见满地的纸屑，还有那一群神情茫然的人们了。”《怎么办》。这种印象令人深思，尤其是当我们向日本学习时。

接下来我要谈到的是，《扶桑生活情趣》和《扶桑忆旧》这两组散文。

这两组散文给我的印象是文字的优美抒情，可是那种刚到日本时，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却被掩盖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扶桑生

活的各种情趣，如“啤酒花园”的情调，“大小餐馆都是诗”，“樱花时节游庭园”的朦胧的美景，“横滨中华街的周日或节日的黄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你即使漫无目的地跟着人群走，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七夕在异乡，黄昏来了，晚风吹散了仲夏的晨热，夕阳的余晖和灯笼散发的光映成一片，这样酝酿出的朦胧诗情，真教人有种凄清的美感。

“那令人神往的雪花”，还有“长崎下着缠绵的雨”，这数篇散文的题目，已经是一种美的选择，可是我总认为，这是一种失落感，离家多年的一种更深沉的苦痛，藉景物良辰以慰藉创痛的心灵，也许就是一种徬徨苦闷的象征。

至於《扶桑忆旧》的一组文字，既然是一种生活的回忆，已经离开了那个客居的环境，相隔一段时日，自然显得明朗些，因而民情风俗的趣味性较突出。

最后我要谈到的，是风沙雁内人所写的三篇散文。这三篇散文清新浅白的笔触，迥异风沙雁的优美抒情的风格。可是，比较上我会喜欢这三篇散文所接触到的生活面。

《我所看的她们》，首先描写一个“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可怜人”，在垃圾堆里捡瓶子，收集旧报纸。其次描写在电梯里招呼顾客的少女。文章是这样描写的：“电梯门又开了，那位招呼客人的又跑了出去，但没顾客出去，她又跑了进来，电梯门又关上了。就这样地开门、关门、跑出，跑进地，公式化地工作着，她俩之间也甚少说话，大概她俩背着那没半点感情的公式也念得口舌都酸软干燥了。”

这种揭露，反映了日本繁荣的阴暗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补充了风沙雁在这本集子里的不足。虽然风沙雁在《东京街头速写二题》及《东京街头所见》等文章里，也有谈到有关问题，不过那只是一种报导式的速描，缺乏形象性的刻画。

在《金木屋》和《梅花树》这两篇文章里，作者通过和日本平民的日常生活的接触，寄托着一种高贵的思想感情。写这三篇

文章的作者，非常可惜没有看到她的名字。

正如舒巷城序言中所说的：“风沙雁的作品里那种殊的抒情风格，是来自他本人的特殊气质。”



携扶桑风物入画册

——读风沙雁的《樱花飘落时节》

· 蓝 端 ·

雁掠风沙，扶桑风物入画册；
花落时节，沽酒时在那人家？

风沙雁是一位诗人，再加上年纪不大，所以，《樱花飘落时节》一书给人的感受是，散文的形式，诗的感情与意境。文字优美清新自不在话下，叫人欣赏的还有作者那特殊性格在文章里的映现，这就是舒巷城先生所说的率真与世故，爽朗与忧郁。

这篇读后感，我尝试从字面上去推测风沙雁初到日本，定居期间及返新后的情绪变化。

日本，这个在气候与风土人情跟我们迥然不同的国土，作者初履斯土，当然有不少感慨。故他所要给故乡友人反映的不单是淡淡的乡思；更重要的是，以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炽热的感情，去探索日本民族的习性，去反映日本人民的生活，去寻找日本社会的结构。

在风沙雁笔下，有些日本人是叫人心寒的。作者到东京工作不久，在办公厅里，他的一位同事不小心丢失五千日圆。基於这

位职员平日诚实，所以，作者热烈的希望发动其他日本职员每人各捐两百日圆，可是：

这回我失败，有些日本职员说当事者自己不小心，应该自负其责；有的说谁能确实知道当事者是否真的丢失了五千日圆，还是放进他自己的荷包里；有的沉吟不语，脸露不情愿之色；结果是我和当事者分担了这款项。

——《我在日本的感受》

这种情形是叫人颤抖的。不是吗？同事有困难，互相帮助，在新加坡是很平常的事，何必脸露不豫之色呢！在同一篇章里，也有不少事情叫人感到失望的：在等火车时，日本人虽循规蹈矩地排队，可是，车一来了，却不顾一切，你推我挤——即使你是女人。周末周日，巴士、火车拥挤，但坐在座位上看报或打盹的日本市民，对背着孩子的妇女，或背着包袱又抱孩子的中年人，却视若无睹，不肯让位。

这种冷然漠然的态度，是怎样造成的呢？我们且看作者怎么说：

日本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日本儿童从小就竞争着进入有名的小学、中学、大学，进入有名的大学就等于前途有了保障。学校出来后在社会做事，又和同事们竞争，所争的又是个人的利益……

为个人利益而竞争，久了不产生冷漠、无情、自私的观念那才怪呢！日本人缺乏同情心互助心，正如作者所说的，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很可惜，风沙雁答应给我们谈谈一些好人好事，结果却不了了之。——人间，到底还是充满温暖呀！

日本的生活水平很高，通货膨胀率更是怕人。物价不涨则已，一涨至少是三十、五十甚至一百巴仙。而薪水的增加呢？却只有十巴仙左右。生活的压力，并不是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及高楼大厦所能掩盖的。试看作者笔下的日本下层人民吧：

刮风也好，下雨也好，就是在这条商店街上，我们的卖杂食的老伯伯总站在那把大布伞下，细眯着眼睛，看着那从大盘子

上升着的水蒸气，夜里，他的三轮车上的那盏小汽灯，昏黄且暗淡，映得他原本就有点油渍黄的衣服显得更肮脏了。

——《东京街头速写二题》

她脸上似乎有过刹那间的喜悦，站起身子来，这时我才发现到她的背驼得近乎九十度了，一阵凉意不觉由心头涌起；她是个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可怜人。

——《我所见到的她们》

看到两叠绑得紧紧的旧报纸，老拾荒者就脸露喜色，这叫人诧异。作者的“一阵凉意不觉由心头涌起”，是不是多少打碎东渡之前的憧憬？而那个卖杂食的老伯，“有时有一位年龄与他相仿的老人来站在摊旁与他闲聊，那时他的脸就会有些笑意”。读了更是叫人心酸！这心酸何由来，作者不愿点出，写介绍文章的又何必多咀呢。到底，读者是聪明的！

还有，百货公司里电梯内的操纵女郎，一楼还一楼，一天复一天的重复着那枯燥无味的语言，读了直叫人心悲。这是所谓的礼貌吗？作者愤慨的下了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是礼貌，不如说是资本家对她们的一种高明的虐待。

科技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并非样样都是尽善尽美的。日本，也不是我们想像中的世外桃源——世外桃源在现实世界里是没有的——她还不是充满嫉妒、冷酷与贫穷。

二

在日本定居后的风沙雁，对异地事物，由新鲜归於平淡；表面的悸动也逐渐化为内心的空虚。这时候，固然还是反映了不少日本人民的生活情状。但，叫人感到的却只有作者那浓郁的化不开的乡愁。一九七九年，该是作者到日本的第四年。我们且看他这时期的散文创作吧：

参予感果然是不分时代与地域，人若没有参予感，便很难有生活下去的乐趣。我在东京交了不少旅日的华侨，听了不少诉说被日本社会摒弃在一旁的孤单落寞。

——《参予感》

出外工作或出外读书，千万别萌留居的念头。风沙雁在情绪波动时，也有想从此离家弃国，在外飘泊，这是大错特错。人家的社会是一种语言一种文字，长住下去，放眼皆非我族类，难免有一种精神负担，就如作者笔下那位台湾籍的朋友一样。

此刻夜阑人静，身在五千多公里外的初夏的异乡眺望远处高耸建筑物朦胧灯光，一缕乡愁又来袭。《二泉映月》由小提琴拉出的声韵凄清而婉转，一弦弦地扣住我的心，我真的能忘却故乡么？

——《生命的洗濯》

热爱故乡的人，在异地是很敏感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很有可能勾起思乡之情。假如说生命洗濯后会活跃，那故乡之情也可以洗濯。然而，洗濯后的故乡面貌，却是更加清晰。“一个人只有在保有故乡的前提下，他才有可能去计划一切工作的内容”。这真是风沙雁的肺腑之言。

仲夏的黄昏，苍茫的暮色就象柳絮飞满了整个京都，夕阳独独欲隐还现在西边的那个山头，把那一角映照得黄澄澄的。……用微醉的眼睛看这略带朦胧的景色，身在异乡，不期然就想起“日暮乡关何处是，江上烟波使人愁”的诗句来。

——《啤酒花园》

景色是美到不能再美，但非故土，看了只有徒增烦恼而已。这种文字上的乡愁，固然叫人感动，但最叫人哀哀不已的还是包裹在文字中那种捉摸不定的感情。作者写山、写水；写盛夏纳凉大会的情趣；写浅草寺的灯笼；写大小餐馆的乐趣；写东京铁塔下的乌鸦……等等。表面看似优闲得很，其实骨子里却叫人感触到作者那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就如樱花的飘落——虽是美丽的，但很快就归于幻灭。“化作春泥更护花”，或者只是诗人一种理想吧了！

今年的东京的冬天颇暖和，只下三次雪，春又来得早，四月中旬，樱花已飘落完了。接着下来的月份，是绿树的世界，与故

乡景物一样，没什么好看的。十月就会有红叶，岚山的景物依然在我记忆中隐现，但孤孤单单一个人，就没再去的意思，年底冬来后，雪飘前就回乡。

风沙雁终于归来了。“人的可贵，在于不容易忘掉过去的经历，因此回来后一年内，也就涂了十多篇回忆东京那一段生活的东西”。这十多篇除了《扶桑忆旧》六篇，还有《大小餐馆都是诗》、《横滨何所恋》、《那令人神往的雪花》、《长崎下着缠绵的雨》等。

风沙雁这些忆旧怀人之作，有的写得清闲幽雅，有的写得真情毕露。风格变化有致，读了叫人不能自己。

试看：

在烟雨中前进着，蓦地在马路中间展现一长排一望无际的叶子呈心形的无名树，叶子红绿色的，但每棵树绽开的小花，却深红得像枫叶，这一系列展现在微雨中的色彩，又由这色彩与雨景酝酿出的迷蒙情调……

——《长崎下着缠绵的雨》

情调景物迷人吗？更何况“细雨纷飞中，映入你眼帘的，是路旁长十多公分许的青绿的秧苗”，偶而出现在田间淋雨的鹭鸶。其他，如写雪景，写樱花时节游庭园，写东京的长街等，都是充满诗情画意，把我们不知不觉带到东瀛扶桑。

风沙雁初到日本时所写的游记，就不能这般怡然自得，而是往往在字里行间，渗透三分乡愁。这种情绪反映在文章上，似乎有点像孟浩然与王维。他们同是唐山水诗两大家。但王诗是饱尝官场风味而功成身退后的产物，自然平淡恬然；而孟诗却是在宦海浮沈之中，屡试不第，愤而退隐的产物，诗风难免忧郁与悲感交织。情依于景，或是景托于情，是不能同日而论的。

再看：

在北风呼呼，雪花飘洒的夜，有几位朋友来了，是撑着伞来的。于是大家围在灯下吃暖炉或铁板烧。喝下几小瓶日本酒后，话题也渐渐多且投机了，窗外的雪，越下得大了。不用回去了，

在一小座煤油火炉下，大家半醉半醒着，继续那不着边际的话题。

——《那令人神往的雪花》

现在又是仲冬了，东京的气温是很低很低的，在这赤道边缘下的故乡的夜里，想起东京的冬夜，我竟感到东北风的一丝寒意，料想东京必定下过雪了。这么一想，我竟怀念起五年前在新桥火车站畔买日本红柑的情景来了。

——《东京的水果》

沉思往事，似梦里？风沙雁在写这些回忆文字，心情怎样是可想而知的。其他如在东京的咖啡店里泡咖啡，在银座的书摊流连忘返，写来皆历历在目，叫身为读者的我们低回不已！但我更欢喜作者笔下的东京烧鸟店，真的，有机会该到那个地方，与日本小职员、电车剪票员、德士司机猜拳斗酒，再趁着几分酒意，晃着身体走在横街窄巷泡把尿，把鸟气放出来。

虽然说“人的可悲，在于不能忘掉所喜爱的东西”，是有一定的道理。但人也是最善忘的动物，随着时日的飞逝，或许那份执着会逐渐模糊。那时，风沙雁再写这种回忆文字，相信在感情上会打上一个折扣。

无可否认的，风沙雁是受古典文学的熏陶至深。所以，他吸取了旧文学洗炼的笔法，简淡处，清切自然；浓密处，不盖其意。

行云流水醉卧神游 ——风沙雁的《樱花飘落时节》

· 李拾荒 ·

本书共收散文三十六篇。计“东京寄简”八篇，“异乡夜思”六篇。“扶桑生活情趣”七篇，“扶桑忆旧”六篇及随笔散文九篇。另附香港作家舒巷城序篇及作者一篇后记。这些篇章都是风沙雁客居东京五年及返新后一年之内的作品。都曾发表于本地杂志报刊。

“蓬莱文物，扶桑风采”，虽说是“感物伤时”之作。但字里行间，亦可“窥豹东瀛”，充分地表露出作者的观察入微，深懂世情，爽朗洒脱而微带忧郁，既率真又多善感的性格。

在“异乡的夜”中。作者写道：“……有时深夜做梦或被冻醒未能入眠时，梦到的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家乡、亲人、朋友。人是没有不爱自己的家乡的……。”游子心思，怀乡之情，表露无遗。在“秋的银座的书摊”一篇中。作者写道：“……为一点名利而勾心斗角的行为，是多么地无聊。人生的境界何其广阔，为短暂的名利而营钻，那多愚蠢……。”寥寥数语，道尽作者胸怀，几笔轻描淡写，犹胜千言说教。

“……尽管我是不喜欢一般的日本市民。但我尊敬日本人拥有的强烈民族自尊心，在这春寒料峭的四月初，看到一路上开满的樱花，就使我想起故乡……。”（“樱都遥寄”）

“……日本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日本儿童从小就竞争着

进入有名的小学、中学，大学。进入有名的大学就等于前途有了保障，学校出来后在社会做事，又和同事们竞争，所争的又是个人的利益。在这种一生只为个人的利益而与人竞争的社会里生活，人必然会产生冷漠，无情，自私的观念……。”（“我在日本的感觉”）

从以上引录的片言段语，风沙雁以一个异乡人的亲身体验和感受，把日本的民族性、社会现况，通过生花妙笔，毫不伪饰地道出。

纵观全书三十六篇。其文采的优美，文笔简练典雅，刻划入木三分，无论写景咏物或抒怀，如天马行空，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一卷在握，如醉卧春风，细细咀嚼，回味无穷。作者的几许唏嘘，几分落寞、彷徨、苦闷尽跃然纸上。这种欲解脱又不容易忘怀所带来的彷徨与苦闷，正像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就如眼看樱花飘落而无法挽救一样无奈。

且让我们在“醉卧神游”之余，分享作者的文采与才华和那淡淡的难以忘怀之情。

风沙雁的樱花飘落时节

· 寒 川 ·

单看书名：《樱花飘落时节》，就可知道这是一本描写日本生活的作品了！

作者风沙雁，旅居东京五年，其间，或触景生情，怀念亲朋好友；或是闲暇之际，游山玩水以及繁忙生活之中的感触与抒怀，都有其独特的见解，要较一般旅客自日本归来后所写的游记来得深刻。

大凡游记，或写景，或抒情，或写景中夹带抒情，是常见的一种。而在写景抒情之中，更参与作者对某一事物的剖析，就不常见了。无他，旅游一个地方，走马看花，随便对某一事物妄下评论，往往有欠公允，写作者都不轻意为之；因此，欲剖析某一事物，非相当了解，及有独特的见识是不容易下笔评定的。

再者，作者绝不会因为旅居异国，就盲目地推崇这个国度。对于应该赞美的，鼓励的，作者由衷地赞美与鼓励；但对于应该批评的、谴责的，作者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和谴责。

例如，在《异乡的夜》一文里，谈到日本的民族舞蹈，作者认为：“纯然为保存古典艺术而保存艺术，一定是单调的、乏味的、没什么意义的。只有从古典艺术中吸取有用的养分，来发扬民族艺术，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才会有意义的。”作者同时也指出：日本的现代生活方式已是资本主义式的，如何和古老的农业生活方式挂钩，的确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因为：带有半颓废、半疯狂的现代舞蹈，如何能和纯朴的，较有活力的古典舞蹈调和结

合呢？

又如《我在日本的感受》一文里，作者斩钉截铁地指出：“……但这些日子来，凭我在这儿生活所感受到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我敢说东京的日本市民是缺乏互助心与同情心的。”作者敢于如此断言，是有其事实根据的。

首先，作者举出一位为人诚实、待人谦恭有礼的日本同事，不小心失去了五千日圆公款，但其他日本职员却毫无互助心，认为他应自负其责。其二，则是在火车站搭地下火车上班的情形。火车未到时，日本人都很守秩序地自动排队，令人佩服他们的自律精神。但火车一来后，他们却争先恐后，你推我挤。

作者批评道：“日本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在这种一生只为个人的利益而与人竞争的社会里生活，必然会产生冷漠、无情、自私的观念。日本一般的市民缺少互助心与同情心，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

其他诸如《浅草寺》里对“歌午伎”与“能”的意见；在《深造去》里，提到和“日本商人周旋只有浪费作者的生命”；以及《春雨初晴游外苑》里，抨击目前还有日本人仍然迷恋军国主义的可惜与丑恶，都说明了作者创作态度的谨严，以及明确的辨别是非能力。

至于值得称赞的，作者也不忘予以介绍或由衷地赞美，如《秋的银座的书摊》，写日本的优良读书风气；《樱都遥寄》里，写日本民族的强烈自尊心；以及《东京的咖啡座》里，写东京处处是咖啡座，而咖啡座的朦胧情调，那播音机传出的轻音乐在室内暖洋洋的缭绕，令人松懈身心。这些赞美，出自一位居住在日本五年的作者笔下，读者是可以相信并领略作者那一份感情的。

作者的文笔优美，尤以写景抒情，更透着柔柔诗意的描绘，令人感染了作者的那一份感情，试举数例：

“想起三岛由纪夫描写金阁寺夜雨的那段景，就联想到若在飘洒细雨的前半夜，能撑伞从湖的那边眺望教徒在灯下诵经，

那朗朗声和着细雨织在湖面的那片朦胧，能不是幅水墨画么？”

《樱花时节游庭园》。

“长崎没有大都会的豪华，但它有小镇的端庄，我曾两度到长崎，两度都下着细雨，飞机在细雨中起飞时，我禁不住哼着《长崎今日也下着缠绵的雨》来，我觉得长崎的情调，就和这首歌的曲调一样凄美。”《长崎下着缠绵的雨》。

“游浅草的最佳季节是乍暖还寒的暮春，要在梅雨来前的黄昏去，那时节夕阳下山得迟。傍晚七点，灯笼亮了，夕阳的残红贴在这半公里长的清一色的灯笼上，把景物衬托得更玲珑透明了”《浅草寺》。

这些文字，不都写得清丽飘逸，透着一份诗意的凄美吗？

而这份凄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离乡背井，伤时感物，原本属于美的日本大自然景色，在一位饱读中华文学的作者眼中，那种向往古典的心情的映照下，终于成了凄悒之景了。

读《樱花飘落时节》，我仿佛在细雨欲来的黄昏，走进浅草寺，走在长崎的街道上，走进樱花开放着的庭园……我欣赏那一份凄美；也从凄美的景色里，了解作者的出国之痛与思乡之情，认识(虽说也还很粗略)大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

辑四



哀伤精神家园
树枯花凋期





借景抒怀字字情

——小说《追逐阳光的人》读后

· 冬 琴 ·

胸有夸父志

风沙雁是一位努力用多种文学形式反映理想的作家。他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写政论文章，还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把诗歌的要素糅合在小说里的主要表现，是他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总是将自己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对生活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体现在笔下的正面人物身上，借以传达自己的激情，表达自己的理想。体现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陆机《文赋》）的精神实质。从他各类文体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本民族文化始终不渝，总有撕扯不开的情结，即使面临目前如此严峻的处境，这口气仍然没有泄。别林斯基说过：“一个诗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别林斯基论文学》）风沙雁的一些散文、诗歌等作品，都可以论证别林斯基的这一精辟论述。小说《追逐阳光的人》也不例外。

读完这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特色”，它是以“在这人类理想幻灭的年代，知识分子应如何探讨人类的前景”这样的一条线索贯穿着的，从中可以发现作家的“个性”和“自我”。

风沙雁严谨的现实主义描写和厚重的民族情感，以及诗化的笔触，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魅力和艳丽的色调。特别是作者善于抓住景色的特点，结合人物的思想性格，借景抒情，着重表现了知识分子像夸父追日般锲而不舍追求光明的高尚形象。在景色的描写中，又恰如其分地运用古典诗词的赋、比、兴艺术手法，沉痛地“直书”华文被边缘化的事实，抒发知识分子对造成华文衰败的人为因素的愤懑不满和对华族文化的依依不舍，又“寓言写物”，“因物喻志”，谕示作者夸父追日般的志向和忧愤的思想感情。这样“物”中有情志在内、“志乃以物出之”，使情志形象化，使“文已尽而意有余”（锺嵘《诗品序》）。这也和别林斯基说“在生活的散文中汲取生活的诗”（《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一样，使“这部小说既是南大生的一篇生活悲壮史诗，也是时代知识分子追求阳光的一曲高歌。”（小说封底）

借景抒情怀

本书的最大亮点，是作者以景物作纽带，笼罩着、纠缠着许多人，盘根错节，相互牵曳，结成了不仅令人沉醉于壮美秀丽的景色中，又能让人感受到作者的悠悠华族情怀。

旅游景点的描绘，全书除了“万顷碧波一脉清流”一章仅略微触及哥伦比亚大学景色描绘之外，其余的篇章对旅游景点的细致描画几乎贯穿小说的全部内容。比如“相思遗恨枫叶飘情”描写了南洋大学云南园、新加坡东海岸公园、柔佛士古来郊外东方学院周边环境、迪沙鲁、加拿大温哥华的环境；“雪花飞扬前景苍茫”描写了日本大石寺、上野公园春天樱花盛开的景色，国家公园的深秋，东京的冬天；“湖光敛滟心系何方？”描写了美国西部、从夏威夷到东京的航程、日本新宿、澳大利亚的珀斯；“海天迷蒙春无归处”描写了加拿大亚伯达省的卡加利市、洛矶山、路易斯湖、莫琳湖、硫磺山、杰士伯哥伦比亚冰原；等等。由于作者也是诗人，使这些描写成为非常出色的诗化的景物描

写，一幅幅情致美的画面生动地在读者面前铺开。但风沙雁并不执著于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着眼于旅游景点中那具有意义，撩人情思的景色加以着墨，顺理成章地借景抒怀，托物言志，形成了本书独特的艺术个性：情致美，充分体现了作者在这方面的艺术造诣。作品恰到其分地刻划了人物在壮丽、旖旎的自然风光中表露出来的报国无门、感伤华文被边缘化的情怀。即使在同学老友的聚餐上，作家也通过人物的对话，不时透露出埋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

美，是要靠人的情感来补充的，所谓“情者文之经”（《文心雕龙情彩》）。读风沙雁描写冬天的雪景、盛开的樱花，抒情之中透露出作者纯洁的率真。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出作者始终用他美好的心灵去拥抱世界和人生。由于作者善于在五彩缤纷的景色中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作品表面看来虽表现为一种平淡无奇的旅游小说的格调，但每读完一个章节，就会被作者浓郁的情怀所感动。风沙雁也是质朴的。罗丹说过：“在艺术中，所谓丑的，就是那些虚假的，做作的东西，不重表现，但求浮华，纤柔的矫饰，无故的笑脸，装模作样，傲慢自负——一切没有灵魂。没有道理，只是为了炫耀说谎的东西。”（《罗丹论艺术》）风沙雁质朴的表现手法，是小说中散文化精致美的重要因素。叙事性的小说原本允许夸张，但在本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娇柔的个性，没有虚假的做作，处处显露出的是抒情性的艺术散文，一切的人物与景物都显得那样率真、质朴与自然，营造出了真善美的意境。可见，小说的高格调、高境界并不在于表面的绚丽和激烈，而在表现上的质朴自然，在于作家的真情实感。风沙雁努力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从生活的散文中汲取生活的诗，用忠实地描绘这种生活来震撼人的心灵”（《别林斯基论文学》），这是《追逐阳光的人》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一个最大特色。

近四十年来，只要懂得英文，就能成为人上人。华文被边缘化就理所当然的变成了现实；于是经济之所以会繁荣，社会之所以会发达，就铁板一块地证明华文成为第二语文的正确。有人因

此飘飘然，洋洋自得。

而当一些人沉醉于经济成就的时候，风沙雁却是清醒的。他以全球南洋大学毕业生每年一次的聚餐会为切入点，通过对南大校园的今昔对比，对某些建筑物、相思树被无情拆毁砍伐的活生生的场景的艺术展示，书写了耿耿于怀的爱校赤诚。比如“八角亭子的刻有‘南大’二字的瓦片都被拆掉，一片不存，换上新的无刻字的瓦片，提到瓦片的事，思中开口了：‘当年瓦片被拆时，我托深思上去云南园捡了几片留作纪念……’”；“我在东京听人家说，本来连校门口的牌坊都要拆除的，但据说当年建牌坊时曾下过毒咒，谁拆除牌坊会祸延子孙，所以承包商都不敢拆。”等等。

作者在写景状物时，常常在艺术描写中穿插了一些议论性的文字，加以点化、归结主题，读来不觉空泛，且有深化作品思想意蕴的效用。比如“凡人都有选择居留国的权力，但却没有选择民族的可能。”“活着若是曾做了促进全人类进步的工作，他就是个好人。”“我们路旁的树，表面上看起来，葱葱郁郁的，雄伟极了，但只要刮起风下雨，总有路旁的树倒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些树是在别处种大才移植过来的，这样一来，这些树的根就不会深入泥土，不会破坏路的根基，但正因为它们的根不深入泥土，一有暴风雨就会连根拔起倒下，这些树叫做移植树。”等等。在旅游赏景的过程中在细微末节处揭示出如此现实、复杂的思想，不能不佩服风沙雁善于发现主题和表现主题的艺术才能。从表面看来，书里充满了轻松的气氛，但那些隐埋在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郁闷激忿、眷恋华族文化之情流露无遗。一切景语皆情语，很明显，作者是在借景抒怀与言志之中表现了入木三分的时代主题的。

风沙雁笔下的南大生于深思、李利民、黄慧萍、何秋韵、吴思中、余敢笑、萧湘涵、冯欣菊、章夏木、程英豪、李秀乐等旅居海外的专业人士是一群“有失落感，回国后人家不重视你，留在可发挥所长的外国又担忧失去根，矛盾得很”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新加坡受到歧视和压制，为了一展所学，毅然远赴国外，或深造，或工作，经过努力奋斗，终于学有所成，成为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工作出色。但他们仍然为不能报效国家而苦闷、愤慨，但又坚信自己是在做着有意义的工作。比如程英豪由于英文不行，当局不准他在新加坡行医，“一气之下，就再跑回日本行医。他们到底要我的医术还是我的英文？”这些南大毕业生，对无法一展抱负的社会有时就会像怒狮一样，满怀激忿。“对前途的担忧，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这使南大生纵使多么柔情似水，也必然兼有几分刚毅之气”风沙雁是南大生，有着丰厚的中华文化根底，人生经历丰富，游历过众多名山大川（令人诧异的是，独缺中国的壮丽河山），生活视野开阔，他在小说中所展示的情怀相信是有特定内容的情怀，而且早已积存在心中。正由于作者心中有这种情怀，他总是希望华族文化能在新加坡绵延不息，与天地同寿，与日月争辉。但他深知，以目前社会发展的趋势，这种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于是，他就想通过感情极浓的文笔，酣畅淋漓地透过一群南大生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表达出来，呼唤知识分子“在这人类理想幻灭的年代”继承和发扬“南大精神”，“追逐阳光”。可以说，这种题材的积累，很明显的也是作者感情的积累。这种感情是率真的，包含着作者鲜明的爱与憎，体现了作者追求真善美的执着。这又促使他成为生活的有心人，时时刻刻在注意观察，深刻思考和努力发掘生活深处和人们心灵深处的最有价值、最有闪光的东西。他笔下的一群知识分子虽然报国无门，但仍然执着地在外国传播中华文化，衣带渐宽终不悔。浩瀚的中华文化成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小说中，虽然作者也毫不留情面地鞭挞了令他愤慨和厌恶的人物和社会现象，但却不刻意追求刺激和新奇，只如实的将存在生活中的现实叙述出来。比如对令人悲怆落泪的南洋大学毕业生成为“亡校奴”的心酸事实，并不慷慨激昂地控诉，对林素莲、范美艳和程超兰的俗不可耐的刻划，并不专门描写她们可怜的灵魂，等等，而是把文学的“歌颂与暴露”这两个职能有机的结合起来：歌颂南大生的

求存意志和宽阔的胸怀，暴露歧视与冷落南大生的社会；歌颂黄蕙韵的高洁素雅，暴露林素莲等女人的庸俗无聊；暴露洋人道森对华人的误解偏见，歌颂华人的心胸坦荡；等等。在描写景物、刻划人物中，作者努力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表现具有诗意的东西，把对人、对社会、对生活、对华文的命运的深刻思考体现在景物和人物身上。他基本上做到了“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用这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灵魂”。

作者对华族教育体系的解体深感痛心和懊恼，是借重于景物的描绘，来发泄这种朴素的华族情感。这种景与情的描写结合得很巧妙，人物性格显得相当突出，意境营造得很出色，使环境与人物都具有典型性。比如，刻划在文化界工作的于深思的对华文水准日益低落，华族失去文化的哀伤，是“望着南大湖那角的雨景”说的，情与景相互映衬凸显了于深思“深思”的个性，又表现了华文前景的渺茫；描写余敢笑和冯欣菊这对情侣在加拿大中街的唐人街吃晚餐时，看到“路两旁的富有中华文化色彩的街灯亮了，用中文书写的街名在路灯下闪闪发亮，欣菊惊叫着：‘这古色古香的街灯，多美呀，这中文字多亲切呀。’”既描绘了知识分子的柔情，又喻示中文前景的“闪闪发亮”，浓郁的民族情感显露无遗；在描绘高思民与黄蕙韵等五人到澳洲满都拉运河野餐时，“突然有人丢了一块小石头，惊起了两只塘鹅，它们振翅缓缓飞向那彩虹绚丽的天边，恰似思民和蕙韵今后追寻的生活远景（高思民提议分工编撰《海外华人思想史》），异常灿烂，但也有点邈远。这深秋河畔周围的黄昏的苍凉气氛，却又像这些异乡游子的心态的写照。”情景交融，尺幅千里，让人浮想联翩；等等诸如此类的文字全书俯拾即是。从上所述，可以看到作者在刻划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时，常常运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来凸显人物性格。作者虽然没有运用浓重的笔墨来刻划人物形象，但由于在人物的主要特点中攫取的特性极为准确，人物对景物的感悟、想象都是按照其性格自身规定性所决定的，使人物性格表现得较为有力。毫无疑问，作者是感同身受的，是有着切肤之痛

的。只有像深受“亡校”之痛的南大生才会有这样的思想情感。

文学是要探索的。“艺术家要影响别人，他的创作就应当是一种探索，他就应当是一个探索者。”（列夫托尔斯泰《1900年12月19日日记》）从本书的《作者简介》中可以知道作者本身就是一个执着的追逐阳光的人。从小说中，更不难发现，风沙雁在华族语文面对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在做着探索：华文知识分子该怎么办？他通过于深思之口，担忧“一个民族若失去了文化的根，将变得异常脆弱与没有生活方向，我常想起楼兰古国，这曾经繁荣过的西域古国为何会在历史上消失掉？我们的国家会是现代的楼兰吗？”但他又不无矛盾地表示并不悲观，他通过余敢笑之口，认为“这是地球村时代，国界已模糊了，唯一能系住人心的还是民族文化，还有一个可献身的场所就行。”以及“只要‘南大精神’不灭，我们的文化就不会消失。”“天下何处不可家”。作者的这种探索，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悠久历史的积淀，形成了华族怀祖认宗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是不可战胜的，这是炎黄子孙在历次的危亡中得以克服艰难险阻，战胜邪魔外道，顽强胜利前进的巨大力量。风沙雁的这一表现特点，相信与他的生活经历、审美情趣和题材选择有很大的关系。

情节欠高潮

《追逐阳光的人》并不是如一般的小说那样，具有完整的故事，丰满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情节等构成小说的基本元素。本书“可分为五个部分，故事并不是连续性的直线发展”，采用“类似《儒林外史》的‘金钱串珠’方式组合”。在结构上“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比如第一章节“相思遗恨枫叶飘情”是以第三人称来写，第二章节“万顷碧波一脉清流”与第三章节“雪花飞扬前景苍茫”却以第一人称来写，第四章节“湖光敛滟心系何方”与第五章节“海天迷蒙春

归何处”又转为第三人称来写。各个章节中的人物没有逻辑的紧密关联，场景也各异，看起来不像是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但全书始终以赤子之心的线索贯串着，以华族情怀隐括全书。书中的艺术结构实质都是对现实生活经过组织、选择和处理，使思想内容统一，沿着最能感动人心的轨迹发展，使小说“但如集诸碎锦，会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可惜的是，由于作者将情寓于景之中时，人物之间除了周颖慧的朋友姚映红的洋丈夫道森认为华人到处设立中华文化中心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倾向”的偏见，与施泽恩认为“白人移民到一个地方是在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华人只是在白人所建立的新国家中设一个小社区，这有什么不对？”这一章节的情节稍有思想冲突之外，其余的章节对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描写都付诸阙如，使小说缺乏了跌宕起伏的高潮，读起来显得较为平淡。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以“雨中的维多利亚市景致非常迷人，各色菊花盛开，树叶绿油油的，枫叶红彤彤的，远远望去绝似一幅春色无边的仙境。映红回头看颖慧与泽恩，他俩正谈笑风生，映红心里一酸，一滴眼泪无声掉下。在这异乡的秋雨，映红突然感到前途茫茫”来收篇，是否意味着作者对个人前途的茫然？毋庸置疑，这样的消极收篇，肯定会削弱小说的积极思想。情节的欠高潮和收篇的太消极，不能不说是本书的显著缺憾。

2003年4月20日

漂流与追逐

• 丁 云 •

1.

马阳在《追逐阳光的人》序文中，把这部长篇小说归入“移民文学”或“留学生文学”。在我看来，它更适合称为“漂流文学”。暂且不论《追逐阳光的人》算不算是“新加坡文学跨入新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不过，风沙雁的这部长篇是部“好看”的小说，是部很有“个性魅力”的作品，却是毋庸置疑的。

好看、有个性魅力，是贬义吗？贾平凹的《怀念狼》很好看，奈波尔的《大河湾》很好看，马奎斯的《百年孤寂》也很好看，很有个性。长篇小说，一定得赶时髦，一定非得用什么后设、拼贴艺术、颠覆美学、意识流不可吗？有些作家，恨不得把读者引入“迷宫”，摸索、猜测、碰个头崩额裂，瞌睡连连而后快。读小说，是种审美享受，又不是考博士，把读者搞得那么累，干嘛？

说《追》是“漂流文学”，因小说主要是描写一群侨居海外的“南大生”的境遇。他们生活在英国、美国、日本、澳洲、加拿大、香港等地区。因此，日本的春樱秋叶、加拿大的湖泊山川农庄、澳洲的名山胜水，随着故事中人物的聚散，自然地展现读者眼前。第一部分“相思遗恨，枫叶飘情”，叙述于深思夫妇迎接四名从温哥华来新加坡参加“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的校友，几天的聚餐、游览、参加会议，校友们浓情厚谊，叙别话沧桑。当他们回到南大校园，目睹“南大校门牌匾耸立在野草丛中”，

对母校的“夭折”、校友们的离散四方，不由感到一种“戮心之痛”。这群去国漂流的游子，顿感深深的“报国未竟”的无奈与心境的苍凉。间中，情节穿插了“末代”南大生敢笑与欣菊的一段“迟来”的惺惺相惜之恋。最后，在温哥华的初秋，众南大生再次聚首，在卡比拉诺桥上漫步，观赏鲑鱼回潮产卵的情景。作者借鲑鱼的回潮溯源产卵的生命姿态，点出这批“漂流者”的“回潮无力”的悲愤之情——我无意再往下复述故事。

这部长篇小说分成五个部分，人物众多，也不是连续性地发展情节。根据风沙雁自己的说法，《追》是以《儒林外史》的“金钱串珠”的方式进行。金钱串珠；是否串得顺畅，或者脉络分明，都不重要，反正五个部分都可作“单篇”来读。我之前提及作品有“个性魅力”，在于风沙雁文学自有一种婉约与凄美。这可能跟他曾在日本旅居有关吧？我不知他是否喜欢川端康成文学，川端的凄美婉约，往往见诸于心理描绘，以景寄情，“意在言外”：川端对青春流逝的感伤，对日本民俗与传统的眷恋，都见诸于《伊豆舞娘》、《古都》与《睡美人》。而风沙雁的婉约、苍凉与凄美，则见诸于他对“漂流身世”的无奈，尤其在写景上，他从不吝啬，以清丽、淡雅、飘逸的笔，行云流水地任意挥洒日本樱花盛开的景色、加拿大维多利亚港的渔船帆影、洛矶山下的农场、澳洲柏斯的天鹅湖等等，在他笔下，随着季节的更替，展露多彩的面貌。

马阳认为：“作者以清丽飘逸的文字，着力描写日本大石寺、上野、新宿御苑等地樱花盛开的景色，十分吻合少年学子风华正茂的心境，无疑增添了作品的感染力，但过分渲染扶桑景色，便冲淡了作品的题旨。”我却认为，这样的“渲染”，是在风沙雁的“意图”与“计算”之中的。《追》中描写的是一群学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医生、大学教授、企业家、图书馆馆长、经理等。他们物质不匮乏，生活无忧，但为何总是抱着一种忧患的、苍凉的、自我放逐的心态？一种漂流的不安定感，一种“隙缝人”的姿态，不断在奔跑、颠簸、碰撞，气喘吁吁，锲而

不舍地追寻文化的归宿、母语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但往往这些追寻，都磕磕绊绊，阻挠重重，时不我予啊！壮志难于伸展报国未竟，受到“原乡”强势主流者的漠视、挤压、冷待，他们唯一能做的，是与体制抗争吗？随波逐流吗？还是只能挺直脊椎骨向前冲，不断地奔跑，再奔跑……追逐着梦与理想。于是，寄居者的心态，漂流的心境，便只能“意在言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寄情于国外山水的壮伟、绚丽多姿，一慰藉“漂流者”的孤寂心灵了。

以上的推论并非纯属猜测。中国学者周宁在《风沙雁创作论》中，曾论及：“游子的浮云感，竟然要靠异乡的景物来慰藉，人生有比这更凄苦的境界么？本是故土的新加坡，却一时找不到睹物思情的地方，异乡的日本，却处处有故国之情……”对许许多多漂流异乡的南大生来说，此心境何其苍凉、凄酸、无奈！

2.

风沙雁本身是南大生，自然熟悉他所叙写的南大生的故事，但在开展《追》这部小说时，却在书的“前言”，安排自己在飞机上巧遇一名六十年代的南大生曾民颖。两人交谈甚欢，但民颖下机时却遗留下两大本日本簿，他想归还日记簿，却苦于无民颖的地址，多年后，终于把日记簿里南大生的故事，整理成篇，加上篇名，就成了《追》的由来。

这种安排，是风沙雁刻意对“南大生”的境遇产生一种“隔”。隔的好处，在于能更冷静、澄澈、客观地阐述“南大”从开拓、发展及关闭的历史；更理智、更感而不躁地廓清南大生“孤臣孽子”的漂流心态，以及能自强不息，继续在海外漂流地，凝集力量，为母语教育、为民主理念、为人类的文明，发出更大的光和热。风沙雁原意是要“疏离”，要“隔”，但小说发展的结果，他却忍不住“介入”小说中的角色。如“雪花飞舞，前景苍茫”篇中的瑶岗，如“海天迷蒙，春无归处”篇的泽恩，都有风沙雁明显的影子，他本想“处处不在”，到头来，却是

“处处在”了！

由此可见风沙雁毕竟是性情中人，他把持不住他“南大生”的“情意结”，“隔”不成，反而“融”入其中了。以下可以看出他融入其间，乐此不疲的例证。他固然要保持婉约、凄美的叙事风格，寓景以情，意在言外。

——“箱根的美，主要是那周遭的气氛及满山的青翠树木和深红的枫叶。在芦之湖泛舟，近看一望无际的万顷碧波，加上迎面吹来的微风送来的凉意，就俨然是苏东坡《赤壁赋》中的意境。恰好那天天气特别晴朗，富士山竟然若隐若现在远处，那锤形山体都布满白皑皑的秋雪，这着实教蕙韵沉醉了好一会儿。”

——“深秋的满都拉运河的黄昏颇有几分肃杀气氛，晚风尤其冷冽，五人沿着河畔散步时，天色已向晚了，运河尽处现出一道颜色非常绚丽的彩虹，游人都啧啧称奇……突然有人丢了一块小石头，惊起两只塘鹅，它们振翅缓缓飞向那彩虹绚丽的天边，恰似思民与蕙韵今后追寻的生活远景……”（页143）但作者在“寄情于国外山水的壮伟、绚丽多姿，以慰藉‘漂流者’的孤寂心灵”的同时，也借用了故事中知识分子的口，直接、坦率、辛辣而有力的批评了时政：

——“新加坡的行政效率是没得说的，绿化也很成功……但事实上有不少问题，比如说，我们路旁的树，表面看起来，葱葱郁郁的，雄伟极了，但只要括起风下雨，总有路旁的大树倒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树都是在别处种大了才移植过来的，这样一来，这些树的根就不会深入泥土，不会破坏路的根基，但正因为它们根不深入泥土，一有风暴就会连根拔起倒下。这些树叫做移植树，有人戏谑地说，我们引进外来人才政策的一个后果，就会像移植树一样。。。。。”

——“当年反对华人兴办南大最强烈的就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它以不承认南大学位的温和狡猾的方法，压抑南大生进入决策阶层。提起维多利亚市的古典建筑，我就想起竖立在云南园的新南大牌坊，以及孤零零竖立在荒草中的，校名被拆掉的旧南大

牌坊。华族移民就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聚合了众人的力量兴办学校，较成功的多少保留了民族的特点，不成功的就被人同化了。”

——“我在探讨辛亥革命后华人的思想倾向，欧美近来不是特别留意华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抬头的问题吗？亨廷顿不是提出文化冲突论吗？我隐隐感觉到，亨廷顿的东方文化威胁论是有针对性的，是冲着亚洲各国在经济上日益繁荣，以及在政治上日益摆脱欧美的控制局面而来的……”

——“殖民地主义者甚至进行种族屠杀，消灭别人的文化。华人的毁家兴学，只是生存的最基本要求与权利，如果这样的举动也会威胁到别人，我就不知真理何在！”

3.

《追逐阳光的人》的个性魅力，其实也可解读为风沙雁“良知知识分子”的心灵展示。

且看他的履历：毕业于南大中文系。曾负笈日本。获美国新闻奖。被派驻新加坡驻日大使馆任三等秘书职位。业余从事散文、诗歌创作，也写政论文章。完成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等。南大生千千万万（根据统计，约1万2000名），浪迹、漂泊、颠沛流离的不知凡几，固然其中有彷徨、颓废、被物欲俘虏者，有行尸走肉，追逐名利者，但像风沙雁如此坚定地“永生永世追思索寻那段云南园渡过的阳光灿烂”，并激励自己“朝向与人类利益息息相关的目标前进”的知识分子，便显得难能可贵了，展现了作者的独特情操与强韧的异见者的傲骨。哈维尔说：“知识分子应该是体制的权利和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个知识分子就不应该去扮演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于胜利者所写的历史。”

因此，我不愿狭义地把《追》看作是描写“南大情结”的小说。

既然称之为“漂流文学”，漂流、放逐，又何尝不是这代知识分子的“宿命”呢？从九七的移民潮、六四民运、保钓、马

来西亚独中复兴运动，到南非隔离政策，到缅甸南韩印尼……哪里有暴政、践踏人权、压制母语、消灭文化、贫穷、非正义的现象存在，哪里就有知识分子的漂流、去国、流放。正如风沙雁所说的：“隐藏在这部小说背后的不仅仅是南大生的悲欢离合，作者所寄寓的是在这人类理想幻灭的年代，知识分子应如何探讨人类的前景……”我读完了整部长篇小说，检阅一群群“南大生”的苦闷、彷徨、漂流的境遇，思绪却反而被书中次要的角色所感染——“海天迷蒙，春无归处”中的姚映红。

姚映红不是南大生，也无“南大情结”，她来自东马古晋，只完成中学教育，到新加坡闯天下，担任过旅店接待员、导游等，后来到美国西雅图苦读并考获学位。第一段婚姻破裂后，她改嫁给年纪大她二十年的农场主人道森，老夫少妻经常抬杠、吵架，生活不协调，最终走向分手之路。道森精明，婚前一纸协约，她一分钱赡养费也拿不到。不过映红生性乐观、生命力强韧，继续在异乡谋生，且积极地追寻她的“第三春”……小说就在映红带领好友颖慧与泽恩乘坐渡轮，往维多利亚市中结束——“渡轮快抵达码头时，天气又阴晦了，秋雨开始飘洒，并逐渐变大。三人上岸时，秋雨细细密密飘着，映红撑着伞一路带头……雨中的维多利亚市景致非常迷人，各色菊花盛开，树叶绿油油的，枫叶红彤彤的，远远望去绝似一幅春色无边的仙境……在这异乡的秋雨，映红突然感到前途茫然一片。”

追逐阳光，毕竟有阴晦，有黯症的时刻……

我希望风沙雁能继续发展小说，继续追逐他的文学的“阳光”。“南大生”固然是群漂流者，但世界已发展成地球村，战乱、掠夺、疾病、环境污化、贫富悬殊、社会异化的现象，比比皆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然走着不为当政者所喜的道路，也就必然地注定了“漂流”的命运。风沙雁的小说还未碰触及政治、学潮、冤狱等领域。更激越、更震撼的“漂流文学”，等着风沙雁去开拓；更高亢的强音，等着他去歌唱。

一曲时代的悲歌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读后感

·(文莱) 一凡·

如果时代是经，则小说《追逐阳光的人》(下称<追>)中南大生的际遇则是纬。经纬结合构成了时代的画面。

小说<追>是上世纪下半叶海外华人尤其是新马华人知识份子的一曲悲歌。写的虽然是南大生被迫自我放逐的际遇，却折射出时代的身影。发生在南大儿女身上的故事，正如交响乐的不同乐章，有的悲怆，有的沉郁，有的高亢，有的低迷，但都交织着时代的梵音。

无意把<追>与雨果的《悲怆世界》相提并论。在艺术上，也许它并未达到雨果的高度，但在反映时代的悲情方面，却同样引起人们，尤其是云南园儿女们的深深共鸣。

<追>虽是小说，但不少章节，却有美文的况味。作者诗样凝练典雅优美的文字，给人很高的审美享受。作者擅用感性的风景象征文化与历史。其情景交融的文字功力，扣人心弦。虽然没高潮迭起的故事情节，但飘散着诗香的文字，却让人回味无穷。

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追>呈现给读者的却是文中有诗，诗中有画。由于作者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日子，对东瀛的景物描绘，特别得心应手。画面的婉约凄美，是很震撼人心的。用华丽的苍凉来形容其文字的基调，应是贴切的吧。以下几段文字也可以印证这种说法。

“箱根的美，主要是那周遭的气氛及满山的青翠树木和深红的枫叶。在芦之湖泛舟，近看无际的万顷碧波，加上迎面吹来的微风携带着的凉意，就俨然是苏东坡《赤壁赋》中的意境。恰好那天天气特别晴朗，富士山竟然若隐若现在远处，那锤形山体都布满白皑皑的秋雪，这着实教惠韵沉醉了好一会儿。”

“秋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街道旁的霓虹灯把枫叶映照得更鲜红。这秋雨洒枫叶的情景，真的慑住这群南大生的灵魂，他们选择继续流浪的道路。”

“我独自坐在靠窗的咖啡座的椅子上喝啤酒。窗外的雪连绵不断地下着，周围苍茫一片，恰似我今后想走的道路那么扑朔迷离”。

“我对故乡的薄暮的感受，竟然一如异乡的那么苍凉。日本的薄暮给我与苍凉感，如果是乡愁与异乡文化的挑逗，那故乡的薄暮给我与苍凉感，却是因本族文化没落而来的悲伤。”

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写道：“一位作家若能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便能奏功。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好，因为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而进一步若要抒情，则更须诗人之笔。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风沙雁是少数能有上述功力的作家。

作者对意象的捕捉，最能体现其“诗人的本领”。《追》中如这段文字：“只要刮起风下雨；总有路旁的大树倒下，为什么？因为这些树是在别处种大才移植过来的，这样一来，这些树的根就不会深入泥土，不会破坏路的根基，但正因为它的根不深入泥土，一有暴风雨就会连根拔起倒下”。以树比喻无根的一代，与新加坡诗人梁钺以鱼尾狮比喻新加坡不东不西的文化特色，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这些无根的一代，作者忍不住慨叹道：“这些人既放弃了母族文化，对英国文化只懂得一点皮毛而已，他们既不读英国文学，也不听歌剧，古典音乐，就只懂得喝下午茶，粗浅得很。”

“这与追求优雅情调的英国人喝下午茶文化根本就是两回事。”

作者又以海为意象，阐述不同文化的特色。

“海就像一位千面女郎，每个地方的海都有它的特色，日本的热海，因有风格独特的度假旅馆作背景，在波涛汹涌中它又有几分妩媚与优雅的气氛，在春天或秋天的夜晚在热海海边走着，它又透露出几分日本文化特有的凄清意味。夏威夷的威基基海滩，椰雨风情似乎不逊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海滩，但飘荡在空气中的那股欢乐气息，却又说明波西尼亚族的文化是乐天中含有几分奔放进取的素质的。新加坡东海岸的沙滩，整洁而有条理，空气中永远飘浮着一股悠闲而又落寞的气氛，颇有知音何处寻之慨。……与新加坡的沙滩一比，迪沙鲁海滩今日的处境就更其落寞了；它是有它的魅力的，至少那浓得化不开的马来文化情调就不是夏威夷、热海、新加坡的海滩所有的。但它就是那么受人冷落，冷落得要叫人兴起喟叹与悲怆感。”

像这样充满意象及情趣、意趣、理趣的文字，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这与作者兼擅诗歌、散文、小说创作及评论的作家兼学者身分有关，也与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及深厚的学养有关。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尽管迥异，如“瑶岗的深沉苍凉、李世雄的慷慨激昂、高思民的睿智多思、薛春生的浮躁偏颇、惠慧的孤独清高等等。”但在漂流与追逐的岁月中，虽然面对重重困难，他们却有不懈追寻生命意义、寻找文化归宿、探讨人类前景，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之共同点。

对作为小说次要角色的姚映红来说，前景是“海天迷蒙，春无归处”，但对流落异乡的南大生来说，却是“海天迷蒙，情归无处”啊！报国无门的南大生，在漂流岁月里，唱出的是“祖国！我爱你！你爱我吗？”的悲歌。他们是一群回溯无力的鲑鱼，既无法融入异国他乡的主流社会；亦因各种原因，无法落叶归根。

作者通过散文化的小说形式，反映时代的许多令人深思的重大课题，诸如民族文化、全球化乃至文学创作及音乐教育等等。辐射面虽广；聚焦点却是南大。因为南大问题不是单纯的教育问

题。南大之所以成为多年来人们谈论的课题，与新马的历史及政治息息相关。当政者虽然口口声声要落实及发扬南大精神，事实上民族教育这颗大树，早在生存第一的政策中倒下。正如小说中的人物黄慧萍所说：“我每回国一次，我就越发觉自己无法融入这社会，表面上我们的社会保留了许多民族习俗，但那尽是些无关痛痒的小传统，我们的大传统诸如文学、历史、哲学，有多少人懂？”

“去南大化”及“去中国化”都有其政治目的。以批判“大汉沙文主义”为藉口，消灭或企图阻碍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大中华圈”论调一样，是别有用心的。效忠自己的国家与认同及保存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不冲突。

对绝大部分南大生来说，南大的“往事并不如烟”（往）。它的英年早逝是南大生心口永远的痛。南大被关闭所衍生的“亡校奴”悲怆情绪，不是一句“向前看”可解的。南大生固然不应停留在白头宫女话当年的阶段，但也不能被“向前看”的论调迷惑而抹杀历史。

在现阶段，落实南大精神的最佳途径，是捍卫马来西亚的华小及独中，支持“南方学院”、“韩江学院”及“新纪元学院”。南大这棵大树，是由小树、中树长成的。没有培植小树、中树，那来大树啊?!没有华小、华文中学，就无华文大学产生的基础。

小 结

《追逐阳光的人》是一部海外华族知识分子，主要是南大生的生命沧桑史。它的基调虽是漂流与追逐，奏的虽是一曲时代的悲歌，但在漂流与追逐的岁月中，这些知识分子，对本族文化九死而其犹未悔的执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不懈求索，还是让人看到生命中的阳光的。

余光中云“漂泊的反义词是回归。负面的漂泊只是逃避，正面漂泊该是追寻。寻而有得，始有归宿。可是抱残守缺不是积极

归宿，推陈出新才是。”（余光中著：蓝墨水的下游，一〇二页）正如长年客居美国洛杉矶的著名诗人张错所说的，不是地方决定你的心在哪里，是你的心决定地方在哪里，你的心留在哪里，哪地方就在哪里。南大人尽管散居天涯海角，只要紧守自己的文化家园，拥有强权无法征服的文化祖国，何处不是儿家呢！

有根，就经得起漂泊。在全球化实际上是欧美化的声浪中，有根的南大生不会迷失自我。

本文作者是资深写作者
原文刊《新世纪学刊第四期》
（新加坡：斯雅舍，2004年）

注：

《往事并不如烟》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章伯钧女儿章诒和新作的名称。章诒和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研究员，具博士生导师资格。

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纪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自如溪。……

他们有才、有德、有能，个个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其实，命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对于历经劫难者，往事并不如烟。因为欢乐是平庸的，痛苦是深刻的。对受伤害的南大生来说，往事也并不如烟。

《追逐阳光的人》 为何只追到苍茫一片

·(马来西亚) 杰 伦·

接获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林源德学长于2004年5月8日的来函,邀请我为“南大校友丛书”出版基金所推出的第一批丛书担任讲评,并指定要我推介风沙雁著的一个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

身为南大校友的一份子,我为这一批丛书的出版感到兴奋,能为其中一本丛书,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做推介工作,当然是十分乐意的事。

首先,我要藉此机会赞许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因它对从事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及人文的关怀方面已做出了颇大的努力和贡献。

在几年前,我淡出政坛之后,又能够与文坛中的旧雨新交经常碰面,并对文艺写作进行了深切的探讨,甚至于重拾文艺之笔,其中的一位新交,便是《追逐阳光的人》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风沙雁先生。

我第一次拜读《追逐阳光的人》是在2003年的3月间,在接受邀请为此书的讲评人时,我又重读一遍。

原名欧清池的风沙雁先生,是新加坡公民,1971年修毕南大中文系,获荣誉学位。在1998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

风沙雁于60年代末开始从事文艺写作,到目前已出版了多种

专集，其中包括《砂砾集》、《矛盾集》、《樱花飘落时节》、《文艺絮语集》、《风沙雁文集》及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等。

《追逐阳光的人》是一部约12万字的小说，书中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数是身居海外，包括英、美、日、澳、加与香港等国家和地方的南大生。正如该书封底介绍文字所言，“小说中人物众多，际遇各异，有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的大专教育工作者，有钻研生化尖端科技者，也有悬壶济世者”，众多人物的多彩生活，便建构成小说中多彩的感人画面。

像这样全面描写居住海外的南大生的生活际遇与理想抱负的长篇小说，我的印象中，它应该是第一部。它获得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赞助出版，便可见当局对此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视。

正如《南大校友丛书》缘起中说的：南大25年来的春风化雨所散播的种子，栽培扶植了不少英才，如今南大校友遍布世界五洋七洲，……大则为人类人文科技的进展贡献，小则为国家社会默默耕耘，南大所培育的逆境中自我奋斗的南大生，相互磨炼出特有的“南大精神”……

《追逐阳光的人》分五个部份写成。五个部份均各有题目，它们是(一)相思遗恨，枫叶飘情，(二)万顷碧波，一脉清流，(三)雪花飞扬，前景苍茫，(四)湖光潋滟，心系何方？(五)海天迷蒙，春无归处。全书内容与意旨均环绕着南大所培育的逆境中自我奋斗的南大生，相互磨炼出特有的“南大精神”铺写而成。要说本书所写的只是一万二千名“南大生”的一小部份身居海外南大学生的际遇和奋斗，而鲜少涉及为本身国家社会默默耕耘的，我同意中国作家马阳先生在序文中的看法：“这五篇日记，只是匆匆一瞥，远远容不下这群南大生风雪长路的人生故事，《追》里写景状物叙事多是带感情提纲式文字，若能展开来精致经营，便是很有创意创新的，反映国际题材的长篇小说。”

文学也是文字的艺术。作者风沙雁先生平生对中国旧诗词及唐宋散文，应有偏好，因此在这部小说里写景与抒情的文字，婉

约清丽，诗情画意，处处流露。读者只要膘一下前述五个部分的题目，就会被它们的典雅所吸引。

然而我要说，作者在本书里所描写的人物活动，地理风情，生活故事与情节，均属现实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或两者混合的手法。因此，风沙雁笔下的人物(包括作者的影子)不管他(她)们生活在海外哪一个角落，对时代，对现实的认识和要求，追逐阳光或对现实不满，均是植根在现实生活中的知识份子的思想和感情。

由于作者本身曾居住及任职海外多年，又性喜游山玩水，因此在小说中所描绘的，包括英、美、日、澳、加等国家及地区的风景、历史、生活文化均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它也形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另一个特色。

我说作者是采用现实主义及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去写作这部长篇小说，这里允许我列举一些对现实不满及甚至于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文字臚列如下：

(一)“新加坡的行政效率是没得说的，绿化也很成功”于深思说：“许多外国政要来访问时都赞扬我们的成就，但事实上也有不少问题，比如说，我们路旁的树，表面上看起来，葱葱郁郁的，雄伟极了，但只要刮起风下雨，总有路旁的大树倒下来……(见页21)”

(二)“哎，南大生都一样有失落感，回国后人家不重视你，留在可发挥所长的外国又担忧失去根，矛盾得很”(见页25)

(三)“但在新加坡，这是我们出生的地方，却也要面对母族文化日愈消失的局面，那是无法教人接受的”(见页30)

(四)“什么叫做‘南大精神’”有位校友这么说：“南大精神就是华族捍卫其民族教育权力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见页30)

(五)“每一片瓦每一块砖，似乎都凝着华族发扬文化的血泪，这是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后追寻保留与弘扬文化的毅力的象征。”(见页52)

(六)“鲑鱼尚且懂得回到出生地传宗接代，我们这批流落在外的南大生，却只能客死他乡，只能一生为他国作嫁时衣。”(见页69)

(七)“不是你们不回归，不报恩，是要报恩无门”(见页69)

只可惜这种对现实做出批判性的描写文字，只出现在这部小说的第一部份，即是《相思遗恨，枫叶飘情》里，其他的四个部份的文字，便很少见到那样的对现实所进行的批判。

此外作者在《追逐阳光的人》对一些人物的爱情生活也有相当深刻的描写。譬如，对敢笑与欣菊的爱情的发展，最终见到了花开果结。还有便是颖慧和泽恩的相爱，也如胶似漆。与此相反的是，作者笔下的另一个人物——映红，她有过多次的婚姻，但总是失败告终。作者以这一小段文字结束了这个长篇的叙写：映红心里一酸，一滴眼泪无声掉下，在这异乡的秋雨里，映红突然感到前途茫茫一片。

我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意见，想与作者提出作为研究，如果在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束不是这样的ending，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思考空间的结束，也就是作者寄寓的，是在这人类理想幻灭的年代，知识份子(更明确的是指南大生)应如何探讨人类的前景，这样写会否有更佳的艺术效果呢？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纪实的长篇小说，(散文化或诗化的小说，都是可以接受的)风沙雁先生对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描写都发挥得合情合理，内容更是丰富多彩的。

《追逐阳光的人》是风沙雁除写诗，散文及评论以外的一个新的尝试，已有这样良好的表现，是值得我们为他喝采的。基于上述，在此我特别向大家推荐这部描写南大生的自强不息的奋斗史的小说，期盼大家人手一册！

(2004年5月下旬)

本文作者资深作家

原文刊于《新世纪学刊》第四期，新加坡：斯雅舍）

新加坡共和国的 三种文学版本比较论

· (马来西亚) 许文荣 ·

前言

新世纪伊始，新加坡三位中生代资深作家英培安、原甸及风沙雁分别推出个人的长篇小说。这是一种巧合吗？抑或是在经过二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后所必然迸发出的文学火花？不管是巧合或必然，英培安的《骚动》⁽¹⁾、原甸的《活祭》⁽²⁾及风沙雁的《追逐阳光的人》⁽³⁾（以下简称《追逐》）已确实地呈献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新加坡共和国明年（2005年）将迎接独立四十周年，这三部小说的出版或者更具有特殊的历史与社会意义。这三篇小说深入地表现了新加坡华人，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从个人到家国的追寻、骚动与彷徨。

本文尝试以比较及对照的方式，把这三部小说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窥探它们的话语形态与文本特征，展示他们的共性和特性。通过这样的关照，我们期望可以归纳出新华中生代小说创作的趋向与特性。

为什么长篇小说？

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这批中生代新华作家，想要把上世纪的左派运动与华教斗争的历史遗留给新一代。他们担忧，随着时

代的迁移，如果那段过去被视为敏感的事件没有被再现，将永远掩埋在历史的无底洞中。原句说：“我想，在新加坡华文文学这一‘异类文学’中，我这样年纪的人，如果不去反映这样的一个悄然而去的时代，那么，不消多久，这样的生活将变成化石。再过十年二十年，这半世纪的题材将从我们的文学中完全的湮灭，因为我们的文学界迄今没有人尝试端把椅子请这位历史老人留坐”⁽⁴⁾。原句的担忧英培安似乎也有同感。英培安说：“1988年12月，我刚写完第二部小说《孤寂的脸》，打算写一部以50年代学潮作背景的小说。因为我发现，在新加坡，尽管不少文化人与写作人经历过这个时代，而这时代的小说，竟是阙如。”⁽⁵⁾由此可见，他们的长篇小说书写有着拾遗补阙的企图。风沙雁再现南大生的悲情与奋发，是近年来新华／马华社会的大叙述，虽然有着新瓶装旧酒的做法，但也显示了南大事件在新加坡华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小说的话语形态

这三部小说对新加坡的书写，从殖民时代跨越到当今社会。英培安的《骚动》在时间的座标上属于最早的一部。从上世纪5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新马写起，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当然《骚动》的书写场景不只是在新马，也推展至中国、香港及加拿大。原句的《活祭》在时间和场景的跨度上比较类似《骚动》，从1963年新加坡的选举起笔，并一直连接到80年代中期。空间的跨度呈圆状形，从新加坡到中国，从中国到香港，再从香港回返新加坡。风沙雁的《追逐》是由5篇情节结构不相联系的短篇合缀而成，可能这5篇短篇完成于不同的年份，过后再把它们连系起来，不过文本的时间跨度不太大，主要还是叙述晚近这几年的经历，无论如何文中也经常回忆十几二十年的前尘往事，常有今非昔比的感叹。从时空的向度看来，这三位新华作家都具有不小的野心，想要展现一幅幅较完整的社会历史与人物性格发展的画卷，企图给予读者较总体性的观览。

1、书写新加坡

英培安《骚动》里的新加坡，是殖民时代下的殖民地，是小说人物邂逅的地方。小说男女主人公(达明和子勤)都是出生并生长于新加坡。他们在中学的时候认识，他们一同参与戏剧演出，一起参加学潮，可以说是当时受左派思想影响的典型进步青年。后来，为了避开当局的缉捕，他们一同逃离新加坡。本来是要到大陆，后来听到不少关于大陆的消极传言，临行前折转到香港去。另外两位主要人物伟康和国良也在新加坡认识，他们和男女主人公都就读于同一所中学，也都一起参加50年代的学潮⁽⁶⁾。他们后来都被学校开除，伟康还被当局逮捕，被释放后他对殖民政府很反感，因此决定回返大陆深造，临行前在一间庙里和国良有着一次同性之间的暧昧关系。

国良则继续留在新加坡，通过夜校修完大专教育，也在夜校里认识了他的另一半。无论如何，国良仍然对在中学时仰慕的女同学子勤念念不忘，20多年后他们在香港重逢，在床上厮缠了一夜，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背叛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在和女主人公子勤重逢之前，国良曾经到大陆去会见分离了二三十年的伟康。藉着国良与伟康、国良和子勤的重逢，作者似乎把新加坡、中国及香港三地联系起来了。居住在中国的伟康和居住在香港的子勤，重新和新加坡的国良建立关系，这或许在隐喻着，离开新加坡的华人，不管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不管他们去国多少寒暑，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新加坡仍然是抹不去的星空。婚姻生活不如意的女主人公和国良发生亲密肉体关系(虽然过去她曾经误解了国良)，似乎表征了在生活屡遭挫折时，故乡又成了一个人渴望亲近的“初恋情人”(虽然也曾一度误解了故乡)。

我们再以这样的推论来解读原句的《活祭》，也一样可以成立。《活祭》的主人公在60年代离开新加坡，为要投入更炽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回返大陆，后来又出乎意料地从大陆转到香港。他在外头飘泊流浪了20年，经历了各种人生的磨难，似乎有一种

不如归去的感受。后来他也毅然选择回归新加坡，正如他当年毅然地选择离开一样。他再度把新加坡视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乡，像贺知章一样“少小离家老大回”，又像雅各一样回归自己的本家。⁽⁷⁾

不管新加坡的政治现实如何，新加坡在东南亚各国中是极特殊的，因为她是一个华人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也是唯一在政治上由华人主导的国家。华人在这国家的主流(拥有主人翁的思想)，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是非主流或边缘族群的情况不同，新加坡华人更容易对国家投入深刻的感情。⁽⁸⁾

风沙雁《追逐》中所反映的南大生，虽然对老南大的消失总有着强烈的悲愤，虽然他们也总会指责当局亏待过他们⁽¹⁰⁾、否定他们(认为他们英文不好而不给予聘用)，使他们被逼得在国外漂泊流离，但是他们仍然对这岛国有着特殊的情意，在无奈与遗憾的同时，他们也不断地用自己的行动与毅力宣扬“南大精神”，希望这岛国的华教与中华文化的灯火不会全然熄灭，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继续延续这种在逆境中的奋发精神。这难道不是对新加坡的一种效忠的表现吗？

当然对新加坡的书写，不尽然是好的一面。实际是，这三部小说也揭露了不少她的负面形象。《骚动》展示了殖民地官员的嚣张跋扈、殖民政策对华教与华侨的宰制，直接或间接地赶走了一批批像达明、伟康这样的热血青年。《活祭》中也指责在选举中胜利的一方“玩臭”，政治的民主自由度越来越紧缩，文化生命越来越没有血色。《活祭》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看来也不是一时的气话，把思想装进了罐头，加以密封，不问青红皂白，凡来自共产中国的出版书籍一概封杀，不准进口。此后的人为岛国文化人没有被逼疯的现象必当感到诧异。”⁽¹¹⁾这是对政治戒严的嘲讽；“这小岛原是荒凉的，尤其荒凉的是文化”⁽¹²⁾，这是对文化贫血症的不满；“中学要改制嘛！对么？两所大学要合并嘛！对么？”“所有的改变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高英文”⁽¹³⁾，这是对西化教育趋向的批评。这些因素导致主人公选

择离新返中，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

风沙雁的《追逐》对新加坡的批评更是以严厉的，尤其是南大事件的发生以及新加坡人的“后殖民心态”。他们高举英语，压抑华文；他们推崇西方文化，压抑中华文化的发展；他们善待英校生，亏待华校生(南大生)。

南洋大学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中文及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所创办于1955年的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被并入以英文为主的新加坡大学(后称为国立大学)，表征了中文与中华文化被英文及西方文化所吞并，成为南大生及华文教育者抹不去的悲情。南大生由于文凭不受承认，英文能力被怀疑，因此为了生存，唯有漂泊四海，浪迹天涯。南大的消失必然使中文与中华文化的水平日益低落。“表面上我们的社会保留了许多民族习俗，但那尽是些无关痛痒的小传统，我们的大传统诸如文学、历史、哲学，有多少人懂？”

为人民考虑周详的新加坡执政者，为了让新加坡能够在国际上拥有竞争力，因此推行了以英文与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教育与文化政策。在这政策下，所考虑的只是现实生存问题，并没有深邃的人文传统。《追逐》中又有一段叙述说：“凡被英国殖民过的地区或国家，总有一小撮自命为英国文化通的人，当英国势力撤退后，依然在那儿对天遥望，缅怀过去，过着自以为是英国绅士般的生活。其实，这些人既放弃了母族文化，对英国文化也只知道一点皮毛而已。他们既不读英国文学，也不听歌剧、古典音乐，就只知道喝下午茶，粗浅得很”，⁽¹⁴⁾虽然已经独立接近40年，新加坡人仍然保存着殖民地思想的遗毒。无论如何，他们所了解的西方，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化的层次上，和被排挤的中华文化一样没有灵性。“这些人懂得什么英国文化，他们偶尔上酒店喝下午茶，为的是捡便宜货，……贪图的是吃了一顿便宜的下午茶，晚餐就可以省下来不吃，这与追求优雅情调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¹⁵⁾

《追逐》也批评新加坡的一些变质的南大生 / 华文教育

者，由于缺乏自信及媚俗而扮“假洋鬼子”，“为的是要掩盖出身南大的事实，因为华校生挤进上流社会的绝无仅有。”因此他们“故意在谈话中穿插一两个英文单字，像什么‘我很blur啦’‘我要找happy’啦；或者故意问你：‘这东西华文叫什么？’，借此来炫耀自己的英文比华文好。这是一种在长期受压抑的扭曲心态，是岛民的悲哀”“如果经济上做得到，他们甚至会去漂白为白人呢。”⁽¹⁶⁾

新加坡的华文水平日渐低落，阻碍文化事业，特别是华文报的发展。无论如何，有些华人居然为了子女学不好华文而移民，真是令人感到不胜唏嘘。“华人基本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移居海外，就靠保存母语与饮食习惯来团结在一起，来相濡以沫，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只有岛国的一些华人，数典忘祖，有些还以身为华人后裔为耻，这真是岛国的悲哀。”⁽¹⁷⁾

相比之下，远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却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珍惜少数民族文化。“连卡卡利这么小的市镇，华人只有5万余名，都有一个中华文化中心”⁽¹⁸⁾“温哥华唐人街的华人色彩，比新加坡还浓呢”。⁽¹⁹⁾因此，有不少《追逐》里的知识分子都移居加拿大，那些还未移民的，如《海天迷濛·春无归处》的周慧颖与施泽恩夫妇也跃跃欲试。

2、书写中国/中国的书写

除了新加坡的书写之外，这三部小说都同时涉及中国的书写。这样的情况不是偶然的，它展示了一种书写趋向。新华作家，特别是中生代与前行代作家，由于历史和文化渊源，“中国”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磁铁，书写中国也成为他们的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些中国书写中，有重新触及历史伤痕的，也有礼赞大陆改革开放的。

英培安和原甸的中国书写，比较倾向于再裹开历史的伤痕。

《骚动》藉着一位小说人物伟康回返中国，叙述他在中国所面对的各种遭遇和压抑。这些遭遇如被批斗、被抄家、被折磨、被套

帽子、出卖朋友、下乡等，铁板一块地复制大陆的伤痕文学，没什么新意。所不同的是当事人是一个从新马过去的“华侨”，就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可能因为他不是地道的中国老百姓，他是华侨，中华文化里的‘愚忠’还未在他的血液里根深蒂固。”^①由于他没有那么愚忠，他所受的苦难就没有那么大。无论如何，当时他目睹了各种人性的荒谬，使他原初的崇高理想被磨损了，他的精神和肉体不断地往下沉。

“伟康记得文革时被学生强迫戴纸帽、挂着个大牌子跪在台上的英语老师，他就是从马来西亚遣送回国的，后来据说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上吊自杀了。”⁽²⁰⁾“他十分清楚，如果他在肉体上要活得像人，精神上就得忘记自己是一个人，换句话说，就是要完全背叛自己，服从在权威下指挥的群众。”⁽²¹⁾这种背叛自己、虚假服从的生活使他对政治兴趣索然。反之，肉欲享受成为了他生命最实在的快乐。“每天伟康都觉得空虚无聊……一点意义也没有。只有在晚上，在被窝里拥着爱人的身体，在爱人的身上抽动着身子的时候，他才感到生命的活力与意义。”⁽²²⁾当人面对各种现实的压抑而没有出路时，弗洛伊德所说的原欲似乎轻易地占据了人的全部生命与意识。

原甸《活祭》的情节套路和英培安《骚动》比较接近。小说男主人公“我”过去在新加坡时也是一名“进步青年”，投入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写诗、搞出版、协助政党竞选等。（虽然他有时候也感到迷惘，但是还是随着大时代的步伐前进）。为了投入更加激烈的社会主义改革，他选择了回返中国的路（他5岁时随母亲和弟妹从中国南来）。

在新加坡时，他常和女友（英）谈论中国，也经常接触来自中国的“禁书”。中国在他的想象中，是一个非常凄美及令人向往的地方。“中国，在他们的话题中是神秘又充满诱惑的。很遥远，但又很近，遥远到他们觉得迷蒙又凄美；但又很近，可是又看不清楚。”⁽²³⁾然而，当他真正身处于现实的政治中国时，他却发现自己受到许许多多的钳制，那么地身不由己，甚至比殖民

主义统治下的南洋还不如，因此他的感叹是深刻的：“多少人一踏上了中国大门便贱如草芥了。广州归侨招待所里闭上眼睛随便都可以抓到一大把，那个张飞，……冒着枪林弹雨，没有死在帝国主义敌人的手中；却在他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中国)，死在自己的战友的手上。”⁽²⁴⁾现实的中国和理想的中国之间的落差与矛盾，就在主人公内心观念的转变上被揭示出来。

由于不满于归侨招待所领导的愚弄，他只在大陆居住了很短的时期，就令人意外地跑到被视为与社会主义革命对立的香港。从此他在那万花筒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流浪了18年，直到他再回返新加坡时为止。当理想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产生巨大落差时，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也渐渐地意兴阑珊了。无论如何，他没有像《骚动》里的伟康不断地往下沉，陷入肉欲的宣泄中，而是找到了信仰的伊甸园，虽然生活在五花八门的香港，但是他的人格却不断地往上升。

为什么仍然要谈伤痕呢？这段历史与六七十年代新马的左派运动有密切联系。当时，左派思想可以说成为新马年轻人的潮流与标志，许多热血青年甚至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回返大陆，但是他们大多数都遭到各种磨难。文革也是对新马华社较引起震撼的事件。⁽²⁵⁾过去在现实政治环境下这些事件被划为禁区，作家避重就轻，较少在文学上被再现。如今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特别是大陆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使意识形态的威胁被减到最低点，因此《骚动》和《活祭》就游走在当权者这一松绑的隙缝中，抓紧这一题材加以表现。

风沙雁的《追逐》对于中国的书写，比较表现出强烈的亲华倾向。在《雪花飞扬，前景苍茫》这一章中，特别写了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台独分子(薛春生)的悔改，反过来成为挺中的海外华人。“看到中国开放后的种种真相，只要有点良知的知识分子，谁若还要搞台独，还要借外国势力与中国为难，谁就是民族罪人。”⁽²⁶⁾他还藉着职务上的方便，“每次当完日本人的通译后，也不管三更半夜，总要邀中方的要员出来喝茶谈天，教导

他们怎样和日本人讨价还价。”⁽²⁸⁾这段叙述被马阳大赞特赞，指为是“书中最能击中时弊的警世之笔”⁽²⁹⁾。《追逐》的这种书写倾向获得中国评论家的好感应该是预料中事。风沙雁(以及一些中生代作家)对中国的积极书写，与中文和中华文化在新加坡逐渐被边缘化或许有关。礼赞“中国”成为了像歌颂母爱那样的亲切，也间接地在“指桑骂槐”。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在国际上声誉大起，新加坡华人(以及海外华人)也感觉与有荣焉。这种亲华援中的书写，还不只以上一例，还有<万顷碧波>中的出身台湾的人类学家李世雄要把毕生所学的献给中国，再也不回台湾⁽³⁰⁾。<海天迷蒙>中主人公建议前同事赵思明把50万新币的退休金捐给中国农村去办学。同一章也刻画一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人类：留美电脑奇才查理王，不只在自己的业务铁板一块的复制上成就非凡，而且还热情地服务华裔美侨的社群。⁽³¹⁾

风沙雁的《追逐》对中国的热情书写，和英培安《骚动》及原甸《活祭》揭示中国历史的疮疤的冷描写不同，但却呈现新华文学较多元的中国书写。风沙雁对中国只有热情，没有伤痕。风沙雁的伤痕是南大(生)的伤痕，就如《追逐》中的那些南大生群像，似一群孤臣孽子缅怀皇朝过去的绚烂辉煌，有着一一种无奈和遗憾的深刻失落感。

3、书写世界(散居)

我们所论述的这三部小说，不只表现岛国风情，反映中国，同时也大写世界。

虽然新加坡政府以华人为主导，但她毕竟是弹丸岛国，他们需要扩大视野、扩大文化与商业疆域，以便能够与世界的脉搏一起跳动。对于南大生来说，由于现实的排挤，他们只好到国外寻找更美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种种因素，使新加坡人走向世界，当中又有不少过着飘泊散离的生活。

英培安的《骚动》，场景涉及新加坡、香港、大陆及加拿

大。男女主人公由于逃避官方的追拿而投向香港，在香港住了大半辈子，再也没有回归新加坡。小说的大部分场景是书写香港的生活。他们在香港打拼，经济状况渐渐进入佳境。本来思想偏左的男主人公，在香港混了一段日子，思想也改变，从偏左转为偏右。富裕起来的达明，不认为自己被物化了。反而振振有词地认为信仰社会主义和享受港式的资本主义生活没有冲突。他还经常和商界的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比邓小平同志至少早五六年。⁽³²⁾无论如何，富裕后的达明很少再参与政治运动(即使有也只是喊喊几句口号)，反之，他沉溺在女人的身体里头。“随着他的有钱和有闲，享受和各式各样的女人上床，成为他的生活艺术”，他有一个似乎变态的癖好，“收集女人们高潮时的表情和叫床声，是他的嗜好……犹如一个嗜读艳情小说的人收集不同作者的作品”。⁽³³⁾他最终为这个嗜好付出代价，他所爱的妻子也搞婚外情，并且离开他，后来他带着失落与无奈只身移居到加拿大。

小说一方面反映男主人公的飘泊与迁移，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原欲/欲望的无法摆脱。这两者看起来矛盾，其实又是合一的。由于人想要满足无限的欲望，使人不断地开拓新的疆域。过去航海家不断地发现新大陆、殖民者不断地扩展殖民版图，都是与欲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在今天这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的欲望当然不只局限在小小的岛国，而是要跨出去，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在现今的世界，族裔散居(diaspora)已经是无法避免的趋势，但有些人离开祖国后就永远再也没有回头了，就如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一样。

无论如何，原甸《活祭》的主人公，则经历了一个比较完美的飘泊与回归的历程。他从新加坡迁徙到大陆，又转去香港，20年后，他再度回返新加坡。他的飘泊又和他寻找真理的历程结合起来。他离开新加坡去大陆，是要寻找社会主义的真理，但是后来他感觉到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真理，在香港时，他才找到了真正的真理——宗教信仰的真理。找到了这个真理后，他也结束了

流浪异邦的生活，重返新加坡。在信仰上的“浪子回头”，也表征在土地上的“浪子回头”，有着一一种双重性的深意。比较《骚动》和《追逐》的所有人物，《活祭》的主人公是唯一去国而又回归的新加坡人，显得分外珍贵！

风沙雁《追逐》里的知识分子群更是散居各地、飘泊四海：从新加坡到外国，从一个国家再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无论如何，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香港、澳大利亚这几个地方还是他们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身世就好比《流浪之歌》里的词一样：“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叫我们到处流浪……”⁽³⁴⁾是的，并非所有的人本来就有意流浪，有时命运作弄人，身不由己。“我们当年找不到工作，才被迫离开故乡的”⁽³⁵⁾“我们这批当年学成归来，想献身国家者，却或因英语说得不够流利，或因偏见与成见。而无法找到可施展所学的工作，只好长期流浪在外国，为外国作育英才。”⁽³⁶⁾这是不少南大毕业生的心声，他们报国无门，所以才选择了四海飘零的生活。无论如何，他们化悲愤为力量，反而更加拼搏与争气，很多在国外因此而闯出名堂，成为世界名校的著名教授、科学家、各领域的专家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南大精神”，即在逆境中永不放弃，自强不息、奋发前进地迈向卓越。

“这是地球村时代，国界已模糊了，唯一能够系住人心的还是民族文化”。⁽³⁷⁾《追逐》中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话语。这些知识分子群虽然不一定居住在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希望能够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做点事。他们有些把目标放在中国，协助中国的科研及义务讲学；也有一些人出钱资助新马的华文教育与华人文化的发展，有些则活跃于当地的华裔社群服务领域等。“华人基本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移居海外，就靠保存母语与饮食习惯来团结在一起，来相濡以沫，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此，发展母语与文化就成为这些华人的共同事业，不管他们移居到世界哪个角落。只要现实情况允许，他们就会办学、办报、组织华人社团、发展中华艺术等。当年陈六使

创办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大，也是居于这样的信念。这样的精神如今由南大生去继承，但是，这又和新加坡的重英语与英美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只有选择移民。在日本大学执教的严开镇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这些基本上对中国语言与文化有相当认识与素养的人，又懂得日文、英文，却远在日本为他国作育英才，这对我们来说是得还是失呢？对岛国来说，是得还是失呢？”⁽³⁸⁾无论如何，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族裔散居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已经不是新加坡人的专利。无论如何，南大生散居世界各地，看来比这股全球化大潮更捷足先行了。

文本特征 / 艺术形式

一、《骚动》

在文本的经营方面，这三部小说呈现多元性的趋向，当然在这三部长篇中，要数《骚动》在文本经营上最下功夫。

英培安在小说创作上有不断创新的自觉，他在《骚动》的前言中说：“我写过两部小说，叙事方法和结构都不一样，而且在当时的新马文坛，这两部小说的叙事方法，还算是相当新的。我希望第三部小说，在叙事方法与结构上都和前两部不同。”⁽³⁹⁾

“我不仅把叙事的时间和情节全打散，从不同的方向叙述故事，还不时与阅读中的读者对话，与小说的主人翁交流，甚至让小说的主人翁离开情节，与读者对话”。⁽⁴⁰⁾

在《骚动》中，英培安通篇都使用了后设的技巧，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后设小说（又称元小说 / 自我意识小说）。在上一段话中，英培安交待了他所用的三种后设手法，让我们个别来审视这些手法的特征。一是叙述者 / 作者与阅读中的读者对话：

小说的女主人翁可能并不爱这个男人，但对他也不是真的完全没有感情。现在她或者不知道，作为小说作者的我是知道的，她并不那么讨厌他。当然，她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是第二天的

事。敬爱的读者，女主人翁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你在第一章就阅读到了。你知道第二天早上，她与这男人一起去喝早茶，然后在地铁里撒下他。⁽⁴¹⁾

这段是叙述女主人公与20多年后重逢的中学同学偷情过后的矛盾心理。他告诉读者，作为作者，他是了解女主人公的心理的。他也提醒读者前一章的叙述，明显地希望读者放慢阅读速度以体会作者的对小说人物与情节的分析。

子勤与达明的婚姻生活，本来是他们俩的事。但既然他们是我小说中的一对夫妻，就变成我的事了。做上帝原来也不容易。如何处理他们的命运？最好是大家都能满意，包括作者我，我的小说人物，当然，还有读者你。而世事总是不能尽善人意。⁽⁴²⁾

作者给读者叙述了他创作过程的一些难题，使读者也可以参与他在创作时的处理手法，他的思考倾向等。作者在与读者的后设对话中，也尽量在心理上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希望能够说服读者他在尽一切所能使小说能写得更完善，以便争取读者给予他更多的印象分。

第二种后设手法是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对话。涉及较多的是作者与女主人公的讨价还价，以说服她同意自己对她的书写，如为她作出抉择，是否要离开他那位喜欢在外拈花惹草的丈夫达明。有趣的是，作者叙述说小说的女主角曾经一度在他的思维中“失踪”了，令他非常的苦恼，小说创作也只好停滞下来，被逼搁置一段时期。至到有一次他去台北开会时，他才终于“找到”她。

“我知道你在对我胡思乱想，就像达明在对我胡思乱想一样。”她冷笑着说。

“因为你突然不见了，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我达达地敲打着键盘。

“我什么事也没发生，是对你的小说厌倦了，我不想继续在你的小说中出现，替你的小说提供任何情节。”子勤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我不愿意被你操纵。因为我不想和达明生活下去。”她的语气充满敌意。

原来女主角子勤因为不同意作者对她的命运安排而“罢工”？作者本来有意让他和丈夫达明复合，但是她却执意要离开达明，她为此事而“失踪”。现在作者把她找回来后，作者只好“允应”她的要求，因此小说情节后来的发展，是女主角仍然留在香港，没有和丈夫移居加拿大。作者藉着和小说女主角的对话，向读者预先揭示小说情节发展的安排，也给读者展示了小说人物的“个性”与不受作者操纵的可能，为读者带来另类的阅读趣味。

第三种后设的手法是小说人物向读者发言：

“我是子勤。你看到作者书写的我吗？他是个男作家。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大部分男作家的小说里，女性，其实只担任陪衬的角色。她依赖男主人公的活动和需要出现，没有个人的生活。

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随作者的摆布与这个丈夫生活下去？我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吗？我的存在，除了满足男人的占有欲外，难道就没有别的意义吗？

小说作者意识到我的逃离，他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读者你看到了，他滔滔不绝地分析我与达明两人的权力关系，但都是他在谈，我在听。当然，这本来就是作者分析他小说人物时的惯例，是作者享有的霸权，他笔下的人物，是没有发言权的。就等作者把他的作品完成后，读者你宣布他死了的时候，我们再痛快淋漓地对话吧”⁽⁴³⁾

这段叙述昭示了作者、小说人物及读者的微妙关系。藉着小说人物向读者表达对作者的不满，这种后设技法在中文后设小说中至少还不是很普遍的。一般地，如何刻画小说人物，如何安排人物的命运，似乎完全听任作者的意志。但是这段言说提醒读者，对于小说人物的塑造，小说人物与读者也有发言权。藉着小说人物对作者的不满，小说人物似乎在追求她的自主权，这种书

写有助于读者判断作者在人物刻画上的成败。小说人物也提醒读者勇于宣布“作者死了”，这句话出自罗兰·巴特，以激起读者更有信心地阐释与分析文本。

后设技巧的灵活运用是《骚动》的附加价值，使文本的形式和技巧上别具新意，至少在新华小说中，还未有人如此通篇全面地使用后设。除创造较新颖的风格外，也具有深层的文本含义。后设言说所制造的一种作者与读者的平等对话关系，也呼应了《骚动》所强调的两性平等的主题，足见作者在文本经营上的用心。

《骚动》的叙事结构也打破直线有序发展的传统，反之一是活泼的排列、自由的穿插、间隔开来但又互相呼应，直叙插叙倒叙的灵活运用，富于跳跃和变化，使读者产生阅读文本的愉悦。另外，在人称方面也常有变换，例如指称小说女主人公时，有时用第三人称：她、女主人公、子勤；有时又用第一人称：我。这种变换经常使读者费神去猜测言说者的身份，考验读者的阅读耐力，不过，另一方面也给读者猜测的乐趣。

《骚动》对两性关系有非常微妙的揭露。长期被男性霸权所宰制的女性勇于追求更大的自主权(尤其是身体的自主权)，并且要摆脱男性的摆布，自由地生活。无论如何，在提倡男女平等的同时，《骚动》似乎又过于沉溺在性爱的描写，过于让自我/个人的力比多宣泄于文本中，虽然可以给读者肉感神经的刺激，但是也容易使人陷入窥探别人私隐的快感中，错失了追求更崇高的美感享受或哲理意涵。

二、《活祭》

原句《活祭》的文本经营较不明显，作者以比较写实的路线去叙述一个大时代下一名知识分子的信仰与家国的选择。这篇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时间跨度相当大，从60年代写到80年代。无论如何，作者善于选取每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横断面加以表现，使整篇文本的叙事相当具有延续性，不会让人感觉松

散。文本中也加插一些诗歌文本(也是很写实的诗),有助于叙述的推展,同时也增添文本的不同色调。另外文本空间场景的转变,即从新加坡、大陆、香港、新加坡,形成了一个环状形的叙述结构,这与主人公的深层意识发展,特别是他的对宗教信仰的“回归”,以及他从散居他国到选择回返故乡连成一线。在《骚动》《活祭》《追逐》的众多表现从新加坡离境的小说人物中,就只有《活祭》的主人公是重新回归岛国的,在小说结构中也形成了完整的圆圈。

三、《追逐》

风沙雁的《追逐》和原甸的《活祭》在文本的形态上较为相似,属于比较写实的风格。《追逐》尝试营造一些文本的效果。作者在简介里说:“此部小说可分为五个部分,故事并不是连续性的直线发展,结构由类似《儒林外史》似的‘金钱串珠’方式组合”。确实,这部小说是由五篇在情节上并不相连续的短篇所结构而成,类似由短篇组合成长篇的结构,一般必须在话语形态与文本形式两方面有微妙的关系。

在话语形态上,这五篇都是书写一群在国外闯荡的现代华裔知识分子(尤其是南大生)的群像。他们大都精进奋发,化悲愤为力量,追求学术与事业上的卓越。他们在成功之余,又不忘回馈发展自己的母语教育与中华文化事业。在话语特征上这五篇短篇确实能够串连起来。

无论如何,在文本形式的连贯上,这部长篇显得有点脱节。作者/叙述者在“前言”中说:这部小说是从整理曾民颖(真名隐)的日记所发展出来。曾民颖与太太都是南大60年代的毕业生。作者/叙述者在飞机的隔座上发现他所遗留下的日记。“我花了好些时间,把曾民颖的日记整理,加上篇名,故事中的人名也略加更改,以免触及真人真事,就这样我把他的日记拿来发表。”⁽⁴⁴⁾

按照作者/叙述者所说,这5篇短篇小说应该都是源自于曾

民颖的日记，照理每一篇也应具有曾民颖的影子(因为日记是最个人化的)。无论如何，除首篇《相思遗恨，枫叶飘情》外，后四篇中曾民颖的踪影却不知去向，反之，却有浓厚的作者形象在里头。我怀疑，这5篇是作者在不同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在出版时把它们凑成一部形式结构松散的长篇，再写了一篇与下文不很对口的前言。而且，从叙述的视点分析，《追逐》也和《活祭》一样，带着浓厚的自传色彩。此外，《追逐》一般只重外在的叙述和描写，鲜少使用内在的心理语言，失去向读者揭示人物内在复杂心理的可能。在叙述的开展上，《追逐》也较样板化和平面化，通常制造很多巧合的机会，小说人物多数在餐厅碰面，然后一起用餐喝酒聊天，小说叙说一般就从餐桌上发展开来。

余 论

这三部小说展现了新加坡共和国三位资深作家的文学言说。《活祭》从比较个人的层次书写个人的信仰追求与家国选择。《骚动》从两性关系触及原欲的沉溺及女性意识的觉醒。《追逐》则从知识分子的群体去展示他们的彷徨与奋进，对于家国的爱与恨。他们的文学话语形态与文本特征也代表了他们这一代新加坡人的共同社会关怀与美学趋向。其中所涉及的有属于“大叙述”的南大精神、左派斗争、文革、中国统一、改革开放等；也有“小叙述”中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个人的信仰追求等。在文本的特征上，三部长篇也展现了多元的形态，既有现实主义的存留，也有后现代的文本结构。或许像《活祭》、《追逐》较写实的文本模式将随着他们这一代的淡出而逐渐退出文学场域；无论如何，类似《骚动》的后设手法或许将逐渐在文坛上崛起成为新宠。

(作者单位：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

注释:

- (1) 英培安:《骚动》,台北:尔雅,2002年。
- (2) 原句:《活祭》,新加坡:玲子传媒,2002年。
- (3)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年。
- (4) 原句:《写在书前》,《活祭》,第7页。
- (5) 英培安:《关于骚动》,《骚动》,第1页。
- (6) 50年代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时称为马来亚)的华校都发生学潮,华校学生群起抗议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主要是限制超龄生就读与改变会考语言。这股学潮背后又有左派思想的渗透。导致当局采取严厉的行动,如开除学籍对付参与学潮的学生。
- (7) 原句:《活祭》,第195、198—199页。
- (8) 王赓武认为,相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较以社群及地方观念为中心,新加坡的华人建立了较清晰的国家身份认同。王赓武:《地方与国家》,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出版,2002年,第17页。
- (9)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64页。
- (10) 原句:《活祭》,第16页。
- (11) 原句:《祭》,第19页。
- (12) 原句:《活祭》,第37—38页。
- (13)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50页。
- (14)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50页。
- (15)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123页。
- (16)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120—124页。
- (17)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64页。
- (18)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21页。
- (19) 英培安:《骚动》,第265页。
- (20) 英培安:《骚动》,第56页。
- (21) 英培安:《骚动》,第266页。
- (22) 英培安:《骚动》,第271页。
- (23) 原句:《活祭》,第36页。
- (24) 原句:《活祭》,第183页。
- (25) 中国对新马华社较具影响及震撼的运动或事件还有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援华抗日、改革开放、六四事件等。《骚动》的术尾也有一段叙述男主人公(达明)父子辩论六四镇压事件的课题。
- (26)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98页。
- (27)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98页。
- (28) 马阳:《又见芳草绿天涯》,《追逐阳光的人》,第10页。
- (29)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76页。
- (30)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164—165页。
- (31) 英培安:《骚动》,第126—127页。
- (32) 英培安:《骚动》,第132页。
- (33)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71页。
- (34)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70页。
- (35)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42页。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21页。

- (36)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第124页。
- (37) 英培安：《关于骚动》，《骚动》，第2页。
- (38) 英培安：《骚动》，第3页。
- (39) 英培安：《骚动》，第44—45页。
- (40) 英培安：《骚动》，第183页。
- (41) 英培安：《骚动》，第225—229页。
- (42) 风沙雁：《前言》，《追逐阳光的人》，第16页。

辑四

哀
伤
精
神
家
园
树
枯
花
凋
谢



动听的歌要用真情来唱

——评风沙雁的《追逐阳光的人》

·海南会馆文学读书会乙组会员·

前言里，作者托词‘这本小说是从飞机上捡来的日记整理出来的文章’。

说是托词是因为在小说里，我们找不到“曾民颖”这个日记本子的主人。

据说曾民颖是南大生，60年代开始旅居美国，但是，在《万顷碧波，一脉清流》这篇文章里的“我”是瑶岗，在《雪花飞扬，前景茫茫》这篇文章里，“我”是三十出头才首次出国到日本工作的年轻人；《海天迷蒙，春无归处》里的施泽恩是在“淡马锡日报”任职……其他篇章，我们也寻不着有以美国生活为主角的主角。

这托词是导演给女演员加上去的轻纱，似乎是要把身子掩盖，却又搞了些水。让轻纱后的凹凸玲珑全真实地呈现在众人眼前。

欲盖还彰的手法，恰恰是要引人张大眼睛去看。

小说由五篇文章组成，每篇都有一个八个字的标题，颇有诗意。文章与文章之间并无关联。人物都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叙述一群受华文教育者或前南大生，漂流海外的故事。作者以《追逐阳光的人》为书名，是一个总标题，暗喻这些流浪者在走出阴暗的家乡后，如何在异乡寻找生活的阳光。因为是

“日记”，所以篇章之间的联系就不需要那么严谨，小说的情节也可以较为散漫和沦为其次。

山光水色，春花秋月，在作者感性的笔触下，呈现了一幅幅动人的景象。请看：

“樱花盛开的大石寺的周边简直是一片仙境，微雨在嫩寒的清晨淌着，樱花带着雨珠在轻风吹拂下飘洒下来，呈柠檬黄的树叶饱含着露珠晶莹发亮……”。

“我与妻漫步在小径上，竟有点进入少年情怀多伤感的境况的感觉，隐隐约约里，我怀念起青年时代寄读的云南园来了，不过，哥大怎么说都比细雨蒙蒙的云南园更撩人情思，尤其在这枫叶红透的仲秋，周遭菊花绽放如春，万紫千红，与青松翠柏的绿色一相映，就绝似一副彩画了”。

情景交融，引人无限遐思。

“这是九月的某日的黄昏，夕阳照在绿油油的草原上，成群的牛羊蠕蠕而动，在啃吃着嫩草，倦鸟回来了，有的歇在牛背上，有的在低空翱翔，构成了一幅初秋黄昏的农家乐园。”

轻轻数笔，情趣跃然纸上。

作者以散文的笔调写小说，给小说增添了不少诗意和可读性。而散文松弛的结构，却教小说少了一份扣人心弦，引人追读的吸引力。

小说中的人物众多，其中“相思遗恨，枫叶飘情”的余敢笑，冯欣菊，《万顷碧波，一脉清流》的李世雄；《雪花飞扬，前景茫茫》的薛春生；《湖光潋艳，心系何方》的高思民，黄惠韵；《海天迷蒙，春无归处》的姚映红，都写得很成功。

《万顷碧波，一脉清流》是篇幅最短的一篇，约有四千多字，但是，热血汉子李世雄的形象就非常突出，非常生动。

李世雄在台大念书时，曾因为组织秘密学习小组，而被逮捕并打断数条肋骨。

残酷的环境并没有把李世雄击倒，李世雄在夏威夷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我现在能做的是点点滴滴的工作，我经常到内地的少数民族的地带去考察，回港后再做报告，我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对中华民族的前进有点帮助。”

李世雄那股知识分子的热忱与执着教人感动。

这篇文章读起来，散文的成份比小说的味道浓得多。

为了保持瑶岗与李世雄交往的真实性，在不同的见面时候，陪在瑶岗身旁的分别是“前妻”和“新婚太太”，这只有纪实散文才有的，否则，都会因为行文方便和情节需要而重新安排。

《海天迷蒙，春无归处》里的姚映红，是个悲剧人物。

一个女人因为专业人士的丈夫过于古板，下堂求去，过后，却因为“要找个家歇息歇息”（166页），就嫁给了62岁的道森。

“对我还不错，他每个月给我二千加币当零用钱。”映红低声地道。

而道森又怎样看待映红呢？

“映红，你跟我闭嘴，你这不知感恩的华族妇女，你和其他华人移民一样，都是来加拿大检现成果实的人。”（153页）

“我知道她的目的，她一拿到公民权，就会离开我的，对吗？亲爱的。”（156页）

文化的差异，种族的歧视，映红怎么可能长久忍气吞声？最后，映红决定走了。

93年3月映红离开了道森，是年十月她又准备嫁给开餐馆的63岁的老华侨了。

“雨中的维多利亚市景致非常迷人，各色菊花盛开，树叶绿油油，枫叶红彤彤的，远远望去绝似一幅春色无边的仙境。映红回头看颖慧与泽恩，他俩正谈笑风生，映红心里一酸，一滴眼泪无声掉下。在这异乡的秋雨，映红突然感到前途茫茫一片。”

当映红还在为个人的生活挣扎的时候，却有一批如张华辉老先生这样的人，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还出钱出力的想为大家做点有意义的事。这是多么不同的两回事？多么不同的精神面貌？而海外华人“弘扬中华文化”，不正是作者要表达的正面意义吗？

故事如果能以187页，大家唱《龙的传人》的那个场面作为结束，我想：读起来心头会比较轻松，眼前还有一丝光明可以期待。

整部小说，在主角的背后，却有许多人物轮番上场。这些有名有姓有来历的群众，以《相思遗恨，枫叶飘情》为最多，他（她）们的出场率占了故事的六成以上。对每个人，作者都给予细心的描写。比如：

“夏木52岁，中等身材，粗眉毛，薄嘴唇向左右两边翘上，有股刚毅之气。由于长期在一所妇产科医院工作，接触的女病人也不多，夏木为人木讷……”。

“英豪身材高大魁梧说话声音洪亮，脾气有点暴躁，一遇到不满的事就会感慨激昂的争辩……”。

在《相思遗恨，枫叶飘情》里头，这样的人物约有十四位，为了公平起见，每人都分到几句台词。这好比拍团体照，虽然已用上了精良的摄影机器材，照片中的每一张脸孔也都清晰可以辨认，但是，对着一大张人头密集的照片，要说上谁是谁，就不是那么好办了。

马阳先生在《又见芳草绿天涯》里这么写道：“其实这五篇日记，只是匆匆一瞥，远远容不下这群“南大生”风雪长路的人生故事，《追逐阳光的人》里写景状物叙事多是带感情的提纲式文字，若能展开来，精致经营，便是很有创意，创新的反映国际题材的长篇小说了。风沙雁是有优势的，已达不惑之年，且眼高手不低，应该是可期许的吧！”

马阳先生这些话，可圈可点。

作者在《前言》里说：整理旧书堆时，只发现一册“日记”，另一册却找不到，所以他整理出来的就是那五篇文章。

我们相信，作者再细心找一找，就一定可以把第二册找着。

丁云在《文艺城》的评论文章《漂流与追逐》中写道：“风沙雁的小说还未碰触及政治、学潮、冤狱等领域。更激越，更震撼的“漂流文学”，等着风沙雁去开拓，更高亢的高音，等着他

去歌唱。”丁云先生敢如此“点歌”我想他必熟知风沙雁的歌艺。

刘三姐唱的是山歌，却深入人心，因为她唱出真情，唱出人们的心声。

动听的歌要用自己的声音来唱，要用真情来唱，低频率一样可以教人热泪盈眶。

2003年5月28日

原文刊《新世纪学刊》第三期
(新加坡：斯雅舍2003年)



阳光还在地球的另一边 ——读《追逐阳光的人》的感悟

· 海南会馆文史读书会甲组会员 ·

《追逐阳光的人》这本散文小说是由五篇类似日记的文章组成，其中三篇说的是“南大生”在海外的生活。

《追逐阳光的人》是一个总标题，它标明了书中的主人翁当时在国内由于受到社会的歧视与排挤而飞到国外，并以各种方式来提升自己，来寻找生活的阳光。

作者曾这么说：

“在云南园四年的学习生涯，南大湖是我精神的寄托所在。在夕阳映照的黄昏，在微雨缠绵的清晨，在月光洒落的夜晚，在薄雾笼罩的黎明，南大湖都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它的美。”

南大湖、相思树、八角亭、行政楼、永祺厅、篮球场……云南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教南大生梦萦魂牵。即使浪迹天涯，作者也不能忘怀那段在“云南园”的青春岁月。在《追逐阳光的人》这本书里，作者写尽了南大生强烈的南大情意结。

在第30页作者这么写：“曾在云南国寄读过的南大生，谁没留下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毕业后到何处去觅职，受尽歧视与冷落的南大生，有些毅然远赴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等先进国去深造……”

“对前途的担忧，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这使南大生纵使多么柔情似水，也必然兼有几分刚毅之气。”

南大在一九八〇年关闭，这更叫南大生耿耿于怀。

南大与新大合并为国大，“南大生成为一些校友所称的‘亡校奴’，这种悲怆的情怀是南大生团结起来的力量，这股团结的力量使南大生即使是生活在天涯海角，也永远忘不了民族文化”。作者又这么写道：“什么叫南大精神？南大精神就是华族捍卫他的民族教育权利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第37页作者借深思的口发起牢骚来，他这么说：“我在当年毕业时，就曾梦想重回母校服务，把我的一生献给弘扬中华文化的事业上去，这个梦在十五年前被人戳破了，我的前景茫茫，怎样向前看？”

这番话道出了南大生不能实现回馈母校梦想的感慨，对前景的迷茫。从“叫我们捐款协助发展南大，南大精神还在山岗上吗？”这句话，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心中的愤懑。第51页，秋韵说：“看看这浪涛滚滚的景象，你就会想起文化的延续问题，但南大生是止于欣菊，湘涵，敢笑这些人了，南大生会随着岁月的消失而一个一个消失，而终于成为历史名词，南大生是没有后浪推前浪的景象的”。

眼看着南大生一年比一年少，作者难掩心中的悲情。

第53页深思说：“我曾经为文化与母语问题苦恼过。但近几年来，我已心灰意冷了，我不再为此而郁郁不乐。我开始领悟到这么一个道理：一种文化并不会因为某一民族的支流的放弃而消失……知音不一定要在故乡找……”她说出了他对岛国的文化与母语的失望，内心的那种失落感。

纵然心中充满愤懑，但是，这群南大生并没有停留在关心南大，怀念南大的层次，他们关心中华文化，把弘扬中华文化当成一种理想。

第125页高思民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要献身而无处的社会，我们只好到处漂泊……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一生凝聚为一点小水滴，投进浩浩荡荡的文化长河……”。

虽然他们身在异乡，但是，还是愿意为文化传承薪火。

第127页，“更叫黄惠韵难忘的是……这批在伦敦时代结识的朋友，在这东西方文化互相荡击得异常厉害的时代，他们不只维护了本民族文化，还在生活中竭尽所能的弘扬本民族文化。”在本小说中有几处一再地强调了民族认同的观点。

第79页写道：“我一向主张，凡人都有权利选择居留国，但却无权选择民族认同……一个人只要在一生中曾做过对民族或全人类的进步有促进作用的事业，他就是一个好人。”因此，对于台湾的李世雄，虽然家在多伦多，人在港大，但作者认为只要他的心仍向着他的祖国，向着他的民族，对民族又有所贡献，他就是一个好人。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已经走出了南大情意结的圈圈。

作者在日本生活了5年，对日本文化有很深的认识，对于日本人将文化融入生活的态度，非常崇敬。作者说：“来到这气候文化迥异的扶桑，心灵受到很大的震荡。”他说：“我初到东京，就深深感受到唐诗宋词的意境就流泛在它的公园里，小巷中，民居里……”作者在日本文化当中发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子。但是，在享受这文化浸濡当中，作者却这么说：“日本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罪恶深重的过错，我一向对日本人并不好感。”

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不单只存在于对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他对于岛国，岛国的人民，作者也是如此地爱恨交加。

让我们来看看在第106页程超兰对岛国人民的这些尖酸刻薄的话。

“新加坡男人连五块钱都不值……新加坡男人很少有气质的。”第108页借惠韵的口，批评新加坡女性赴约时又装模作样，丑态百出，平日作风粗俗，语言尖酸刻薄，一点也没有女性应有的温柔本色。

第122页惠韵说：“许多人在岛内因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又没有相对提高。卡拉OK厅到处都是……一到夜晚，男人

都涌向卡拉OK大厅去……连白天在课堂上板起脸孔教训学生的教员，夜里也丑态百出……”第124页惠韵又说：“岛国的一些华人，数典忘祖，有些还以身为华族后裔为耻，这真是岛国的悲哀。”“一些伪君子在思潮消退的现在，都变得自私，无情无义，损人利己……”

这种种的评语，可以说，都是由于爱，才会发出如此严厉批评，如果不是对于国家民族有如此深的爱，如果不是还有梦，瑶岗还会“带着个梦回到故土从事文化界的工作吗?(99页)”。我对故乡的薄暮的感受，竟然是一如异乡的那么苍凉。日本的冬的薄暮给我于苍凉感，如果是乡愁与异乡文化的挑逗，那故乡的薄暮给我于苍凉感，却是因本族文化没落而来的悲伤。”

异乡苍凉故乡也苍凉，这种种复杂与无奈的感情，可以说频频流露在书中的每一篇。

到底《追逐阳光的人》是否把阳光给追到手了呢?让我们来看看这几篇文章的结尾吧!第73页“秋雨还在渐渐沥沥下着，街道旁的霓虹灯把枫叶映照得更为殷红。这秋雨洒枫叶的情景，真的慑住这群南大生的灵魂，他们选择继续流浪的道路。”

在“雪花飞扬，前景茫茫”的结尾这么写着：

(99页)“我独自坐在靠窗的咖啡座的椅子上喝啤酒。窗外的雪连绵不断地下着，下着，周围苍茫一片，恰似我今后想走的道路那么扑朔迷离。”

从这两段结尾的描述，看来是前程未卜。

作者文章的结尾都写得蛮有诗意的。例如：第143页，“天色已向晚了，运河尽处现出一道颜色非常绚丽的彩虹，游人都啧啧称奇，陈小雄边走边追逐着海鸥和塘鹅，突然有人丢了一块小石头，惊起了两只塘鹅，它们展翅缓缓地飞向那彩绚丽的天边，恰似思民和惠韵今后追寻的生活远景，异常灿烂，但也有点渺远”。

噢!一个在秋，一个在冬，一个“向晚”，秋雨，冬雪，向晚的彩虹，这种种情景除了苍凉，还有几分的沉重。我们看到

的，阳光似乎还在地球的另一面。

2003年5月28日

原文《新世纪学刊》第三期
(新加坡：斯雅舍，2003年)

辑四

哀
伤
精
神
家
园
树
枯
花
凋
谢



知识分子的心灵画卷

——从《追逐阳光的人》看南大生的悲情与奋发

· 柯碧琴 ·

(一) 前言

《追逐阳光的人》下文简称《追逐》，它是风沙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沙雁原名欧清池，新加坡人，毕业于南洋大学。

《追逐》是以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华文知识分子（南大生）在政策的改革及社会的排斥下，被逼到异乡留学以追寻各自远大的理想为题材所创作的。从2003年出版至今，只有五、六篇的评论文字，其重点是论述语文教育制度的改变和双语教育的偏差，导致华文知识分子，尤其是南大生面对求职谋生的困难及离乡背井奋斗的经历，笔者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更深入研析华族情结与知识分子心灵的感受。

《追逐》里的人物，事件等社会现象的描绘深入地反映华文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奋斗与旅居异乡孤独漂泊的感伤情结。作者也极力赞颂这批南大生不忘发挥“南大精神”的优良传统。小说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识。

《追逐》由五篇“日记”组成长篇小说，采取了《儒林外史》金钱串珠的方式结构的。风沙雁以灵活的手法安排不同类型的人物出场和叙述似断似续的故事情节。作者早期擅长于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曾任职于报馆，经常发表社论，加上多年旅居日本和个性喜爱游山玩水，累积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其思想的深邃、

视野的广阔和古典文学修养的深厚，在《追逐》的叙述中散发出浓浓的诗情。写景、状物、叙事都带有浓厚的诗人情感。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因社会的需求而相异。在新加坡建国初期，以华人移民为主的岛国施行双语政策，即华文和英文为主的教育方针。在70年代时期，岛国政府为了经济与对外贸易的需要，也为了改善国人谋生就业的机会，极力推展英文为主的教育政策。于是在1980年关闭南洋大学，“在1987年全国中、小学实施统一源流的教学，以英文为唯一教学媒介语，至此，纯华校已不复存在了”⁽¹⁾自此施政者与国人对华文这学科的冷漠与歧视，导致华文水平的急速下降，国家虽然取得了经济上的繁荣，但也带来了‘后遗症’。华文刻苦耐劳的优良传统被西方物质享受主义所侵蚀。

风沙雁在书中说道：

“在一个绝对讲求功利的社会里，念文学系肯定没好出路。”⁽²⁾

“一个满脑子充满理想与浪漫想法的人，在讲功利的社会里生活，除了处处碰壁外，也很难找到知音，生活就会显得非常寂寞，这种经验我感同身受，……惠慧一想到就要回到四季皆夏的热带国土，在处处充满铜臭的环境中生活，心中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³⁾

这对接受华文母语教育的华族来说是件很痛心的事实。身为炎黄子孙的华人，眼看着华文日益式微，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渐渐的湮没，精神家园的空虚，加上华校毕业生遭受排挤而被逼迫到异乡追寻理想。风沙雁将这一切分篇记录成长篇小说《追逐》，主要以南大毕业生的际遇与关怀华族文化的挣扎情结的描述为题材，让我们对这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二）《追逐阳光的人》的创作意图

随着物资生活的改善，现今许多年轻人已失去了坚持到底

的毅力。这些在温室里成长的新一代岛国人民经不起挫折，遇到一些不如意之事，就放弃理想而自暴自弃或自甘堕落，“南大精神”的消失可说是国家与民族的极大损失。难怪风沙雁坚持强调学习华族文化重要性的信念，他深信通过语文和文化的学习能确保华人优良传统的留存。作者目睹70年代教育政策的偏差，造成具有才华、效忠感的华文知识分子的流失，他经常为国家、民族的损失而感慨万千。

“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⁴⁾，风沙雁曾经说过的这句话透露出他创作生涯的精神内涵。这个精神家园是建立在他具备悠远博大的华族文化传统、自觉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上。风沙雁眼看华文文化急速衰微，他在《风沙雁文集》上卷里写到：

“民族与文化，有时困扰得我无法解脱”⁽⁵⁾

作者对岛国的文化建设、华人文化的延续与失落问题极其敏感与关心。他那储存在心里的华族情结下意识地注入小说中的人物，让笔下人物成为他感情的代言人，这是他创作《追逐》的原因之一。

作者的另一个意图应该是把南大这教育事件放置在历史的长廊里，从而展现比较完整的历史面貌。《追逐》的时间跨度相当长远，作者经常回忆起三十、四十年的前尘往事，时空跨度也相当广阔，从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澳洲、美国至加拿大等地。小说全面描写侨居海外的南大生的生活境遇与理想抱负。《追逐》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意义。风沙雁怀着浓厚的华族文化情感，不愿南大的关闭和华文文化被边缘化的事实遭受埋藏成为历史化石，他毅然执笔再现南大生的悲情与奋发事件。从小说里的人物对话与经历里，揭示出许多具备本土意识的人才对家国的爱戴，从而吐露他们关怀华族民族意识与文化的心声。

（三）《追逐阳光的人》中南大生的悲情与奋发

（1）南大生的悲情：

A. 南大生的失落感

南洋大学是大众平民捐钱创立起来的，也是早期华人移民辛辛苦苦出钱出力为华文教育创办的第一所大专学府，仅仅过了20多年之久就被关闭了。这对华族子孙和所有南大生来说是件很残酷的事实，大家心里难免感到非常惋惜和悲哀。

南大与新大的合并，许多南大生想回返南大献身的理想破灭了。以往就读南大的南大生因路途遥远、加上交通不方便，大都寄宿在校舍里，同学们朝夕相处，彼此帮助。大家一起温习功课、一起切磋、用膳和运动，休闲时就在一起谈天说地，所建立起来的友情如同手足般的深厚。当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彼此互相倾诉、安慰，即使是在感情失意时，都能给予扶持，像是一家人似的。就如当年的于深思、李利民和吴思中：

“他们三人一年内都先后失恋，也因此他们相濡以沫，一起打球发泄怨恨，一起讨论问题以渡过艰难的日子。”⁽⁶⁾

南大生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涯所建立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们日夜对着南大周边的景物，对于南大的一草一木都难于忘怀！

“景物虽依稀可辨认，人事却已全非，南大已成为“历史名词”，怎能不哀伤呢？”秋韵说。⁽⁷⁾

这些南大生眼看着南洋大学的消失，大家心里的失落情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文本中所提到的南大生在那段大学生涯里的一点一滴所培养起来的感情是如此的亲密珍贵，南大对他们每个人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更增添了失落与哀伤的情结。

南大是岛国唯一以华文为主的大学被逼关闭了，加上中、小华文学学校的消失导致华文水平日益低落。这一切不幸的事件对“南大生”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

“凡在七十年代或甚至更早的六十年代，曾在云南国寄读过的南大生，谁没留下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是风云激荡的时代，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混合着对飘晃在众人眼前的一道人类的彩虹的理想的追寻热忱。”⁽⁸⁾

这也是促使知识分子感到极其失落的原因之一。

这批刚从美国归来的南大校友来到南大旧校门口所在处，他们坐在车里透过密密的雨帘，看到南大校门牌坊耸立在野草丛中，狂风夹着密雨飘打牌坊，像是凄风苦雨中的荒墓，校友们宛如回来母校凭吊似的。各人心中涌起了一股“亡校奴”⁽⁹⁾的哀情，这批南大生的脸上都流露出浓浓的失落与惨遭遗弃的悲情。

几位南大生于深思、萧湘涵、黄慧萍、何秋韵和李利民等人相聚在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上，他们住进南大校舍里，心中有无限的感触。宿舍的装饰与旧日的南大实在是天渊之别，虽然现今的装饰比以前更为美丽，但却勾起了各人心底的失落情怀。就如文中所提到的：

“真的是江山依旧，人物全非。”秋韵感叹道：“从踏进新校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觉相思树全被砍尽了，从路边走着的学生脸上，也感受不到当年我们那股追求理想的毅力与神情。”⁽¹⁰⁾

通过这些触景伤情的描绘字句，明显地透露出南大生心里所隐藏着的失落情结。

B. 游子的漂泊感

南大毕业生由于英文程度不够好，在就业方面往往被拒之千里之外。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几经辛苦终于在外国闯出一番事业。这些南大生的际遇多多少少都是因为教育方针的偏差而只好自我放逐，他们心中难免感到郁闷和不满。有些南大生虽然扬名国外且物质生活丰富，但心灵的空虚却令他们感到犹如“海外的遗孤子”。

那个时代有许多土生土长的南大华文知识分子在国外留学后，学有所成愿意回国献身服务，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再次流浪国外，过着漂泊的异乡生活。

例如：李利民在二十年前考取了华盛顿大学的高级化学博士，回来应征工作，主持人冷言冷语对他说：

李博士，你所学的知识太专门了，我们的社会还不需要。就这样一句话把利民赶回西雅图去了。他和妻子一家人就从此在外国居住生活，内心自此蒙上了游子漂泊孤零感的阴影。

又如《追逐》里提及的章夏木和程英豪。章夏木是妇产科医生，不能为自己岛国人民治病而感叹道：

“我这一生接生过多少日本人来这世间，但到今天，我还没机会接生过一个新加坡婴孩，我多心痛呀！”⁽¹¹⁾

程英豪是眼科医生，他也说：

“我医好多少眼睛有毛病的日本人，让他们更清楚更全面地看清这世界的丑与美，但到今天，我还没机会医治一个眼睛有毛病的国人，使他或她更明亮地看清这社会的丑陋与美好。”⁽¹²⁾

这些学有专长的国人不被接纳入主流社会里，他们不能在自己土生土长的故乡生活，长久侨居异乡，连为自己同胞服务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他们的心里既难过又感慨！

岛国人民不能在本土施展才能，他们长期移居异乡为他人做“嫁时衣”。这些游子一直带着有家归不得的哀伤情感流浪异乡，心里充满着无限的漂泊与孤独感。

这些南大生的身世就如《流浪之歌》里的歌词一样：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叫我们到处流浪……。”⁽¹³⁾

的确是，并非所有的国人本来就有意流浪，而是有时身不由己，命运作弄人吧！《追逐》中的吴思中等人就是当年找不到工作，被迫才离开故乡的。还有许多当年学成归来，想献身国家者却因英语说得不够流利，或因偏见与成见而无法找到可以施展所学的工作的人才，只好长期流浪在外国，为异乡作育英才。

这是许多南大毕业生的心声，他们报国无门，感到非常彷徨无奈，只得选择了四海飘零的生活。

从南大生相聚时的感伤情绪，让读者深深地体会到这批南大生心灵深处的空虚与漂泊感。

小说中提到在1997年的秋天，于深思、萧湘涵、章夏木、程英豪、李秀乐等人到温哥华出席余敢笑和冯欣菊的婚宴。他们在吴思中、何秋韵、李利民和黄慧萍的陪伴下到卡比拉诺吊桥游玩，同时去参观鲑鱼回溯。

作者在小说中详细描绘鲑鱼回溯的艰辛情景。鲑鱼在河流源

头孵化出生，在大湖中长大，后沿着河水流入大海。到了大海洋中去挣扎求生存，经过四年后再溯源回到出生地产卵。产卵后便死亡。一对雌雄交配的鲑鱼可产四千颗鱼卵，只有八百颗孵出小鱼。那八百条小鱼在湖泊中生活，约有两百条可保住生命，游出大海洋，经海豹、大鲸和渔人的捕杀，仅有一对雌雄鲑鱼回到出生地。这些鲑鱼历经凶险，长途跋涉都要回到出生地传宗接代，令这批有家归不了的南大生发出无奈的感叹。

“鲑鱼尚且懂得回到出生地传宗接代，我们这批流落在外的南大生，却只能客死他乡，只能一生为他国作嫁时衣”章夏木感叹道。⁽¹⁴⁾

“鲑鱼懂得回归，但也有回归之路呀！我们有回归之路吗？程英豪生气地说。⁽¹⁵⁾

“不是你们不回归、不报恩，是要报恩而无门。”于深思补充着说。⁽¹⁶⁾

这些移居国外的南大毕业生长年承受着精神上孤独、空虚的煎熬，游子的漂泊感越发更深，心里的哀伤可想而知。

C. 人文文化的贫瘠

风沙雁是忧国忧民的，在他的一些篇章中，他认为一个精神贫弱的国家是很危险的。

“创造物质，为了生存，创造文化，却是为了丰富精神生活。一个没有丰富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乏味与单调，一个由没有丰富精神生活的国民组成的国家，也必是精神疲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惊涛骇浪冲过来时，必然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掉。”⁽¹⁷⁾

南大与新大合并后，华校也跟着关闭，华社的热情已消退了许多。真正想学习华文的华校生纷纷越洋远渡中国深造。本地孩子学习华文的兴致大为减低，有些孩子完全放弃学习华文，许多父母甚至为此而举家搬迁移居外国。

有些人更以会说华文为羞耻，例如小说里的辜古喻和辜太太都是南大生。他们不仅在家里用英语和子女交谈，当遇到老同学

时也避免用华语交谈，而讲英语。文中写到：

“辜古喻不说华语而讲英语，为的是要掩盖他出身南大的事实，因为华校生挤进上流社会的绝无仅有。所以，在岛国，你时常会遇到明明是受华文教育的人，或为了炫耀，或为了时髦，故意在谈话中穿插一两个英文单字，什么‘我很b l u r’啦，‘我要找h a p p y’啦。”⁽¹⁸⁾

他们在交谈中特意掺杂一些英文字母或短句，华语、英语杂混应用是很普遍的现象。结果两种语文都学不好，真是两头不着岸。华文文化的话剧等演出大量削减了，华文著作的出版也大大减少，华文读者群也跟着缩小。其实早在80年代风沙雁就担忧华文语文的问题，如他的散文文集里所提到的：

“随着教育政策的改变，英语已成为这小岛的强势语言，华语在四面受困的情况下，已出现用词作襟见肘的窘态。较年轻的一代讲华语夹杂着不少英语词汇，严格地说，并不是可喜现象。”⁽¹⁹⁾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华文报章与书籍的读者日益减少，二十年后，华文报章的读者会骤减。”⁽²⁰⁾

“这叫人黯然神伤的时代，……深思所写的文章，是要有读者群才有意义的，而现实是，每死了一个受华文教育者，深思他们的报章就少了一个读者，而新的读者增加得非常慢，去者远远超过来者，你要是报人，你能不情伤吗？”⁽²¹⁾

“……华文水准一日比一日低落，年轻人能阅读华文书报的与日俱减，我们的行业是夕阳行业，文风不振，受华文教育者士气低沉，大家都相当消极。”于深思幽幽地说⁽²²⁾

母语文化读者群的缩小，岛国里真正懂得中华文化精髓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了。

《追逐》批评功利主义的泛滥。部分岛国人民所追求的是金钱、公寓、汽车等俗气之物。他们仅追求物质的富裕享受，而忽略了精神文化的需要。

难怪黄蕙韵赴盲约后，发出以下的感叹。

“在这岛国生活，不少人都只热衷于追求 5 C，为了个人的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卖友求荣，出卖原则，……什么国家利益，民族文化，在这些人的字典中是不存在的。男士们饱食思淫，卡拉 OK 如雨后春笋处处冒出，一出而出的爱情骗局不断上演，一个又一个的美好家庭破裂了。像柯冬生、陈彼德、余碧玻、仓南发这样的临老入花丛者比比皆是。他们利用单身女性的急于择偶的恐慌心理，到处骗取爱情，廉价售卖自己的虚假感情，导演出一段又一段的爱情戏剧来。”⁽²³⁾

《追逐》里以下的叙述片段也透露了岛国人民鄙视华文的心态。

“惹韵说得对，一些岛民确教人失望，他们竟把学不好华文当成一种光荣。你知道吗？”⁽²⁴⁾

“……什么名流的儿子因华文考不好而到英美大学深造，而其父母又到处像播送一段光荣史一样播给人家听，那是另一种社会病态。这种人深受殖民地主义者的毒，以不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荣，如果经济上做得到，他们甚至会去漂白为白人呢。”思民越说越激昂。⁽²⁵⁾

无可否认，英文是走向经济繁荣的重要媒介语文，许多人因此以懂得英文为荣而轻视接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早在殖民地时代，有些人向往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过着自以为是英国绅士般的生活。其实，这些人放弃了母族文化，对英国文化也只知道一点皮毛而已。他们既不读英国文学，也不听歌剧，古典音乐，就只知道喝下午茶。这些人为了的是拾捡便宜货。传统的英国下午茶，只是一壶奶茶，几块饼干，至多一两个小的烘面包，讲究的是情调，悠闲与优雅的气氛。岛国人吃下午茶，还要吃炒米粉、包点、烧卖、炸鸡翼，油腻腻的一大堆。吃了下午茶，则可省下晚餐，足见某些岛国人民缺乏文化修养及贪小便宜的心态。

在小说里，于深思对余敢笑说：

“我以前住的那一带，就有一批连自己的中文名都不会写的，他们常常聚集在一个小贩中心的咖啡推旁，在相思树下喝着

奶茶或咖啡，说些炫耀子女成功的空话，就这样弹尽残余岁月，你若问他们一生来到世间做了什么？他们将无言以对。”⁽²⁶⁾

可见岛国人民的肤浅状况是人文文化贫瘠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文学可以陶冶人性，也是吸取可贵品格养分的泉源，让人深入思考。作品中的主角的高尚情操会不知不觉地融入读者的血液里，读者的人格逐渐受到熏陶。一个国家若不积极推广文学活动，人民的文化素质将会越来越枯萎了，国家的存亡也将面对更大更艰难的考验了。这也是《追逐》里的许多南大毕业生为岛国人民文化素质的枯萎感到忧心忡忡。他们不辞劳苦地奔波世界各国，极力弘扬华族文化，更竭尽所能呼吁岛国人民重视华文文化的价值。

文中提到：

“深思他们刚组织了一个文学艺术研究会，也拟办一份学报，探讨国内外的各种文化、历史、艺术等等课题。欣菊担任总编辑的工作，目前正在收集稿件。”湘涵说：“我们也要向大家约稿。”⁽²⁷⁾

当然，搞文化教育的深思等人难免感觉精疲力竭。随着岛国人民华文水平的低落和冷漠态度，他们也心灰意冷了。他们感叹岛国人民的固执与无知，几年的辛苦努力而领悟到一个道理：

“一种文化并不会因为某一民族的支流的放弃而消失，如果我们为一个地方的某些人的自我扬弃民族文化而哀伤和痛哭呢，我们将浪费自己的生命于没有意义的感叹中。”⁽²⁸⁾

他们唯有自我藉慰，知音在天涯海角，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在这小岛不被重视，五千多年的华族文化遗产并不会消失的。在马来西亚、日本、台湾，甚至西方国家都有其立足的地方，搞华文文化教育的人文又何必耿耿不乐呢！作者和许多华文教育工作者唯有抱着这样的心态才不会哀伤痛苦一生，才能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往前奔跑。

我们放眼遥望西方国家吧！加拿大的唐人街路旁都是富有中华文化色彩的街灯，用中文书写的街名在路灯下闪闪发亮，让人

觉得这比故乡还故乡哩！这又怎不叫肩负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为岛国人民扬弃华族文化而感到极度惋惜呢！

《追逐》里，张厚德狠狠地指责殖民主义的毒害。岛国人民深受长期压抑的扭曲心态，许多人以不认识自己民族文化为荣，让人觉得他们倒不如去漂白为白人吧！就连韩国人、澳洲人都兴起学习华文的热潮，国人却歧视华族文化，怎不叫人感到悲愤呢！

“岛国的一些华人，数典忘祖，有些还以身的华族为后裔为耻辱，这真是岛国的悲哀。”⁽²⁹⁾

小说里的黄蕙韵也发牢骚了，她说：

“连处在澳洲南方的‘南方孤岛’塔斯马尼亚才只有四十万人口，它的大学居然也设立中文系，中文热在澳洲是何等普遍。”⁽³⁰⁾

《追逐》极力鞭挞居住在岛国的人民放弃华族文化及他们那崇洋弃华的心态。在日本执教的严开镇更是感叹万分，他感叹道：

“我在岛国的大学执教，人家并不看重我，把我当成可有可无的角色。”⁽³¹⁾

日本人却这样厚待我，委我以终身教授职位，待遇之优厚，是没得说的。”

但他一个人在异乡为他人做“嫁时衣”，妻子儿女却留住于岛国，彼此分开，思念之情极叫人难受的。可见南大生各人的不幸都涂上了时代的色彩，华文知识分子生活在欲献身而无处的岛国社会里，他们只好到处漂泊。这批南大生唯有接受地球村的现实，投进浩浩荡荡的文化长河里，在国外各个学府领域里宣扬中华文化，使几千年的华族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延伸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去。

D. 华族优良传统的流失

南大生面对理想失落的时刻，他们当年的那股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热忱，在现实无情的打击下被冲散的四零八散。

他们虽然拥有丰富金钱和物质的享受，但精神上却感到极度地空虚与寂寞。因为精神生活需要人文的滋养。

“要建立一个卓越的社会，是比取得高速增长更为艰难……卓越社会须要文人的支撑，并在精神生活方面给人民提供丰富的养料。”⁽³²⁾

面对华文的式微，华文知识分子所受的打击很大。而华语不仅仅是华人沟通感情的工具，它也肩负着传递文化与优良传统的责任。

在《追逐》里，黄蕙韵所追求的是优美的心灵生活，而她身旁的女友粗浅庸俗、自负而无自知之明。她们卖友求荣、过度强调物质成就，连爱情也当成是一宗商业交易。黄蕙韵身边的许多朋友都挂着虚假的面具，心胸也很狭隘。这些人只可以一起互相慰藉，而不能为朋友的成功欢呼。由此可见，华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守望相助”、“公而无私”、“友情珍贵”等美德已是有名无实了，有多少人能真正交到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呢？

《追逐》里的黄蕙韵、高思民和几位女友见面道别时的情景，暴露了多年之交的朋友的妒忌之心、损人利己的虚伪面孔。当佳钰看到别人比自己不幸，就会兴起一股怜悯之情，借此慰藉自己，从而得到一种高人一等，无比幸福的快感。一旦那可怜的对象站立起来，并与她平起平坐后，她就会诋毁对方、破坏对方。

“人家都是失婚者嘛，有机会重逢，自然珍惜彼此的，你埋怨什么？”⁽³³⁾

程超兰说这话时，表面上是为黄蕙韵解围，实际上是看不起黄蕙韵把穷教授高思民当作宝贝看待。黄蕙韵的女友话中略带讥刺，给高思民很大的冲击，他心中感慨地呐喊着。

“这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一群朋友在一起都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人成功，这是多么冷酷的现象呀！”⁽³⁴⁾

这是华族传统文化流失后，社会拜金主义的风气侵蚀着国人的心灵之故。大家一味追求金钱与物质的富裕，过度强调外表

的成功而失去内心的涵养。还有‘自我’意识的观念滋长，人心变得更为冷酷无情。很少人能真心为朋友的成功而给予衷心的祝福！

岛国人民的“怕输”心态也造成彼此间的自私自利、互不相助的关系，形成人间温情残缺的社会现象。我们所保留的是一些芝麻绿豆的传统仪式，许多真正的华族传统美德已经被遗弃了。

“表面上我们的社会保留了许多民族习俗，但那尽是些无关痛痒的小传统，我们的大传统诸如文学、历史、哲学，有多少人懂？”⁽³⁵⁾

文中的范美艳所说的这一番话更令人感到震惊。

“我是一个专业女性，我月入七千元，我为什么要找个经济条件比我差的男人为对象，让他来分享我的劳动成果。如果有个有钱人愿意收我为情妇，我并不介意。”⁽³⁶⁾

自古以来，备受诗人作家歌颂的爱情，在范美艳这种人眼里也成为一宗交易了。

华族传统美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情操也随着华族国民意识的淡薄而被忽视了。许多岛国人总是以“财富的多寡”为指标来衡量某人才能的高低，以此作为成功与否的准则。这种“功利主义”的社会现象是多么恶心、不健全的。岛国要达致优雅社会的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哩。

(2) 南大生的奋发

A 化忧郁为热情

在本岛上，有许多人选择遗弃中华文化，但在远居异乡的炎黄子孙们却积极地推展中华文化的工作，岛国人民的冷漠与无情确实令人失望。

旅居异乡的南大生担心失去“族根”，都积极参加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

“南大与新大合并为国大，南大生成为一些校友所称的“亡校奴”。⁽³⁷⁾

这悲怆的情怀是南大生团结的力量。不管他们生活在天涯海角，也永远忘不了共同的民族文化。任何南大生只要遇上另一位南大生，纵使素未谋面，也会倍加亲切。南大生就像一团团带着期望的大篝火，追寻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理想。

例如文本中提及李秀乐在马来西亚协助创办东方学院。

“我们创办了学院，它实际上就是小“南大”，它的格局是仿“南大”的建筑风格的，我们筹办的新世纪学院，也获准了，我们也会办中文系。”⁽³⁸⁾

可见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仍然繁荣着、蓬勃着。

吴思中夫妇和李利民夫妇等人即使远在温哥华生活和工作，他们也非常注意故乡的民族教育与文化生存及发展的问题。许多南大毕业生担负着民族文化的使命。他们都认为一个民族文化没人继承，将使生命显得残缺不全。

通过《追逐》看到许多定居海外的华文高级知识分子默默地为着推展华文文化活动而努力。他们组织美国华侨的工作，一心一意投入侨务活动，公而忘私，结果忽略了家庭，多少影响了自己的婚姻生活。这些留学定居国外的华人极力设立文化中心，只为保留与发展本身的文化，以略为纾解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思恋之情。他们也希望为自己的下一代保留着一些华族文化遗产，借以帮助年轻的一代寻回自己的“族根”。

“我们搞协会活动是业余性质的”英胜说：“大家都很忙，实在不容易抽出时间来，但我们认为，大家既然有点能力，就应该为全美华人做点事”⁽³⁹⁾

“我们的活动不多，主要是办一份刊物，发表会员的文章，内容广泛，有探讨华裔美国公民的权益问题的，有讨论华人处境问题的，也有研究中华文化课题的。”⁽⁴⁰⁾

从余敢笑和冯欣菊俩人的交谈中，读者也可领略到南大生很注意故乡的民族教育与文化发展的课题。

“人没有后代，我看不是那么重要。但发扬本族文化，却是每个知识分子的本能与基本权利。”⁽⁴¹⁾

许多南大生在无奈与遗憾的同时，也不断地用自己的行动与毅力宣扬华族文化意识。余敢笑和冯欣菊终于决定一起留在加拿大协助中华文化中心推展华族文化的活动。

B. 化悲愤为力量

旅居海外的华人有一颗热爱华族文化的赤子之心。他们把悲愤之情化为激情的力量，积极推广华族文化，为全美华人做有益民族的事业。例如南大生在马来西亚筹办东方学院和新世纪学院。报读华小的马来人与印度人与日俱增、数以万计，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依然蓬勃发展，经济较好的南大校友慷慨解囊、赞助东方学院与新世纪学院。有些知识分子则协助中国的科研或义务讲学，有些则留在异乡办报、组织华人社团、发展中华艺术事业等。就如许文荣赞颂南大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在其论文中谈及：

“南大生化悲愤为力量，反而更加拼搏与争气，很多在国外因此而闯出名堂，成为世界名校的著名教授、科学家、各领域的专家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南大精神”，即在逆境中永不放弃，自强不息、奋发前进地迈向卓越。”⁽⁴²⁾

南大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情感的流露尤其令人赞许。他们虽然分散世界各国，但不忘彼此关怀和联系。令人感到可笑的，第一届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竟在多伦多举行，第二届在美里举行，第三届在峇厘举行，到了第四届才回至原址南大举行。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大家各居天涯海角，仍不忘‘南大情’，还有许多南大毕业生拨出宝贵的时间参与校友会聚餐，热心商讨如何推动华族文化活动以增进民族意识。

六十至八十年代的南大毕业生虽然受到歧视与排挤，他们却毅然走出黑暗的阴影到国外，努力求取知识，都创造出一番惊人的成就。这些南大生化悲伤为激昂的力量，凭着坚定意志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大家都学有专长，社会地位高，收入颇为丰富。他们有些是顶尖大学毕业留学的化学人才，有些是高级物理研究院院士，也有专科医生如眼科、妇产科和脑科医生及大专学府教授

等等。

崔贵强教授的《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里》也提到南大生的斐然成就。

“南大虽然关闭了，但在25年的岁月里，却培育了不少精英分子，他们兼通中英文，各有专长。他们各自站稳岗位，发挥所长，为社会国家服务，造福人群……在学术与科学领域里头角峥嵘，赢得了无限的赞赏。”⁽⁴³⁾

南大生具备了在逆境中自我的奋斗精神是极其可贵的。这“南大精神”就如文中所说的：

“南大精神，就是华族捍卫其民族教育权利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精神是源自华族寻求在新马扎下其文化与语文完整的根的需要。”⁽⁴⁴⁾

“这就是人家要邀请你们这些游子回来的用意，因为只有我们这些年近半百的老校友，才有希望唤回“南大精神”。”⁽⁴⁵⁾

通过谢文浩与施泽恩的对话，得悉谢文浩将参与一项有创造性“以卡通影片的形式”来推广中华文化。施泽恩边赞赏边鼓励这好友，再次显示南大生具有坚强意志力，努力奋斗的精神。

“我听说该公司的主脑人物是新加坡的一位经济学家，他前此在国立大学教书，看来你们这批南大生真了不起，到世界各国去施展才华。”⁽⁴⁶⁾

这宝贵的南大精神是华文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毅力，也是华族文化传统的美德。华人那任劳任怨的高尚品格是早期岛国人民取得骄人经济成长的原因之一，风沙雁希望“南大精神”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以造福人群。

C. 民族意识的延伸

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学子将具备更崇高的追求目标。他们活着并不是单单为解决自己的三餐，为个人谋取丰富的物质享受而已。像高思民、张厚德、严开镇、卓北村和吴虹莺等人，他们在90年代理想陷入幻灭的时候，仍然坚持着本身的理想，不愿随波逐流。他们凭着择善而固之的精神，在异乡弘扬华族文化以促进

人类朝向美好前景迈进的工作。

《追逐》里极其强调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如：

“这是地球村时代，国界已模糊了，唯一能够系住人心的还是民族文化”⁽⁴⁷⁾

“凡人都有权力选择居留国，但却无权选择民族认同”⁽⁴⁸⁾

又如《追逐》文中李世雄的论文《从华人移民看中华文化的特点》的重点围绕着：

“华人勤俭成家致富后，又会毁家办学维护与发扬本族文化的特点。”⁽⁴⁹⁾

当年陈六使创办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大，也是居于这样毁家办学，大公无私的信念。

《追逐》里高思民曾说：

“我能接受国家意识日渐模糊的现实，但我无法忘怀我来自哪一个民族”⁽⁵⁰⁾

这些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强烈民族认同感是促使人民拥有国家归属感的因素之一，更是卫国强民的推动力。

(四) 文本经营的特征

风沙雁在《追逐》里所描绘的人物活动、地理风情、华文知识分子的际遇与奋斗、异乡生活等故事，具备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成分。作者本人曾旅居和任职海外多年，个性喜欢游山玩水，整部小说描述新、马、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各国的风景、历史、人文文化与异乡生活的情况。从这些描述与抒情情节中，生动地反映出南大生的思想与对华族民族文化的感伤情结。作者凭着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及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文人丰富的感情，以创意的文本经营手法来展现60至80年代华文知识分子的心灵画卷。

1. “日记式”的长篇小说

《追逐》包括五篇“日记式”故事，各篇具有非常浓厚诗意

的题目。它们是（一）相思遗恨，枫叶飘情，（二）万顷碧波，一脉清流，（三）雪花飞扬，前景苍茫，（四）湖光潋滟，心系何方，（五）海天迷蒙，春无归处。

每篇的故事人物主角不同，但都牵绕着同类素材来进行构思的。人物主角大多数是南大毕业生，他们都因为社会的排斥而被逼漂流到世界各国求生存、求发展。他们在自己的国土没法谋得一份职业，只好带着悲凄的情绪自我放逐到异乡，凭着“南大精神”自我奋斗，取得骄人的成就。这批身居国外的知识分子都成为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生活过得相当丰裕，但心里始终牵挂着华族文化日益式微的问题。他们彼此常常联系，努力为国外华侨推展华文文化活动，全心维护华文文化的宝贵资产。

每篇“日记式”的故事自成一篇，但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华文情结”的旨题来展现一幅有良知知识分子的失落与守望、悲情与奋发，这五篇看似支离，然而“行散”而“神不散”。

笔者访问过风沙雁，知道他已经找寻到曾颖民的第二册日记簿，已将之谱写成另一部长篇小说命名为《遥远的期待》。许文荣在《新加坡共和国的三种文学版本比较论》里说：“我怀疑，这五篇是作者在不同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在出版时把它们凑成一部形式结构松散的长篇。”我持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追逐》是作者青年时期的南大生活与旅居外国的经历的反映，也是作者所接触、认识的人物的生活写照。所以说《追逐》的出版是有计划的，而不是随便凑成的。从作者的散文集《风沙雁文集》的篇章内处处可感受到风沙雁对华族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关怀情结和对文明精神流失的担忧。

2. “自传记”的长篇小说

风沙雁在《追逐》的前言中提及他在飞机上所捡到南大生曾颖民的两册日记簿，第一册将之谱写成《追逐》这部长篇小说。作者本人与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虽然是将曾颖民日记里的人物编成小说里的各个角色，却把持不住自己“南大生”的“情意

结”，不自禁地进入了小说的情节里。小说里有浓厚的作者形象，几乎每一篇章里都融入作者的影子。《追逐》带着浓浓的自传色彩，让读者更深入、亲切的体会到南大生坚毅与奋斗的精神，同时更进一步地体会到南大生那股热爱、守望中华文化的热忱。

我们从各篇章里看到于深思、瑶岗、施泽恩等人似乎是风沙雁本身的生活经历的缩影。风沙雁在南大求学生活和旅居日本东瀛五年的日子，让他更怀念中华民族文化的情结。南大的关闭与日本的诗情画意的四季景色，加上游子的思乡之情，促使风沙雁更感凄凉与虚空，因此作者觉得有必要把那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忧心声以文字记录下来。

3. 在对话中吐露悲情

在《追逐》里，风沙雁发挥了其诗人、文人高超深厚的文学底蕴，以巧妙的人物对话吐露出南大生几十年所承受的亏待和歧视，也借人物的对话反映出现实社会现象。

在岛国的公路上、住屋周围都种植了很多花草树木，绿化很成功。

于深思说道：

“我们路旁的树，表面上看起来，葱葱郁郁的，雄伟极了。但只要刮起风下雨，总有路旁的大树倒下来，为什么？”⁽⁵¹⁾

“因为这些树是在别处种大才移植过来的，这样一来，这些树的根就不会深入泥土，不会破坏路的根基，但正因为它们的根不深入泥土，一有暴风雨就连根拔起倒下……”⁽⁵²⁾

这就是所谓的移植树，其实作者有意借助移植树的现象来探讨有关外来人才的课题。外来人才就像移植树，一有风吹草动即国家有难时，外来人才就会远走高飞的，他们缺乏本土意识，很自然地便往别国寻找更美好的生活。从南大生的对话中，可见他们为国为民的操心。如果我们太强调“从外引进”政策，连语文与民族文化人才也如此做实在太危险了，国家的根基将会是摇摇

摆摆的。这政策的滥用，所付的代价将会是太大了。文中所述：

“整个社会的根基因而显得很松弛，无法削减移民的色彩，开埠百多年了，如果我们依然无法扎下根来，那这儿就会像旅馆一样，人去人来，却始终没有人想永远在这儿安家落户。”⁽⁵³⁾

“移进的人才比移出的来得多，”湘涵说：“但这解决……，移出去的人具有本地意识与效忠感，若他们不断地外移，这就会动摇社会根基的。”⁽⁵⁴⁾

其实这股担忧的情怀早已显露在风沙雁的散文著作里，过于强调吸引外国人才而不尽力挽留本地人才是很不明智的。如他所说的：

“将对社会凝聚力与国家意识的巩固，都有不可忽视的削弱作用”⁽⁵⁵⁾

通过文中所述：于深思、李利民、吴思中、黄慧萍、余敢笑和何秋韵六人从密密的雨帘中看过去，南大校门牌耸立在野草丛中，狂风挟着密雨飘打牌坊，吹得野草瑟瑟作响。

“要下车来凭吊凭吊吗？”于深思问。

“不要啦！”秋韵嘶喊着，她的咽喉哽住了。

“我们到底是回来凭吊还是聚餐？”思中咕哝着。

“都有，但主要是聚餐，是找朋友深谈。”利民说。⁽⁵⁶⁾

由以上人物的对话，读者很清楚地感受到南大生对南大关闭的哀伤与思念情怀。

南大生的失落与漂流感也很细腻、巧妙地以下人物的对话里展现出来：

“鲑鱼尚且懂得回到出生地传宗接代，我们这批流落在外的南大生，却只能客死他乡，只能一生为他国作嫁时衣。”⁽⁵⁷⁾章夏木感叹道。

“鲑鱼懂得回归，但也有回归之路呀！我们有回归之路吗？”程英豪生气地说：“我们能回去产卵吗？”⁽⁵⁸⁾

南大的关闭给许多南大生带来无限的哀痛，我们可从小说中的对话感受其中悲哀的情绪。

“砍柴莫砍岭上松，小小松树有大用，有朝长成变大树，敢挡东南西北风。”⁽⁵⁹⁾

“什么莫砍岭上松，连大树都砍掉了，”秋韵激动地说。⁽⁶⁰⁾

与新世纪和东方学院比较，南大的确是棵大树，大树砍了，再来培植中树，这一道路有多遥远啊！这真令人费解、感叹无奈！

4. 意境的营造

作者善于在五彩缤纷的景色中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追逐》这部小说表面上为一种平淡无奇旅游小说的格调，但每读完一个篇章，都会被风沙雁浓郁感伤的情怀所触动。小说里率真、质朴和自然的抒情笔墨流露出作家真挚的情感。小说中许多诗化的景物描绘，更深地突显出作者心灵深处的感伤情结。

“海风骤然大了起来，潮水继续高涨，波浪一个紧接着一个拍打着海岸，再谈起复办南大的事，众人都有无限的感慨，秋韵说：

“看看这浪涛滚滚的景象，你就会想起文化的延续问题，但南大生是止于欣菊、湘涵、敢笑这些人了。南大生会随着岁月的消失而一个一个消失，而终于成为历史名词，南大生是没有后浪推前浪的景象的。”⁽⁶¹⁾

“早晨的迪沙鲁的海浪比黎明的更为猛迅，……”“我不是说过马来西亚的海浪是后浪有力地推着前浪前进的吗。”秀乐自豪地说。⁽⁶²⁾

作者惊叹外国所展现的中华文化色彩更为浓厚亲切。它比故乡还故乡呢！

“此时到唐人街太阳已下山，路两旁的富有中华文化色彩的街灯亮了，用中文书写的街名在路灯下闪闪发亮，”欣菊惊叫着：“这古色古香的街多美呀，这中文字多亲切呀。”⁽⁶³⁾

作者营造了鲑鱼回潮的情景，深刻地反映出游子们的孤独、空虚心灵。风沙雁也营造了大伙们哼唱歌曲的情景以进一步地透

露南大生飘泊异乡的忧郁情怀。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叫我们到处流浪……” (64)

这首歌曲的歌词最完整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失落心态。作者心中的失落与守望情结在与许春生、黄惠慧的相聚后显得更为浓厚。作者感叹道：

“夜更深了，雪飘得更大，春生与惠慧送他回新宿的旅馆时，雪下得更紧更密。作者百感交集，春生与惠慧走到时代的主流中去，而作者则带着梦回到故土从事文化界的工作，默默耕耘，只走进时代的一个支流中去。作者感到茫然，自问自己往后还能迈进时代的主流吗？” (65)

以下文中的另一段描述，将作者内心的惆怅和失落情绪揭露得相当透彻。

“我独自坐在靠窗的咖啡座的椅子上喝啤酒，窗外的雪连绵不断地下着，下着，周遭苍茫一片，恰似我今后想走的道路那么扑朔迷离。” (66)

《追逐》里描述南大生时常沉醉在伤感凄迷的回忆中，唯有在浪漫的幻想中，借文学作品中春景秋风冬寒的描绘来寻求忧郁的解脱。东京生活压力虽大，但较岛国有文化。日本人巧妙地把艺术融入生活里去。各类画展、音乐会、世界芭蕾舞表演和中国京剧的演出，让人民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处处充满着中华文化的气息。外国的中华文化的清香比岛国的更为浓厚。随着这意境的描绘，深深地唤起知识分子那眷念华族文化的情结与文化流失的感伤。

(5) 方言的使用

文本中多次出现方言‘闽南语’，令读者感觉更亲切与真实。

频频称道：

“这热带的海滨的景致醉死人罗。” (67)

“当然想罗”我回答着。 (68)

这“罗”字是许多岛国人喜好说的句语。

“葱韵的公司还有什么新的发展计划，有什么好“空头”可介绍？”⁽⁶⁹⁾

闽南语“空头”即是“机会”之意。

“就给大家一点“贴士”吧。”素莲打圆场说。⁽⁷⁰⁾

“贴士”的意思是“有利可图的风声”

“葱韵，别听他“乱乱仙”，这人误人子弟误了大半生，……”⁽⁷¹⁾

所谓“乱乱仙”是指“胡说八道”之意。

(五) 结论

《追逐》无疑是部特殊的长篇小说，文字浅白易懂，诗情画意的笔墨流露于里字里行间，抒情与景物的交替描绘，情景交融，引起读者的共鸣。

它描述60年代至80年代毕业于南洋大学的知识分子（南大生），他们在政策的改变及社会的变迁下，被排挤而自我放逐到异乡去追寻理想。从小说里的各人物的描绘与角色的对话、景物的营造，作者充分地体现出南大生的悲情与奋发。这群南大生坚信华文文化与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就如文中所写：

“一个民族若失去了文化的根，将变得异常脆弱与没有生活方向。我常想起楼兰古国，这曾经繁荣过的西域古国为何会在历史上消失掉？我们的国家会是现代的楼兰吗？”⁽⁷²⁾

风沙雁一生肩负着维护与弘扬华族文化的使命，故以《追逐》里南大生抒发关怀华族民族文化的情结，赞扬在逆境中奋斗的“南大精神”、弘扬华族民族意识，从而展示了“良知知识分子”的心灵画卷。

《追逐》的创作蕴藏着重要的文学与史学价值。表面上看起来，小说里充满着轻松美好的山川游览描绘，读者陶醉与遨游于世界名山大川的自然景色描绘里，但隐藏在这批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忧闷愤懑、惦念着华族文化的情绪却流露无遗。它可说是作

者真心诚意通过文字的耕耘、文学的创作来保存被许多岛国人民所遗忘的华文文化和民族精神，借此为新华文学增添宝贵的人文色彩，更为历史空白的画面填上文字的证据。

辑四

哀
伤
精
神
家
园
树
枯
花
凋
谢

注释

- (1) 庄锡福《新加坡华文教育省思——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12月1日见 <http://shvoong.com/humanities>
- (2)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创意圈工作室出版，2003年2月，第95页
- (3) 同注2，页95
- (4) 附录：笔者于2007年4月七日访问《追逐阳光的人》的作者风沙雁
- (5) 殷清池《风沙雁文集》（中国：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上卷，页201
- (6) 同注2，页20
- (7) 同注2，页37
- (8) 同注2，页30
- (9) 同注2，页31
- (10) 同注2，页23
- (11) 同注2，页71
- (12) 同注2，页71
- (13) 同注2，页71
- (14) 同注1，页69
- (15) 同注1，页69
- (16) 同注1，页69
- (17) 同注5，页320
- (18) 同注2，页123
- (19) 殷清池，张从兴《海外来风。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中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页33
- (20) 同注5，页337
- (21) 同注2，页27
- (22) 同注2，页26
- (23) 同注2，页108
- (24) 同注2，页122
- (25) 同注2，页123
- (26) 同注2，页50
- (27) 同注2，页27
- (28) 同注2，页53
- (29) 同注2，页124
- (30) 同注2，页124
- (31) 同注2，页124
- (32) 殷清池，《风沙雁文集》（中国：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下卷，页534



- (33) 同注 2, 页 135
- (34) 同注 2, 页 135
- (35) 许文荣《新加坡共和国的三种文学版本比较论》(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比较之窗》, 页 43) 或同注 2, 页 21
- (36) 同注 2, 页 127
- (37) 同注 2, 页 31
- (38) 同注 2, 页 40
- (39) 同注 2, 页 171
- (40) 同注 2, 页 171
- (41) 同注 2, 页 60
- (42) 同注 36, 页 49
- (43) 崔贵强著《新加坡华人 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 出版私营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1994 年), 页 280
- (44) 同注 2, 页 30
- (45) 同注 2, 页 23
- (46) 同注 2, 页 180
- (47) 同注 2, 页 21
- (48) 同注 2, 页 79
- (49) 同注 2, 页 80
- (50) 同注 2, 页 126
- (51) 同注 2, 页 21
- (52) 同注 2, 页 21
- (53) 同注 2, 页 42
- (54) 同注 2, 页 42
- (55) 同注 33, 页 764
- (56) 同注 2, 页 22
- (57) 同注 2, 页 69
- (58) 同注 2, 页 69
- (59) 同注 2, 页 73
- (60) 同注 2, 页 73
- (61) 同注 2, 页 51
- (62) 同注 2, 页 61
- (63) 同注 2, 页 66
- (64) 同注 2, 页 71
- (65) 同注 2, 页 99
- (66) 同注 2, 页 99
- (67) 同注 2, 页 56
- (68) 同注 2, 页 80
- (69) 同注 2, 页 104
- (70) 同注 2, 页 105
- (71) 同注 2, 页 105
- (72) 同注 2, 页 26 / 27
- (73) 同注 2, 页 21



又见芳草绿天涯

——序风沙雁的《追逐阳光的人》

(中国) 马阳

从表象看，风沙雁这部介乎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追逐阳光的人》(下称《追》)，似乎有点“移民文学”、“留学生文学”、“侨民文学”的影子，但细读却又不是这回事。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努山塔拉《岸海蒙蒙》、流军《归去来兮》，可视为新加坡文学跨入新时期带有“标志性”的作品。新在摈弃“小岛心态”，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息、扑面的历史风云，以及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激情。

人们已经很久没有读到激动人心而又醒世警世的作品了，尤其在华族文化式微的时候，得见久违的“海燕”归来，世道人心怎不惊喜于其俏丽的容颜。检视其翼上残损，三十年风雪长路的壮美壮烈全现眼前。豁然醒自“反思”的大寐，我们终于听清辨清了穿过重重迷雾的历史回声：“不是告别，不是告别，是整装重新出征！”

历史迂回在物欲横流的功利社会，容易被误导而产生“历史终结”的错觉。无处不在的矛盾，注定这世界丰富多彩。独尊独霸独裁的“单边主义”，岂可主宰事物发展的命运？“不平则鸣”的文学，“言志载道”了数千年，倘若未曾窒息于“个体主体”的“洞穴”，在这思想灵魂充满电光火石的新世纪前面，必然有所回响。《追》无疑是回响中的清音，清音袅袅，能否催醒

多少浑浑噩噩的浊世?文学功能抵挡不了刀枪棍棒水龙瓦斯,但总有被清音唤醒的智者,真的都无半个智人,这岛国便毫无希望了!

奇怪,近年境外有人非常起劲地鼓吹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断奶”的伟论。是无知吗?好像不是这么简单。种种蛛丝马迹透露,似是“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的外延,目的乃在“拓展生存空间”。断“人奶”,吮“狗奶”,岂不成了世人唾弃的“狗崽子”?才挣脱旧殖民主义的枷锁,又堕入新殖民主义的桎梏?新马华社华教真会变得如此弱智而被鬼迷心窍?我从《追》中看到一群灵魂醒着的智者。他们从南洋大学一毕业,就遭到歧视排挤,不得不离开岛国,出洋留学工作,成为把青春才智献给异国他乡的天涯游子赤子。这些被“海峡殖民意识”打入冷宫的“下等公民”,在异域却是有大贡献于人类社会的专才英才,半点不逊甚至超越受英文教育的人,谁说“南大生”不行?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地区,不比你东南亚素质高和竞争激烈?“南大生”在那些地方,却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历史的进程证明,不是“南大生”不行,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对时代作出了错误的“研判”。

《追》的创新成就,在于以文学形式为华族文化正名正声正道。一群被迫而自我放逐海外的“南大生”,或留学,或工作,经过一番拼搏,成为令人艳羡的教授、学者、专家、经理等等杰出人才,以自身的辉煌成就,足证受华教的学子,完全可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毫不愧色。虽然作为母校的南洋大学,早已关闭,但它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日益凸显其有过的历史贡献而永垂青史。为了彻底“去南大化”,几乎把原南洋大学的硬件软件全部拆除,只留下一个铲掉了“南洋大学”校名的牌坊,孤零零地屹立在荒烟蔓草中。听说当年南洋大学建校时,曾发过重誓,谁拆牌坊,谁就“断子绝孙,不得好死”。可见始作俑者,在“弹冠相庆”得志得意便猖狂时,心里还是很虚的。

“去南大化”和“去中国化”一样,能“去”得了吗?我看

很难，“难于上青天”。诚如《追》里描写的，流落世界各地的“南大生”，已经组织了一个“全球南大校友会”，常以各种形式聚合，形成了一股海外华族知识分子的“清流”、“清音”，其影响不会随他们老去而消失。在新马更难“去掉”，“南大精神”已融入华社华教。历史不是将而是已证明，南洋大学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它的不幸，就在于“功高震主”。华文教育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发展，光“留声”不行，更要“留文”，文字才是“族根”。无根的一代，即使富得流油，最后剩下的，不过是一副“黄皮白心”的奴相。只有被世界各国瞧不起的份，如此贱格的“新人类”，能有前途吗？（《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只要刮起风下雨，总有路旁的大树倒下，为什么？因为这些树是在别处种大才移植过来的，这样一来，这些树的根就不会深入泥土，不会破坏路的根基，但正因为它们的根不深入泥土，一有暴风雨就会连根拔起倒下”，拿来比喻“无根的一代”，那就再恰当不过了。他们与“福摩沙之子”处心积虑欲要泡制的，满嘴“闽南话”（也是中国方言）大吹特吹“台湾的历史比中国历史更加伟大悠久”的“台湾民族”，一样滑天下之大稽。

《追》里描写的知识分子群像，有台湾留学生，但大多是“南大生”。尽管他们性格各异，如瑶岗的深沉苍凉、李世雄的慷慨激昂、高思民的睿智多思、薛春生的浮躁偏颇、惠慧的孤独清高，等等，然而都有一个几乎一致的信念：弘扬中华文化、关心中国前途、切盼中国富强。中国的复兴，不是任何意识形态的妖魔化所能阻挡的，它的成功和失败都系着全世界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心。这是历史的必然，过去现在将来甚至永远如此。中华民族本无宗教信仰，它信仰的是，五千年一脉相承与时共进的中华文化。这是任何历史恶浪逆潮所不能使之溃散的中流砥柱，有这亘古不撼的民族凝聚力之源，中国幸甚，海外华侨华人幸甚！

书中最能击中时弊的警世之笔，乃作者着意描写有“台独意识”的薛春生如何“改邪归正”的心路历程。他在同学好友的开导劝勉下，蓦然悔悟，拒绝“美国某机构资助一百万美金”，作

为“办杂志鼓吹台独言论”的“运动费”。而且后来毕业在日本公司任职期间，代表日方与中方贸易代表团谈判时，更是经常暗中帮助中国，与中国的部长政要建立了良好关系。同学重逢时，竟情不自禁地说：“我改变立场了，我要做促进中国统一的事业！”同学们大赞他，“爱国变得多么热烈，每次当完日本人的通译，也不管三更半夜，总要邀中方的要员出来喝茶谈天，教导他们怎样与日本人讨价还价”。薛春生的思想转变，是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为前提的，因此，又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信息，一只预示着“一国两制”东风浩荡的春燕。

不过，《追》中用墨最多的，还是“南大情结”。与其说是对被关闭的母校南洋大学耿耿于怀，无法忘却；不如说是对华族文化的深层意蕴，生死与共。历史的年轮铭刻着，新马华社倾力创办于风云激荡的50年代的华文最高学府南洋大学，是华族文化传承薪火的灯塔，光辉照彻环宇的一刹那，便成永恒。浪迹天涯的南大学子，永生永世追思追寻那段在“云南园”渡过的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飘晃在眼前的一道人类的彩虹式的理想”，激励着他们“朝向与众人利益息息相关的目标迈进”。看着一万二千名“南大生”，一年比一年少下去，心中难掩悲情。但无须悲观，有哪个与五千年中华文化为敌的政客，能够一辈子“风光”？君不见周边某国，曾经来势汹汹地把中华文化几乎禁锢了半个世纪，连华人取名也不能用华文。现在怎样，不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追》由揉合着散文小说的甲乙丙丁戊等5篇“日记”，组成不是很规范的中篇小说。其实规范与否，并不重要，只要能比较充分地表现内容，这形式就是可行的。小说散文化早已有之，近年还有小说“辞典化”呢。创新与标新，有时难免混混，混不下去了，它就会改弦更张，用不着太过大惊小怪。我们说“现实主义道路无限宽广”，是指创作思想和创作精神，决定它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是无止境的。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是中国

现代文学现实主义杰作，是经受历史时代考验的真正经典。其中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祝福》、《铸剑》等不朽篇章，就融入现代、浪漫、象征、意识流等等手法，是真正的“以我为主，有容乃大”。至于热烙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在我们的《山海经》、《聊斋志异》等经典中，就已俯拾皆是，没有必要为“洋标签”匍匐在地。中国现在有不少很“现代”很“先锋”很“黑马”的作家，但仍然没有谁的中短篇小说，能比肩鲁迅的《呐喊》、《彷徨》。究其因由，是他们“先天不足”，缺乏厚实的传统根基；“后天失调”，乃全盘西化，把“国际口味”一股脑儿吞进肚里，却消化不了，只好胀死。这些曾经叫得很响的“黑马”，都一匹匹茬了，没有一匹成长为“千里驹”，就是这个道理。

风沙雁留洋多年，见过“大蛇痾屎”。他的不似那些仅“留台”或“足不出岛”的“现代汉子娘子”搞搞震，在于他原味民族文化传统根脉，决定着创新的成败得失。风沙雁的古典文学学养和“五四”传统比较厚实，所以行文造句，便见功力。有思想深度，有文化品味。激情文彩兼备，以人格和艺术力量撼人心旌。同样是海外华族知识分子，风沙雁笔下挥洒的是高尚，高行健嘴里吐的是无耻。“完全退回到自己的角色里去”，“把国家民族彻底从自身抛离出去”，只有人渣文痞才会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如此咬牙切齿，情义俱绝。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是民族败类。老实善良的无知者，以为他们是在为发展创新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着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一方面在“回报”洋大人奖授“门下食客”之恩；另一方面则为了极大地满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欲壑。高行健就一再声称，他寻到的“灵山”和“天堂”，“就在女人的洞穴里”。这一“艺术语言”，最典型最维妙维肖地诠释了这伙民族败类的心态。

我论述过努山塔拉的《岸海蒙蒙》，有很强烈的“哲诗”。我觉得风沙雁这部《追》，也有炫丽的“景诗”。也就是说，两人都以浓浓的诗情从事小说写作。正因为有“诗意”，文章便

不同凡响。由于曹雪芹“诗意”特别强烈,《红楼梦》才无限凄美和精深博大。我欣赏风沙雁写景的诗笔。同样写日本上野的樱花,鲁迅先生这样写,“上野的樱花灿烂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风沙雁则这么下笔,“上野公园不带叶子的白樱,盛开时远远望去,像扑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白云,偶尔飘着春雨,微风吹拂,樱花就片片飘落下来,凄美极了”。都把樱花比作云,鲁迅先生只用两句,很传神,留下很丰富的联想空间。

《追》回忆在南洋大学生活学习的文字,也充盈了撩人伤怀别绪的诗情,无愧无悔的青春岁月,永远是生命的亮色。

也许《追》的散文化,取决于它所反映的题材。不是吗?

“形散神不散”的形式,正好表现萍踪四海,浪迹天涯的游子赤子的心境。五篇“日记”,叙述五次异国他乡的聚会。身世飘零,聚散依依。没有在落泊江湖中沉沦,得道于心灵维系着五千年绵绵不断的中华文化。如今“八千里地山河”,正在“细雨随心”、“青山着意”地蜕变成令中华儿女更加眷恋的“精神家园”。其实这五篇“日记”,只是匆匆一瞥,远远容不下这群“南大生”风雪长路的人生帮事。《追》里写景状物叙事多是带感情的提纲式文字,苦能展开来精致经营,便是很有保险单创新的反映国际题材的长篇小说。风沙雁是有优势的,已过不惑之年,且眼高手不低,应该是可期许的吧!

最后谈一下关于所谓“地球村”和“国家意识日渐模糊”的问题。这仿佛有点“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诱人迷人味道,是否意味着康有为、孙中山所向往的人类社会快要实现了?非也!首先得弄清楚,从眼前唯一“超级大国”“单边主义”说了算的国际形势看,这“地球村”村长,它是要当定的了,决不会让“联合国”来维持秩序。既然如此,就绝对不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那么可爱了。至于“国家意识”是不是“日渐模糊”了?也得首先看看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嘴脸,它们模糊了没有?君不见“911事件”后,美国“星条旗”曾做得几个足球场那么大,从总统到平民,人手一面“星条

旗”地振臂高呼“美国利益至上，美国万岁！”并且趁“反恐”之机，随心所欲地、“单边”强行将美国大兵派到世界各地，或入侵驻军，或狂轰滥炸，动辄撇开“联合国”摧毁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在其“国防政策报告”中，反复叫嚷不惜动用核武器，企图阻止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美国的“国家意识”哪有丝毫模糊，恨不得用“星条旗”把整个地球裹成它的“囊中物”，把世界人民圈成它的“西部印第安”。日本至今仍不承认不道歉“南京大屠杀”等等侵华战争罪行，连战犯僵尸都想从“靖国神社”里站出来耀武扬威，其军国主义“国家意识”有多么浓烈！还有那遭海内外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唾骂的两个臭名昭著的“台独小丑”，白日做梦也想把中国固有领土台湾省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建立所谓“台湾共和国”，正在“潜进式”地搞“偷天换日”呢！人家不“模糊”，我们却一厢情愿地在“模糊”，除了自讨苦吃，决不会有好果子尝。国际形势如此严酷，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来不得半点天真烂漫啊！

多涂鸦了有关“地球村”的一段文字。如果“离题”太远了，那得请风沙雁多多海涵。是为序，如何？

(2002年4月6日改于广州珠江左岸)

三声清啸醒文苑

(中国) 马阳

经过了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风雨如磐的历程之后，中华终于复兴崛起，以其取得的非凡成就，赢得全世界的高度赞誉，即使是固执偏见的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看来超越祖先创造的强汉盛唐，不是能否的问题，而是指日可待矣！有幸与共和国同路，虽遭逢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饱尝巨大的欢乐和痛苦，但劫难洗礼过后，毕竟仰首得见红旗映耀日月。平生壮志，或奉献，或消磨，都无怨悔，一掬山河泪，清清凛凛，源自汨罗。

对中国复兴崛起的辉煌业绩，在海外汉语作家中，最先怀着耿耿心志、甸甸情怀给予歌咏的，首推新加坡的努山塔拉、风沙雁、流军等几位作家。在他们创作的《岸海蒙蒙》、《追逐阳光的人》、《归去来兮》等中短篇小说中，以“效忠居住国，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独特视角，既满怀激情地礼赞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批评在“反而胡思”失误中给国家民族带来的严重恶果。一股浓浓的忧患意识，比我们国内知识分子文化人还要强烈，尤以努山塔拉发表在1997年新加坡出版的《艺术天地》杂志的10万言之《岸海蒙蒙》最为突出，作家以充满哲思的诗笔，描写了一个在混浊世局中“独清独醒”，内心世界却又十分“孤独孤愤孤寂”的高级记者“我”，和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女工程师，而此时已沦为“花园之国”酒店酒吧捞金女侍者陈艾宁的“言情故事”。这个故事从表面看异国情调非常浓郁浪漫，但深层却蕴含着极为严肃的政思。

《岸海蒙蒙》(下称《岸》)可谓题旨遥深,作家无限感慨于中国在大改大开大放的空前宽松环境中,竞飞出来如此众多的视国家民族为无物,而只顾捞金捞银的一代“精英”!在金钱面前,国格族格人格都通通不要了,灵与肉全都成了“商品”。这简直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极大反讽。倘若“反思”至今,仍分不清辨不明谁扭曲谁,天塌东南,地陷西北,就绝不只是杞人之忧。“前先锋”、“后冷战”、“后现代”、“解构”、“建构”等等或引进或自造的“术语”,在讲坛文坛教坛上满天飞,一如“文革”时期的“语录”,谁不挂在嘴上,谁就不是“改革派”、“革命派”似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非常正确。然而,领导往往只兴趣盎然劲头十足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大抓特抓物质文明,“数字出政绩”、“数字升官”、“数字有一切”。精神文明这一手呢?却软得很,软得一塌糊涂。以至班主任团组织不敢在学生面前做思想工作,讲爱国主义教育都怕学生嘲笑。文教战线被“反思”得如此软弱无能,怎叫“四人帮”倒后曾以“天之骄子”自傲的一代大学生,不被夹带着一股妖气扑进门来的西风所扭曲异化?这就是《岸》女主角陈艾宁女工程师成长的时代背景,尽管陈艾宁出身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名校,也难免不被蛊惑得失去了对正气与邪气、爱国与卖国的甄别能力。

《岸》的作者为了刻划男女主角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吸取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但努氏毕竟是一位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时代的主旋律决定他的创作动机,不允许他把陈艾宁写绝,她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又和江泽民同校,作家让她在“我”的眼中,仍幻化出“凤凰涅槃”的光环,“在我身畔坐着的,似乎是一个远在北方的‘中国’,一个同我有种族血缘,文化血缘的亲人”;“我对遥远的中国依然怀着特殊的感情呵,甚至可以说,这感情是很深很深的,绝不愿意它受伤”。可是,当“我”这种感情遭到陈艾宁的嘲讽取笑时,“我”不禁愤慨和惊讶,“我不明白,你们这

一代，为什么对国家那么淡泊？”可见《岸》不是一般的“言情故事”，也许陈艾宁确是真心爱着“我”这个在海外难得一遇的正直正义值得信任的同族同文的知识分子，而“我”对陈艾宁的爱，就决不是那么简单，最少它令人想起郭沫若的“炉中煤”、闻一多的“红烛”、戴望舒的“残损的手掌”，同掬山河泪，歌哭都源自清清凛凛的汨罗。

所以，当“我”无法劝喻陈艾宁回到中国去回到上海去的时候，“我”深受刺激，不会喝酒的“我”，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我”在大醉中和陈艾宁的一番对话，简直让人撕心裂肺：“我”用几乎半瘫痪的手撩起她的长发，‘你回上海去！回去，不要再来了！’‘搞什么？你这个人！想不到你喝酒多了这么混的！’‘大学生，工程……干部……回……去，这……不是你……的地方！’‘我晓得我是要回去的……但是，我不会留在上海，不会留在中国！’‘伟哉中华！危哉……中华！’‘中国不缺我这么一个人！’‘……哦喏，黑暗与……光明一色……淫邪与……崇崇高齐……齐飞！……不要离弃祖国！’‘我……在减轻祖国的重负！……你懂吗？生存才是祖国！’如果《岸》是一首诗，那么上述引文就是“诗眼”，是点破和照应开篇借一位教授的口“告别革命”之世纪末心理态势的。《岸》的男女主角思想感情激烈碰撞的心路历程，反映了本世纪下半叶大时代进展中的辉煌与挫折。“我”要把陈艾宁被扭曲的灵魂“矫正”过来，然而，他却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软弱无力。历史都显得如此无奈，谁还有这种能耐？作家用充满孤愤焦灼的笔墨，来凸显海外赤子企盼中国在非常严峻的大环境能实现“四化”。海外炎黄子孙对于中国命运的那份殷殷耿耿的关注之情，比起我们国内某些文化人的思想境界，不知要高出多少！我们眼下一些“独领风骚”的作家之“杰作”，和《岸》放在一起，不能不自惭形秽！

风沙雁发表于1997年11期《艺术天地》的三万来字的小中篇《追逐阳光的人》（下称《追》），则从更广阔的时间空间的角度，来关切中国的命运。《追》描写一群来自台湾、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留日留美留英的炎黄子孙，尽管他们性格各异，但同样都有一份跃然于纸上的“中国情结”。李世雄、薛春生、瑶岗等人，表现得尤为突出。台湾官家出身的薛春生，以优异成绩留日攻读“东大历史系博士学位”。“美国某机构一名要员”以一百万美元收买他，要他“鼓吹台独言论”，薛春生不但回绝，而且改变了台独倾向，还乘在日本某大公司当翻译之便，暗中告诉中方要员，在谈判中“怎样与日本人讨价还价”，并一再表示“要做促进中国统一的事业”。

曾在夏威夷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的李世雄，又是另一种爱国类型。他在台湾上大学时，就已参加地下的“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被台湾当局逮捕下狱，被打断肋骨。出狱后留美不改初衷，学成即到香港某大学任教，不时回到大陆考察做报告，“希望研究成果，对中华民族的前进有点帮助”，他的“人生道理”是：“只要没卖民族，没卖国求荣，虽然身在国外，若所作所为都是会促进民族，甚至全人类前进的，那就应该无愧于天地了”。瑶岗则是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留洋的华族青年，“效忠居留国，认同民族文化”。他们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在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奔波谋生之余，仍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命运。“它对海外华族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冲击是何等巨大……我们看到它的丑陋处，也看到它的长处，它像一片汪洋，呈现着万顷碧波，在这片碧波中既有携带垃圾的浊流，也有一尘不染的清流”。他们自许为“清流”的一分子，在洋人面前表现得尤为自尊自强自豪，较之从大陆出去的“精英”，他们道德操守，人格力量强多了。

《追》中没什么情节故事，是甲乙丙等篇大散文式的组合。作家以清丽飘逸的文字，着力描写了日本大石寺、上野、新宿御苑等地樱花盛开的景色，十分吻合少年学子风华正茂的心境。无疑增添了作品的感染力。但过份渲染扶桑景色，便冲淡了作品的题旨。

以描写当地历史与商界题材著称的流军，继《浊流》、《赤

道洪流》两部长篇小说之后，又在新加坡“胜友出版社”出版了别开生面的中篇小说《归去来兮》（下称《归》），《归》写了徐向东父子和一个新加坡商人。徐向东，从这名字就知道他是一位非常“革命”的侨生，50年代回到中国，历次运动深受打击，如陷“地狱”；80年代后期，托儿子小徐被新加坡某大公司聘任之福，乐滋滋地回新加坡探亲，仿佛逃出“地狱”重返“天堂”。可是，当他在“女皇镇”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母亲几乎沦为乞丐时，又如遭当头棒喝。怎么大哥二哥们的“天堂”竟没有母亲的份。“当儿子把蓝炽洪这亿万富人企图以区区三两千坡币月薪收买为他推行“以华制华”的新殖民经贸计划告诉父亲时，徐向东才晓得这位当年的“左翼战友”要帮助自己全家移民新加坡，不过是狼子野心罢了！他只好又随着不愿签订卖身合约的儿子，情绪消极闷闷不乐地从“天堂”回归“地狱”。归国侨生中患“左倾幼稚病”的不在少数。他们从“极左”滑向极右，走极端的结果便成了心灵中无国籍的“东方犹太”，流军写出这一大时代的“红色畸型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徐向东们的致命弱势和盲点，乃忘记了历史长河中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从产生、完善到消亡，都得有数百年起伏反复的曲折过程，在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中突围而出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能例外。“反思”后的文化界，也不乏这样的“盲点”、“盲文”。

小徐是《归》中的正面人物，他的成长成才，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大学生，并不都患“出国热”、“下海热”、“拜金热”。他受聘赴新加坡大公司工作，志在学好本领报效祖国，这就是他迟迟不签定卖身合约的原因；并不是小徐瞧不起小小的新加坡，而是深深认识到唯有泱泱神州祖国大陆，才是充分施展自己聪明才智的广阔大地。中华儿女，生当盛世，怎不欣欣然跃跃然！这人物是可信的，他的不丰满，在于作家不熟悉中国大陆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

蓝炽洪则是一个烙着强烈新加坡印记的角色，从搞工运学运起家成为商界“红人”，口袋装着一本袖珍《唐诗三百首》，

偌大的书房厅堂摆满了豪华精装的世界名著，以及当年新马出版的大批“左翼刊物”。可是，他公司推行的却是一套比老殖民主义者更加敲骨吸髓的“新经济殖民政策”，在中国大陆挑肥拣瘦地搞“国中之国”式的所谓“工业园”，企图把中国变成他的殖民地。作家塑造这么一个“红皮黑心的经济动物”，最为深刻生动，有血有肉，有着特殊的警世意义。在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尤须提防这种国际经贸的“吴三桂”。

新加坡处于中西政经文的交汇点，既有根，也无根，优劣互显，新加坡作家倘能不被“小岛心态”所困所惑，对于世事文情，可以有很敏锐的感知，努山塔拉、风沙雁、流军，便在不同程度上化解了“小岛心态”的干扰，倾听大时代的足音，怀有更高的执着追求：身在商海，心离商海，思艺境界便能高出同辈一筹。所以，他们写出在题材与技法都有创新的作品，应是顺理成章，毫不足怪。《岸》、《追》、《归》，不啻为新时期新华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收获。《岸》淡化故事情节，有选择地以“意识流”手法浓墨重彩地描绘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增强了现实主义表现的时代精神，思想内涵也就更见深刻；充满哲思的诗般的绚丽文采，也大大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追》也不重故事情节的安排，采取的是甲乙丙（也许还有丁，似未发完）三大篇式的散文结构，游离而不散慢，正与其表达的内容相符：萍踪般留学四方的学子，易聚易散。其语言，也多写景抒情的段落，异国情调的文化氛围比较浓重。《归》较注意经营故事情节，久别重逢，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安排得很是吸引人，题材新颖，技法稍旧，但并不影响其品位。

正当海外汉语文场被西风聒絮得目迷十色，一批洋大人门下的黄皮“食客”，忙着向曾经养育过自己的中国喷唾沫，泼污水之际，《岸》、《追》、《归》三部中篇小说在新加坡的发表出版，无疑给海外汉语文学创作注入一股清流，一声清啸，一阵清风，也许能消除几许令人窒息的混浊气味。感谢在思想艺术上颇为智勇的努山塔拉、风沙雁、流军三位新加坡作家，他

们有所坚持有所扬弃有所“拿来”，最后才有所创新。真正关注新华文学的中国学者专家，除了知道有《新加坡文学》、《新加坡文艺》、《赤道风》、《热带文艺》、《海峡诗刊》、《锡山文艺》等刊物外，还应该晓得尚有一本大16开厚达96页的半年刊《艺术天地》，只要略为翻阅，你便会掂出它的份量，至今已出版了十二期。其刊登的文字，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都足以代表新加坡甚至海外汉语文学的水平，有些作品拿到中国大陆来比较，也毫不逊色。如若不信，请不妨读一读努山塔拉君正在（《艺术天地》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柏斯布狄岛》，那手法的稔熟、思想的深刻、文字的酣畅、人物的话现，以及那结构的恢宏等等，令你不得不惊叹，小小的新加坡竟然也有一流的汉语大作家！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1，该刊为中国江苏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专业杂志。）



辑五



把脉精神家园
奇花异草



本土作家研究的新现象

· 原甸 ·

方修的生命、经历、业绩和思想，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超越一切被研究的新马华文作家未曾出现的大难度。

方修，既是马华——新华文学原始资料的第一个搜寻者和收集者，也是马华——新华文学史的第一个编写者和奠基者；方修，既是一位马华——新华文学的研究者，也是一位与马华、新华文学渊源紧密的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方修，既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文学的鉴赏家和创作的实践者；方修，既是一个专业的文学编辑者，也是一个文学荒原的拓荒者和先锋式的人物，无人先行于他之前，也无人迄今能企及于他于后。

本文作者评介欧清池最近发布的一部洋洋洒洒50万言的博士学位论文——《方修及其作品研究》，进而论述方修文学观的一个情意结。作者认为这个情意结不仅涉及如何对待方修某些文艺观点的问题，也涉及近半世纪中国文坛的若干争论，以及个人如何看待这些争论。

文艺批评在马华——新华文学发展史上也绝不是一块荒原瘠土。历来——尤其近年来——一些论者常带着视若无睹的“井观”视角抹杀、否定了马华——新华文学界曾经存在过也仍然存在着的文学批评。

一方面，东方人习惯于自我矮化的意识已经严重地统帅我们的一切思维活动，我们始终不愿意珍惜和肯定自己的历史(包括了我们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因此，我们闭眼不视也绝口不承认

我们文学界应该存在着的文艺批评现象。

另一方面，文化倒逆已成为一股汹涌的黑潮，波及各个方面。毛泽东的名句“凡是敌人反对的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就要反对”，已经被改装套用成另一种实用哲学，即：凡是“过去式”的一切文学现象都要否定、抹杀、推倒、重估或质疑；“现在式”状态的文学现象则绝对是精品与佳酿。

文学意义的文学已经被市场价值、熏心私欲和失衡道德逼入岌岌可危的绝角了。

文学批评笋芽初吐

马华——新华本土文学批评，早在上世纪20年代伴随着新文学的襁褓时期也笋芽初吐了；上世纪20年代围绕着新兴文学和文学南洋色彩的探讨、30年代围绕着马来亚文艺建立的议论、40年代围绕着建设在立脚地扎根拒绝侨民意识的争辩，以及到50年代强调从移民心态到当家作主心态的“爱国主义大众文艺”等等，都是一根文艺批评线上的累累珠玑；及至五六十年代，文艺批评的队伍更壮观，在理论观点、论证结构上都更结实。

诚然，有一种倾向必须指出也必须承认，即是整个20世纪的意识形态因素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它主宰了许多地方文学思潮(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马华——新华文学思潮)、也左右我们马华——新华本土文学的文学观、思考主流和文学批评导向。这一股从列宁的“文学是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发展到毛泽东的“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的文学观，牢牢的支配着本土文学批评的走向。文学观与文学批评的失衡状态令我们的文学失去预期的成果。今天我们处在意识形态转型期再回过头来省思，不免有诸多的感叹和惋惜，然而，披沙淘金应该是一切有出息的文化人对待历史所必须秉有的科学态度。

因此，我非常厌恶两种在文化上忘祖背宗的逆子相：一种是老祖宗的神主牌一概不能碰；另一种是对之臭骂犹恐不及。

文化的发展史即是不断的肯定、选择性的否定、又再次的

肯定又再次的选择性的否定，反覆向上，交替前进的历史。没有这矛盾的特质，只能是一条在幻想中建立直通天梯的巴别塔(TowerOfBabel)。

文学水平限制文学研究的开展

肯定本土文学批评的存在不意味着这一文学类型的完美无缺。尤其是作为较文学批评更广泛意义的文学研究，则尤其显得贫乏些了。文学研究在深度与广度层面上，我想都是须要从事者付出更大更艰巨的劳动的。文学批评基本上还是从属于文学的范畴；而文学研究则应该而且必须具有学术性的底蕴了。很明显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研究在本土文化圈中还是“稀有品种”的原因。

因此，我们非常惊喜地看到欧清池的《方修及其作品研究》的上下两册煌煌然50万言的巨著。它标志着本土文学研究的一个大胆的突破。在近一二十年来，文学界已有一些朋友在这方面作着开山炸石的工作，也分别出现了对老作家杏影、苗秀、赵戎、姚紫等人的研究著述，只是在论著的格局上欧书则又显得架构繁茂些了。

为什么说本土文学研究(或说作家研究)一直处在门径幽蔽、跫音杳然的景况呢？

主要的原因是受整体文学水平的限制。本土文学研究不能在文学低水平或文学一般水平的空间中驰骋。一定水平的文学创作只能出现相应的文学探讨；相对不高的文学状态无法推动深刻的文学研究。杰出的文学研究家在面对整体文学水平低落的尴尬局面必当一筹莫展，空叹时不我予。

欧清池是聪明的，他在困境之中凭着赵子龙的勇猛，杀出一条令人刮目相看的通路。

作家研究的二大要素

他显然自觉或不自觉的掌握住在当代寻找本土作家作为研究

课题的三大条件：

一、研究对象的文学业绩。成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是研究工作主客关系的第一位格，贫血的作家及其作品无法启动卓绝的作家研究工程。因此，一个作家研究工作者在寻觅研究对象时要有鹰犬般锐利的目光，瞄准可供其开展开阔研究的疆域的对象作家。在这方面，丰盛的文学业绩无疑是给研究者提供首要的必须条件。

方修的文学业绩是多方面的，虽然他不是一位创作家，在我们仅见的属于他的创作类中也仅是若干篇章不多的旧体诗词，虽说在散文方面方修也出版了十数册集子，但那只能归类于广义的散文类中，作为带有抒情状物品景抒怀等一般属于创作意义的狭义散文则非常的稀少。方修的散文一般是可归类之于议论性和杂感性的。

因此，方修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家的人物被列入《方修及其作品研究》中的，尽管如此，他给研究者提供了既深且广的纵横论域，给研究者提供了广袤的探讨腹地。

二、研究对象生活经历与思想内涵构成主体的丰富性。作家(这里说的是可成为论者研究对象的作家)最好必须具有思想家或哲学家的实践特质，因之他的作品才具有折射时代思想的光泽，才成为足够论者“寻幽探密”的物质基础，而聪明的评论家一定善于卷袖探足于深山野林，而绝不愚蠢地仅飘步于浮浅的平庸化作品层面上。

方修——我想他也绝不接受思想家或哲学家的美誉，但作为一个在人生与伴随着时代与历史舞台共舞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也绝不是平庸的一生，他绝不是不沾人间烟火或绝缘历史血泪的人。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另一个施展拳脚的天地。

欧清池在这两大重要条件具备下，选题方修，自是他的智慧使然，也保证了50万言巨著的可能。

欧清池为本土作家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天地，占据了一个制高点，这诚然是可喜的；然而，也给其他的本土作家研究者提供了

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他立了一个新点标竿。

无论如何，整体文学水平处在低水线中，这是令一切有志于本土作家研究的朋友所喟叹与握腕的。

无人先行也无人迄今能企及

方修，既是马华——新华文学原始资料的第一个搜寻者和收集者，也是马华——新华文学史的第一个编写者和奠基者；无人先行于他之前，也无人迄今能企及于他于后；方修，既是一位马华——新华文学的研究者，也是一位与马华、新华文学渊源紧密的中国文学——包括了中国的古典文学与现代、当代的新文学——的研究者；方修，既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文学的鉴赏家和创作的实践者（主要表现在旧诗词创作方面）；方修，既是一个专业的文学编辑者，也是一个全力以赴的文学荒原的拓荒者和先锋式的人物。

方修的生命、方修的经历、方修的业绩、方修的思想，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超越一切被研究的新马华文作家未曾出现的大难度，当然也是大挑战。

对于一个这样的文学生命，草率的立论、空泛的肯定、不着边际的赞语，以及水面油光式的泛游在初浅层面的一切评论语境，显然都是漏点失面的走笔文字，对于全面认识一个文学老人的文学硕果终将令人有感不足。

由此可以想像，欧清池的方修选题实际上承担着何等大的压力和面临何等大艰巨的挑战。由此也可以知道，为什么需要有50万言的文字来剖析和涵盖一个研究对象。

也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研究者须要付出8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此书。

作家研究工程的大小视乎研究对象的成绩硕果，面对着一个超越半世纪、业绩丰盛、涉猎面广、不乏精辟见解的作家，欧清池全书用13章37节的文字纵横开阔地论述方修，庶几可说是臻至全面之境了。

从全书的结构、层次、格局、论证、辨析、逻辑，乃至行文语境看，作者显然是以学术性的角度作为始终的立足点，也因而有别于一般谈论作家文章的文学性语境，因而越发增添了这部论著的专业性和严肃性。我们如果从本土文学发展看，作者既论述了一个本土空前的文学史研究家，而也确以另一种在我国前所未见之专论的巨型体制出现的鸿文。

凡此种种，都值得赢取我们热烈的掌声，我们也都应为这样的劳动而毫不吝嗇的给作者欧清池报以热烈的掌声。

希望这是一个起点，而这样的起点居然出现在我国华文文学界的断层时期，乏后继力时期，更是令人惊喜的。

它说明：一、华文文学的火种不熄也难以扑灭，尽管千难万阻，火苗仍在吐焰，而且高擎火炬者尚不乏人；二、在文化的传递薪火大道上，中年作家仍不失主力的地位，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在近十多二十年来，我们的文化界出现许多怪象，其中有一项不明文的“决策”，即：以青年为主力，中、老年最好靠边站。如果以这样的方针贯彻下去，首先是弱化了文化力，其次是嫩化了文化力。这在一片赞美文化兴旺的欢呼声中是令人突涕的。

欧书有二处可再商榷和补充

欧清池的方修论，也给众多被冷漠、被忽视、被冷藏化的中老年作家一股激励的力量，即：文化的主力是以文化的扎根深度为基石的，不在于市场价值或奇形怪状的促销手段的强度。由此，很希望欧清池的方修研究不仅为我们认识文学史和认识一位极有建树的老作家提供一个全面观照点，也为我们社会上一群身心灵处在老弱疲惫状态的中、老年文化人提供一枚“强心剂”，为我国真正的文艺复兴献身献力，不愧我们的时代，也不愧我们历来的走向和方向。

我们肯定甚至赞扬欧清池的劳绩，但有一二论点想提出一谈：

一、欧清池辟第11章作为论析方修的“散文创作”，他说：

“方修可以说把毕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整理、研究与撰写马华文学史，他在这方面的显著成就，早已为海内外学者所一致公认与赞扬。然而，在谈论方修对马华文学的贡献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他所书写的，数目达数百篇的散文。这些散文，都收在单行本集子中，共16册。”

在文学分类方面，散文确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文体，而且古今似乎有不同的界定。在中国古代，散文是作为对韵文而存在的文体，因此如以韵文与非韵文二划分，则一般文体非此即彼了。从这个意义出发，除诗词歌赋之外，一般的文类(包括抒怀性的文字、历史性、传记性乃至说理性的文章)均在此范围了。而现代新文学所界定的散文，则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体裁。如果再细致的划分，在散文之内仍可抽丝剥茧出若干各具特点的文体。如：小品文、报告文学、抒情散文、传记文学、杂文、游记及风土志等。

作家方修穷其毕生精力在于本土文学史的开发，在文学史之外，他也涉及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并特别在鲁迅研究和红楼梦研究上有多篇的文章，至于在创作范围内的“散文作品”，则可说是为数极少极少了。

在现有的16本非文学史论著中，一般收集的都是文论作品，或谈论文坛风貌、或谈论编史艰辛、或谈论书刊今昔、或谈论作家逸事，其中不乏具有专论性的评论大文与针砭时弊的感喟之作(如有关鲁迅的、有关红楼梦的、有关武侠小说的，等等)，兼及一些忆友怀旧等小品，因此，把这些文章归类于杂文类或评论类应该较为贴切，纳入于“散文”的范畴则可待商榷了。

因此，欧清池把“方修的散文创作”列为一个章节论述，我以为不如更具体和更细致的变为“方修的杂文创作”，当更恰切；毕竟，在方修非史论著方面，杂文反而是他的另一傍身匕首，而且颇具特色，值得深入分析。如同论者在谈论鲁迅的创作时，往往把鲁迅的杂文辟为一个章节，而不会与狭义的散文作品

如《野草》和《朝花夕拾》相提并论。当然，方修的杂文更多的是他史论的衍生物，是他在艰辛的治史(文学史)生涯中遇到各种不正之风的切齿和愤嫉的反响，因此常与他治史的主线相牵连的。但作为一批杂文的产品，探讨它的风格、结构、语言、修辞等，亦当另有意义。

二、方修对我国华文文学界的功绩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对青年作家的帮助和提携。文坛上的前辈对后进作家的鼓励、带领常是带有共性的。中国的鲁迅对左联五烈士乃至胡风、萧红、萧军等的关心和爱护是有记载的；我国文坛已逝作家杏影、姚紫对年轻人的关怀也是常有听闻的。方修在这方面，可说是不胜枚举了。我在第四期的《热带学报》上就读到多位作者带着感激的心情回忆当年如何受到方修的鼓励和引导，粗略一算，时间弹指都在三四十年左右，可以肯定，这些作者迄今未曾辍笔，与方修的悉心爱护和教导不容分割的。

在50年代末开始，当年的华文报是文学界的重镇，方修运筹其间，每逢岁末撰文总结全年的文坛动向，举凡全年出版的文艺副刊、杂志、专集，重要的文艺活动、思想交锋、批评辩驳，乃至全年出现哪些可堪注意的写作界新人等等，都在记叙报道的范围，成为每年文坛重要的圭臬文件。

这类总结文章都在每年的报纸元旦特刊上刊出，当年的许多文艺青年，每到年终将届时便引领企盼读到这篇文章；有的甚至在除夕当晚，以迫不及待求先睹为快的心情半夜到处追踪报贩，希望能提早买到元旦日的报纸特刊呢！

在这几十年间，我们回头翻阅这年年终的文坛报道，发现当年被方修带着鼓励性提及的一些新作者，有许多后来都成为文学界的活跃人物，担当文运的传薪工作。

因此，如果能在方修论中，辟多一个章节，专论方修对青年作家的关爱和培养，肯定是极有意义的。从这样的要求出发，我们又不免觉得欧清池的方修论似乎欠缺了什么。

从“策略性”角度看文坛纷争

然而，这只是我们的无厌之求与贪婪之索吧了。它绝对不能构成《方修及其作品研究》的瑕疵。因为作为学者，欧清池所论述与研究的是方修的作品，一如它的书名所界定与规范的。

《方修及其作品研究》的第三章为“方修的文学创作论”，这是较集中探讨方修文学观的章节，方修较重要的文学观点在这里受到多层次的分析。据说，去年11月间在吉隆坡举行的“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有人在会上提及有关方修的若干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学观点。

我愿借对欧书的评介机会，提一些个人的看法，它不仅涉及如何对待方修某些文艺观点的问题，也涉及近半世纪中国文坛的若干争论，以及个人如何看待这些争论。

中国在上个世纪为期80年左右，是左翼文艺思潮全面垄断中国以及在中国境外华人知识界的意识形态领域。西欧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激情被巧妙地移植到政治土壤中，成为“革命机器”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提出了文学艺术必须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则把列宁的“为劳动人民”收缩为“为工农兵服务”，界定的圈圈进一步小化了；这种论点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江青口里，则又演化成大写“工农兵高大形象”的口号；从“劳动人民”到“工农兵”再到“工农兵”中的“高大形象”，是一个描写范围和服务范围不断收缩和一再收缩的过程，也是文学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再受削与受挫的过程。

这是被特定政权所支配并反过来为特定政权服务的政策。它的意义首先是为政治的，而不是为文学艺术的。因此，它不能不有违于文学艺术的特质与规律。在漫长的时间里，从前苏联到中国，都不时有许多作家艺术家为文学艺术的美学功能和社会功能翻案，冀图扭转离文艺实质之经、叛文艺实质之道的航向。

斯大林时代史不绝书的肃反运动，许多作家艺术家首当其冲

成为肃反的祭旗便是一例，其中固然有政治上图反的分子，但也有不少只是在艺术见解上与政权分道扬镳的人物。“马赫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以及“路标派”的作家群，尽管有些人涉及了与政权敌对的立场，但是他们视文学艺术是“个体的劳动”，强调文学艺术拒绝政治枷锁，突出“个性”，显示了与主流文学艺术口号相反的意见。

毛泽东时代始自延安时期，就出现了另类声音，被称为托派的王实味以《野百合花》为枪弹，明显的射出了与毛泽东延安文艺谈话相反的枪声，并牵引了丁玲与萧军等人卷在挨批的圈圈内；随后的反《武训传》、反胡适思想、反右、四清等政治运动及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作家艺术家因艺术观的不同而遭厄运的不计其数。

由共产党强大力量所支配的一条文艺路线，在政权的保护伞下毫无疑问的是存在固若金汤的地位。一些作家艺术家无法与这股主流思潮抗衡，但又感于文学艺术政治化给文学艺术带来的危机，根本上破坏了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因此在重压之下，一方面虚与委蛇，在观点上与创作上顺势推舟；一方面又委婉曲折地提出各项“补充性”的论点，对主流文艺思潮进行“改装”和“加工”，希冀能在“百家争鸣”下扩大主流思潮的容纳面和包容度。在这方面，中国的作家胡风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胡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白区曾提出系列的文学口号，如“主观战斗精神”、“主观燃烧”论等，是从浪漫主义思潮引进的一条作家创作过程的主观投入的激情。这是他有感于当时“革命作品”的干巴巴和概念化而发出的呐喊。这是从创作的主观能动性的需要和必要来对主流思潮的补充，但是很快的，就遇上了反击，乔冠华、邵荃麟、林默涵、胡绳、黄药眠等人就对他发动了强大的批判，指胡风是“披着约瑟夫的外套”，贩卖“走私主义哲学”的活动家。

胡风是天才的策略家

胡风二度遇难则是在50年代中，有名的《关于文艺问题万言书》，则是更详细、更细致、更系统、更有针对性的提出他的文学观点。所有这些，都说明胡风是一个文化线上天才的“策略家”，他的策略的智慧完全集中在一个聪明的点上：他不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的文艺观点，而且他所有的论点与毛泽东的观点令人有处在“同向并行”的感觉，只是在毛的文艺主干上添枝加叶作补充。他极具有灵活性的论点是：“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创作的源泉。”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从“生活”的面收缩到“工农兵”的点上，胡风则从“工农兵”的点上还原到“生活”的面上。很显然，同向并行、互有范围。从人类的文学艺术发展史看，胡风显然是有充足的依据的。

胡风的聪明和策略在于：一、他不反对当时的主流思潮；二、他把明显有偏颇的主流思潮“改装”成符合艺术规律的要求。因此，与其说胡风是当代中国文艺界的“异议分子”，不如说是当代中国文艺界最具策略性的思想家。

我们明白了胡风对当年主流思潮的又骂又赞的两手之后，便不难明白当年中国文坛甚至涉及中国境外知识界对胡风咒骂的苦心 and 无奈了。

如前所述，上世纪50年代前后是一切紧跟思潮的知识分子充满灿烂理想的时代，加上空间地域的阻隔、资讯的闭塞，当时的新加坡文化界对中国是寄予厚望的。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人一时的“跟风”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方修对胡风的微辞，既是时代带给他的错误，也是历史带给他的误导。当整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朝同一个方向倾斜的时候，作为个体的文化人，我们对方修的肯定与敬仰显然是无损丝毫的。

然则，我们既可以从策略性的角度理解胡风的言论，难道我们不能有同样的理由来理解方修当年的“批胡”么？

作为一个追求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方修在感情上赞同对胡

风的批评；作为一个追求艺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方修自觉或不自觉的倾向胡风的若干艺术论。

尽管他没有在文字中明显的表达他对胡风观点按捺不住的默肯，但在他许多论著中，一再的强调文学作品应该要有“一定的生活内容”、要“有一点时代特征”、要能反映“时代精神面貌”、要具有“时代生活特点”，更微观化一点，他也只说，文学作品应该表现“社会大众的思想感情”。这时候，我们完全看不到方修对胡风等人的立论有什么相径庭之处。

“形象大于思想”带来的冲击

因此，对胡风问题的态度，我们看到方修内心的矛盾，这是一个时代思潮的强势与艺术特质相冲激化反映在他内心的表现。

我想，前苏联文学界一度探讨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命题，是令老作家方修在内心矛盾时期极感兴奋和高兴听到的。这一个论点是从社会主义大师恩格斯的论断衍生而来的，恩格斯表示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所获得的法国社会知识，“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而人们知道，巴尔扎克是站在保皇党的立场来进行他的宏伟巨著《人间喜剧》，但人们却从他的作品中惊人的发现这一位保皇党的保守派作家居然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揭示了一个社会和历史的动向。

巴尔扎克现象表示了：作家的思想、观点有时并不决定他的作品的思想、主题。一个很保守的作家，居然有可能出现并不保守的作品。这一种作品异类现象，给前苏联的作家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课题。中国艺术界是照搬前苏联“老大哥”的，因此也一度引来了有趣的讨论。然而，也许这是一个极其个别的现象，也许这对一贯强调作家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中国文艺界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这场的讨论似乎不怎么热烈而且很快销声匿迹了。

方修对这一个艺术命题显然是兴趣浓烈的，并为之作过一番

分析：“形象比思想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作者的主观思想，作品的创作意图，在作品完成时，已经是稳定下来了，不能由后代的读者任意歪曲或拔高，但形象方面就不同，随着一批新的读者把他们的认识、经历、体验、感受加了上去，它是愈来愈丰富、饱满的。”

承认“形象大于思想”，就得承认生活的第一位性，就得承认生活的客观性和主体性，就得承认生活不是全处在受支配地位而是具有反支配能力。巴尔扎克的立场与作品是矛盾的，但因此却揭示了一个艺术上非常复杂的问题。

容纳度、伸缩性和策略性

方修显然在这个艺术命题上得到力量，作为他重新思考强调作家思想第一的偏激性。我们现在不难理解，尽管他对当年胡风言论颇有微词，但他的观点却有明显的伸缩性和容纳度，甚至在根本上难找悖逆之处。

从这一个角度设想，欧清池如果能从中国新文学近整个世纪的走向、从胡风等人的战略到方修的“策略性”取向，当能更全面的论述方修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考虑点，而这样的论述，必当是从方修的内心世界的思考指向为脉络。

总的说，我们必须从策略思想来对待这几十年来中国文艺问题，包括了胡风问题，也包括了马华——新华文艺界偶尔出现的“批胡”或其他这样那样的“极左倾向”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只是仅取一点来作文章，而绝对不意味着欧清池大论的瑕疵，相反的，面对着上下两巨册的《方修及其作品研究》，想到这八年来作者的辛劳所付出的劳动，我们直感到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更何况这个文学工程的建基点又是要全方位的抓住一个老作家、老学人的卷帙浩繁的著述，其中的甘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了。（完结篇）



精神家园简介

此书共收25篇评论风沙雁作品集的文章，除诗歌外，举凡散文、议论文、学术著作以及长篇小说都有所论述。从这些文章中，即可窥探风沙雁对理想精神家园的追寻、反思到哀伤的心路过程。

风沙雁20余岁进入文坛，先创作诗歌和散文，30岁后逐渐少写诗歌，专心写散文，50岁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期间并拨出时间作学术研究。他的早期作品较关心底层人们的困苦生活，后期则以关注民族文化为主，这些特点在此文集的评论文字里隐然可见。

作为右手搞创作，左手写论文的风沙雁，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一个模样，从阅读这25篇论文中，读者基本上应该会有个相当明晰的轮廓。

新加坡斯雅舍《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列》

- (1) 新马文学评论集
- (2) 新华七人诗选集
- (3) 碎盘儿
- (4) 新马汶华文文学评论集
- (5) 一凡微型小说及其赏析
- (6) 风沙雁精神家园透视



精神家园透视

ISBN978-981-08-2064-0



国际书号ISBN978-981-08-2064-0

定价:新币S 16元

海外US 12元